目录

[南方嘉木 1](#_Toc29569475)

[陆羽生平 5](#_Toc29569476)

[俭德之人 8](#_Toc29569477)

[湖州刺史颜真卿 11](#_Toc29569478)

[末茶兴亡 15](#_Toc29569479)

[寻觅名茶 19](#_Toc29569480)

[茶树王 23](#_Toc29569481)

[境会亭 26](#_Toc29569482)

[茶马与茶盐 30](#_Toc29569483)

[荣西在宋 33](#_Toc29569484)

[武夷三十六峰 36](#_Toc29569485)

[铁观音 40](#_Toc29569486)

[龙井 43](#_Toc29569487)

[松萝山周边 46](#_Toc29569488)

[茶风西渐 49](#_Toc29569489)

[茶事拾零 52](#_Toc29569490)

# 南方嘉木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

此句是陆羽所著《茶经》的开篇语。陆羽因此书而被后世奉为茶神。比如，他的画像被绘在许多茶店的招牌上。

陆羽生年不详，而据《新唐书》，他殁于唐贞元末。贞元年号的使用至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为止，若陆羽殁于是年，则相当于公元805年。上一年入唐的最澄在这一年归国，而空海则于此年在长安从青龙寺的惠果那里接受了传法阿阇梨位的灌顶。这一年相当于日本恒武天皇延历二十四年。

饮茶在唐代已渐渐形成文化，而陆羽则可以说对之进行了总结，并建立了体系。由于陆羽对于茶文化的贡献至为重大，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茶文化也是始于陆羽。更有甚者，还有人可能会误以为饮茶是陆羽首创的。陆羽画像总是出现在茶店的广告牌上，因此人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也并不奇怪。

不用说，人们在陆羽之前便已开始饮用茶。饮茶的习俗非常古老，甚至无法估测其出现的时间。只是“茶”字很可能是到了陆羽的时代才开始使用的，此前使用的是“荼”、“茗”、“荈”、“槚”等字。

麻烦的是，若据《说文解字》，“荼”的本意是“苦菜”。很可能的情况是：作为饮食用的植物，茶远较苦菜出现得晚，便临时借用了“荼”作为名字。也就是说，“荼”是文字上的借用。因此，不能因为《诗经》中出现有“荼”字，便可断言在孔子以前就有人开始喝茶。《诗经》中的用例是“荼毒”，意指难以忍受的残酷，决非是指茶。

如果口干了，饮水即可，而饮茶除了解渴外还有别的目的。与饮水不同，饮茶要花很大的工夫。这可从中窥见文化的萌芽。待陆羽将之体系化以后，饮茶遂脱离了文化的萌芽期，渐渐迎来了成熟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茶”字终于从“荼”字的阴影中金蝉脱壳而自立门户了。若据清初顾炎武（1613—1682）的研究，早在陆羽之前二百多年的南朝梁（502—557）时，便已出现了“茶”字。

手抄时代的文献散佚甚多，故确定新字形出现的年代是非常困难的。即便茶字在梁代已经产生，但饮茶当时还未普及，所以可能使用得并不广泛。

饮茶的习惯最早应该是在其原产地附近的四川地区得以普及，逐渐沿长江（扬子江）扩展到适宜茶树栽培的江南地区。梁是南北朝分裂时期均以今南京为都的南方六朝中的第五个王朝。南朝人饮茶是很普通的事，但北方并不如此。“茶”字虽然在南朝梁时便已被创造出来，但在大部分人没有见过茶的北方，它应当并不通用。

此时“茶”字虽然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文字被局部使用，但毫无疑问，当饮茶的习惯普及全国以后，它就成为全国通用的文字了。这要等到南北统一，南方嘉木之叶可为北方人普遍赏味的时代。政局稳定、民生殷实是“茶”字获得市民权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完备，或许是在陆羽的时代。

南朝梁之前的齐是南朝的第四代王朝，这个短命王朝（479—502）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二十三年。半个世纪以前北朝也出现了名为“齐”的王朝，历史学家分称二者为南齐、北齐。

担任南齐秘书丞重职、详熟经史的王肃，因故亡命北魏。北魏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但在南方成长的王肃，一开始并不习惯北方的生活。北魏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当时的孝文帝正致力于推行汉化政策，禁止使用本民族的原有语言，即所谓禁胡语。征服者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被征服者的例子并不少见，但在北魏却恰恰相反。不仅是语言，胡服、胡姓也被禁止。拓跋这一固有的姓也被改成汉式的“元”姓。唐代白居易的密友、诗人元稹，以及金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元好问等人，都是改姓元的拓跋部的后裔。

北方有北方的生活方式，因此无论怎样汉化，当时也并未有太大的改变。饮食上还是以羊肉和酪浆为中心。酪浆是熬制的乳饮料，含有百分之一的酒精度，味似酸奶。

王肃于太和十八年（494）亡命北魏，时年方三十。比“亡命”更为优雅一些的措辞是“归顺”或“降伏”。据说王肃不习惯北方的饮食，总是食鱼，饮茗汁（茶）。但他的适应性应该很强，所以渐渐也适应了北方的饮食习惯。数年之后的某日，在宫中举行的宴会上，王肃畅食羊肉，痛饮酪浆。见此情形，孝文帝不禁讶异。他问王肃：

**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

王肃答曰：

**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

齐、鲁、邾、莒是春秋时代的诸侯国，虽有大小之别，但皆各自独立，地位平等。而主人和奴隶，则上下分明。茶甚至不能为奴，可见是毫无地位的。

上则传闻出自六世纪中叶成书的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正觉寺”条。此寺乃身为尚书令（宰相）的王肃为妻子修建的。

茶的别名“酪奴”，即来源于上述王肃的一席话。

逃亡之初，大概因刚从湿润的南方甫迁到中原的干燥地带，所以王肃频繁饮茶，人称“漏巵”，即无底之杯。而此时他竟然把茶贬为“酪奴”，是不是太过分了？

王肃亡命乃因父兄为南齐武帝所害，亟欲报仇，因此对于南方之物，大概多颇为嫌恶。即便是平时那么嗜好之茶，若有酪浆润喉，亦弃而不顾。以茶文化言之，饮茶的气氛甚为重要。若心憎南物，则饮茶之气氛全无，故不得不谓茶为酪奴。

酪奴以外，茶还有另一诨名叫“水厄”，指的是水灾。

东晋王濛生活于四世纪中叶，以相貌俊美闻名。相传某日因帽破而去店家购帽，不知是否因迷醉于其美男子的翩翩风度，老板娘赠其新帽一顶。此王濛亦极好饮茶，但凡有客人来访，总要向对方进茶，让客人酣饮不止。

王濛历任司徒（宰相）之掾（幕僚）、长史（秘书长），因公事不得不会晤王濛的人每每感叹：“唉，今日难免水厄矣！”

前面提到的从南齐亡命北魏的王肃，甚好学问，孝文帝常与之晤谈。其崇拜者众多，其中给事中（皇帝的顾问）刘缟因极为敬爱王肃，甚至模仿其嗜好，《洛阳伽蓝记》说他“专习茗饮”，意谓其虽以饮茶为苦，仍努力练习不辍。

北魏虽以武力称雄，在文化上则仍不及南方。皇帝自己便积极致力于汉化，正是因为将南方视为文化的正统。孝文帝此举当然也会招致抗拒和排斥。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揪住勤练饮茶的刘缟说：

**卿不羡王侯所食之八珍，而独喜苍头之水厄，效颦者乃卿也！**

八珍大概是指八种珍味。彭城王邸中以江南人为奴，故其常饮之茶亦被彭城王视为奴仆的饮品。“苍头”即黑头，指无冠露发之奴隶阶级。

彭城王与其兄孝文帝不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指责的并非王肃，而是仿效王肃的刘缟。同样是饮茶，王肃还像个样子，而次流刘缟饮茶，对于彭城王而言，却无法忍受。

“效颦”典出《庄子·天运》，是说绝世美女西施蹙眉之态楚楚动人，美得难以用语言形容，农家丑妇效之，却徒留笑柄。

“效颦”是当面辱骂，北魏宫廷中人从此不敢在彭城王面前饮茶。宫廷宴会中虽亦设茶，但无人敢碰。一时之间，北魏宫廷饮茶仅限于新来的南人。

号称“无底杯”的王肃，饮茶“一饮一斗”。当时的斗约当二公升，比日本的一升稍多。即便如此，饮一升的茶也是非常困难的。

从梁亡命至北魏的皇族中有一人名为萧正德，他是梁武帝的外甥。武帝无子时过继给武帝为养子，武帝生子后被免为西丰侯。他因此不满，逃亡北魏。在北魏宫廷中有人问他：“卿水厄多少？”萧正德答道：“我虽生于水乡，但尚未遭水难。”举座皆笑。他当然不解“水厄”之意。

六朝中最初的王朝是吴。长期统治江东的孙权称帝后，于222年改元黄武。280年，吴于第四代皇帝孙皓时亡于晋。

孙皓二十三岁即位，享有“才识明断”的高誉。当时的东吴在北方的压力下国威不振，国人期待他是东吴的救世主，但人们的期待落空了。

《三国志》以“凶顽”评价孙皓，据说他肆行残暴。虽然经常会有辜负人们殷切期待的人，但孙皓以乌程侯的身份驻于地方的时候，似乎确是才识明断的。为何会突然变为暴君呢？令人不解。我猜测这恐怕是酒精中毒的结果。

若仅是自己饮酒过量也就罢了，孙皓还强迫家臣喝酒，而且规定其量为七升，相当于现在的七合七勺。虽然饮用的大概是酒精度较低的酿造酒，但对于普通人而言，七升已是大为过量。对于皇帝孙皓而言，这就是其目的。一旦被灌得酩酊大醉，酒后吐真言，孙皓便令侍臣记录下来，于是就出现了逮捕、处死口触帝讳者等残酷的事。

孙皓对有的臣子甚为偏心，但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种宠爱何时会消失。韦曜起初甚得孙皓欢心，被委以修史等任。他不善饮酒，最多亦仅二三合而已。孙皓知之，特减其量。《三国志》云：“密赐茶荈以当酒。”可见其关心备至。据此，则可知当时茶酒颜色相同。

但这一宠爱并不长久。孙皓欲将己父之传列入“纪”，即专门记载皇帝事迹的史传。但孙皓之父孙和并未曾即位，故韦曜不同意以孙和传为纪。拂逆暴君之意是非常危险的。宴会之上，遂不能以茶代酒，终至捕杀，其时韦曜年70岁。

孙皓的统治被晋终结，天下重归一统。但晋的统一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还不到四十年就已灭亡，残留下来的一个皇族中人在南京建立了流亡政权，是为东晋，也就是六朝中的第二代王朝。

晋是司马氏篡夺了曹魏政权后所建。魏之所以轻而易举地被推翻，是因为权力过度地集中于皇帝手中，而皇族仅被封为名义上的王，没有兵权。这样，即便皇权濒于危险境地，皇族亦无能为力。晋吸取了这一教训，给予诸王兵权，但他们为争夺帝位而混战不休，终致灭亡。

教训只是片面的，晋忽略了其他的教训。在晋的体制下，统治者必须是英明的。而晋的第二代皇帝惠帝昏庸无能，在人民饥馑无米下锅的时候，他还反问：“何不食糜？”他像玩偶一般，任人废而复立。据说当他复位回到洛阳之际，宦官曾给他献茶。这也说明茶是适合皇帝的饮料。但据《晋书》，惠帝还洛时乘牛车，随从公卿则徒步而行。皇帝外出时有卤簿（行幸队列）制度，牛车不在规定之内。在天子的卤簿中，士以上的官员须乘车，徒步亦为特例。那么这次的“茶”是否也是个特例呢？惠帝一行在洛阳“哀感流涕”，昏庸的天子就在这样的情景中啜茶而饮。

南北朝时期有一文人名为王褒。中国姓氏的数目远较日本为少，且早先名亦仅为一字。西汉末年，二字名稍见使用，但王莽随即颁布了二名的禁令。《三国志》中的诸英雄如曹操、刘备、孙权等，都是单字名。这样一来，当然同名同姓的人就很多。但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的是，中国人在名之外还有字。一般友人之间用字称呼，即便同名，以“字”亦可区分。但是，同名同姓甚至连字也相同的例子也是有的。

公元前一世纪时期西汉的王褒字子渊，六百年后，北周的王褒亦字子渊。因字多与名在意义上有关联，故同名同字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比如毛泽东的字是“润之”，“泽”通“润”。蒋中正的字是“介石”，盖取其中正如石之意，这个字更为有名。

“褒”字“衣”中有“保”，保指婴儿，尿布称为“緥”，母亲裹婴儿的衣服称为“褒”。“褒”又大又深，让人联想到“渊”。“子”是“孔子”、“孟子”的子，常用于雅士之名，故“子渊”作为“褒”的字非常合适。从前在宫廷中孕育帝王之子的宫女大概会得到类似于孕妇服一样的服装，亦称为“褒”，这在那个时候会被人们称羡，故褒字有赞誉的派生之义。

我们这里说的字子渊的王褒是指西汉的那个王褒，他是位文人，《文选》收录了他的《洞箫赋》、《得圣主贤臣颂》两篇文章。《文选》很早就在日本流传，如清少纳言《枕草子》所云“文谓《文集》、《文选》”，可知《文选》是宫廷之人的必读书。另外，这里的《文集》是指《白氏文集》，亦即白居易的文集。因此，王褒在日本亦有其读者。但他所写的与茶有关的《僮约》，《文选》却没有收录。或许他自己写这篇文章时，也不觉得其重要，而是视其为游戏之作。

要说到明确的最古老的记述人们饮茶之事的文献，似乎便是王褒的《僮约》。

陆羽的《茶经》里虽然引用了神农的《食经》，但这本书并未留存下来，神农也只不过是传说中的人物。此外，《茶经》中还提到司马相如的《凡将篇》中有“荈詑”的记录，这虽然被认为与茶有关，但到底是否如此，尚难定论。《凡将篇》虽流传至唐代，但其后亦散佚了。

王褒的《僮约》如名所示，是一份僮（佣人）的契约书，列举了佣人必须完成的工作，其中“茶”出现了两次。一次是“烹茶”，茶有“苦菜”和“茶”两种含义，单是这个记录，说的也可能是烹煮苦菜的事情，不限于茶。但“武阳买茶”，却只能说的是茶。王褒居于益州，即现在成都东北的广汉，那里距武阳（今彭山）大约一百公里。如果是苦菜，必须要新鲜，而且苦菜在许多地方都可以种植，在益州的市场上也可以买到。而武阳至今仍是眉山茶的产地。

据《汉书》，王褒是蜀郡人，因益州刺史的推荐而被召至都城。他为什么要写《僮约》呢？其经过大致如此：

王褒在书生时代，从故乡资中出发去成都，途中宿于寡妇杨惠家。寡妇家中有其亡夫所买的奴隶，名唤“便了”。王褒命其买酒，他却说：“大夫（杨惠之亡夫）买我的时候，约定只为他守墓，因此我不能为其他男人买酒。”以此为由拒绝。据说王褒一怒之下，以一万五千钱买下了便了。

王褒为了惩治狂妄的便了，为其制定了苛刻的服务规约，这就是《僮约》。像“晨起早扫”、“食了洗涤”这样从早到晚的各种规定，写满“百役”。掘井、护院、违命笞一百……种种过分的要求令便了惊悔，不禁自怨自艾：“早知如此，当初就应听命买酒啊……”

《僮约》中有很多细碎的做饭的规定，“烹茶”列在最后，由此也可推断这不是苦菜，而可能是茶。《僮约》写道：“牵犬贩鹅、武阳买荼。”宋代的百科全书《太平御览》将该文收到“文部”的“契券”项下，不过这是不是真的契约呢？若为买入的奴隶，恐怕没必要做如此细致的规定。若虐待至死，也是主人的损失。我想这只是文章大家王褒假定要惩罚骄横的奴隶而作的游戏文字。此文是韵文，契约书中用韵是没有必要的吧。

不过若此事不虚，则此《僮约》不得不说是令人厌恶的文字。折磨弱者，对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奴隶喋喋指责，有什么意思呢？奴隶便了对于亡主可能是十分忠诚的。故主的未亡人邀请年轻的书生入住并酒宴款待，使他十分不满，因此就找借口拒绝买酒。若此推测不误，则便了并非懒惰的奴隶，而是一个可爱的忠仆。

无论如何，《僮约》中“牵犬贩鹅”的对句亦须是买入物品。此一游戏文字的作者选择了“茶”。因有武阳这一地名，故此处的“荼”即指茶。《僮约》中写明了日期是神爵三年（前59），由此可知，四川地区在这一时代已经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这似乎是关于茶的最早的文献了。

既说“买茶”，则当时茶已经成为商品。但只能在产地买到，故大概尚未普及。或者王褒亦有遣奴大量买入并在益州出售以牟利的打算。据《僮约》，我们不难想象，饮茶当在神爵三年以前很久即已开始。

西汉王褒的《僮约》已经明确显示，公元前一世纪，已经出现了饮茶的习俗。此后约二百年的东汉时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茶的明确的记录。陆羽的《茶经》引用了东汉末年华佗《食论》中的话：“苦茶久食益意思。”华佗在中国是名医的代名词，乃至药品的商标会标以“华佗膏”、“华佗丸”的名目。华佗的生卒年不明，曹操以之为侍医，但因其还乡不归，故将其杀害。

华佗是沛国谯郡人，与曹操是同乡。临刑前，华佗欲将一卷书交给狱吏，说：“此书传世，可活苍生。”但狱吏畏法，不敢收。华佗悲愤长叹，只得将医书投入火中，付之一炬，故其术不传。据《三国志》记载，其后曹操爱子染疾，百般医治无效而死，他亦追悔杀了华佗。

书既毁于火，则华佗的著作亦不应留存。故《食论》被疑为伪作，此书现已散佚。此外，传为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亦涉疑伪。

华佗虽说是东汉时人，但已是东汉末期，从此时开始，关于茶的逸事就开始多了起来，出现了“以茶代酒”、“酪奴”、“水厄”等典故。但这些不过是些传闻轶事，即便如此，总比没有任何记载要强。但此时还没有到品茶作文的阶段，真正赋予茶以价值，创建茶艺体系，仍要等到唐朝陆羽时代。

三国时期割据南方的吴降晋以后，形成了短暂的天下一统的局面。张载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物。他历任著作郎、弘农郡太守，最后升至中书侍郎，由于忧心乱世，辞官隐退。《文选》收有其《拟四愁诗》。此外，其《登成都白菟楼诗》末尾写道：

**芳茶冠六清，**

**溢味播九区。**

**人生茍安乐，**

**兹土聊可娱。**

张载是河北安平人，曾游蜀地，其越剑阁时所作《剑阁铭》为世所知。他登上成都的白菟楼，歌咏蜀国亦堪为安渡人生的乐土。在提到橘、鱼、水果的可口之后，他写下了前引的诗句。“六清”见于《周礼》，指水、浆、醴、醇、酱、酏。虽不知这些都是何物，但既称“清”，应是清爽的饮料。诗中说到，蜀地芳香的茶则更胜六清，其美味传于“九区”（天下）。

与张载同时代的左思写有引得洛阳纸贵的著名的《三都赋》，在其蜀都的部分中列举了蜀地名产，其中并没有类似茶的东西。那么张载虽然认为茶的香味满天下，但恐怕尚未能获得公认。

# 陆羽生平

陆羽传只见于《新唐书》，却未见于《旧唐书》。《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条云：

**陆羽字鸿渐，一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

复州竟陵即今湖北天门。天门位于武汉以西约120公里，城旁有天门河。天门河虽非大河，但南下约20公里，即有东流入长江的大河——汉水。城西门外有湖名为西湖。相传陆羽是弃儿，大概就是被抛弃在这样的水边的。

因是弃子，其出生地自然不得而知，生年亦不明。安史之乱后，他于浙江苕溪之滨筑居，开始写作简单的自传。其自传开头云：“陆子名羽，字鸿渐，不知何许人也。”这无疑是仿陶渊明自传《五柳先生传》开头的“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句。

关于其生年，陈彬藩先生（前福建省副省长）在《茶经新篇》中认为是开元十七年（729），浙江省茶叶学会的机关杂志《茶人之家》所载欧阳勋先生的《一代茶圣垂千秋》一文则认为是开元二十一年（733）。两人均未提供判断的根据，但我推测他们的结论有差异，是因为对陆羽自传的阅读和理解方式的不同。

据自传，陆羽长大后，自己卜卦，得“渐”卦，遂以之为姓名。《易经·渐》卦辞云：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羽遂从中择陆为姓，以羽为名，以鸿渐为字。作为弃儿，陆羽的人生起点是最为不幸的，但可能正是这种底层的生活，增强了他对美的感受力。习惯于奢侈生活的贵族恐怕是很难从日常平淡无奇的行为中发现美的吧。

虽不能确定“日常茶饭事”一语从何时开始使用，但陆羽时代的“茶”恐怕还是某种“特别的东西”。在唐朝的先代隋朝，由于大运河的开凿，南方的特产被大量运到北方，茶也是其中之一。唐建国百年后的玄宗时代，茶已经在北方普及。

据说，在陆羽出生的开元年间，泰山灵岩寺的降魔师在坐禅时禁止一切饮食，只有茶例外。据此，则茶似乎是联系圣俗的一种特别的东西。收养弃儿陆羽的是僧人。陆羽自传中的“大师积公”是竟陵龙盖寺的智积禅师。是不是智积捡的陆羽，我们并不知晓，但抚养陆羽的，正是此人。陆羽是在寺院中成长的，我想，这对于茶的命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作为南方嘉木的茶，在唐代和佛门的联系非常紧密。

刘长卿是开元二十一年（733）的进士，比陆羽约长20岁。《唐诗选》中收录了他的七首诗。他作有一首名为《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的诗，“茶会”一语大概初见于此诗。稍迟，钱起亦作有题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的五言律诗。钱起是天宝十载（751）的进士，《唐诗选》收其诗七首。

刘长卿的诗是在与陈留县官员举行茶会时所作，但其地点却是在名为惠福寺的寺院。而钱起作诗的场所是在长孙氏这一世俗中人的家中，但其对象朗上人则是僧侣。《唐才子传》云：

**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

其时，世称“钱郎刘李”，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嘉祐并称四大诗人。但刘长卿不以为喜，大言曰：“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只承认钱起而已。

《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中写道：

**因知万法幻，**

**尽与浮云齐。**

诗句中佛教气氛浓厚。但刘长卿本人年轻时，却在道教色彩浓厚的嵩山隐居。钱起茶会诗中提到的朗上人，可能就是当时被誉为名僧的朗然。诗中有“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一句，玄谈是意义深远的哲学讲论，多与老庄思想有关。但在这里，玄谈的对象是名僧，故其内容应当是佛理。且不仅是讲经而已，其言辞还富于“藻思”，即文才。绿茗不用说就是指茶。“榴花”是指称为“榴花天酒”的仙酒。因为是以茶代酒，所以在茶会上并没有出现酒。不论是“万法幻”还是“玄谈”，当时的茶会似乎带有佛教色彩。

被捡来的陆羽在寺院中接触了茶，据说他在寺中曾为智积禅师煮茶。懂事以后，对寺仆的工作又耳濡目染，不假学习，自然习得。生火是连小孩也会干的事。

《三都赋》的作者左思作有吟咏自己两个女儿的《娇女诗》，诗中写道：

**心为茶荈剧，**

**吹嘘对鼎。**

这里描写的似乎是幼女煮茶吹火的情景。左思是三世纪末至四世纪初的文人，其妹仕于宫廷。实际上，左思的两个女儿并无必要做吹火持竹、洒汗烹茶的工作，她们只是游戏而已。但对于龙盖寺的陆羽而言，烹茶就决非是游戏了，而是为了生活必须要做的工作。

龙盖寺大概也会有茶会，那时，陆羽可能即给侍其间。这种文雅的聚会一定对幼年的陆羽有很大的影响。集会中的人，在陆羽看来，简直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极为光辉矅眼。

陆羽自传的开头，在“不知何许人”的后面，继续写道：

**有仲宣、孟阳之貌陋，而有相如、子云之口吃，而为人才辩。**

仲宣是指魏时的王粲，孟阳是指前面提到过的晋人张载，据说这两个著名的文人相貌丑陋。相如是指西汉的司马相如，子云是指西汉的扬雄，据说同样出身于蜀地的二人均为口吃之人。陆羽虽然自认丑男口吃，但颇以才辩自负。口吃却雄辩，可见其辩锋甚劲。

他九岁学属文。若是士大夫子弟，未免过迟。但陆羽是弃儿，养育他的寺院可能亦只是想将他培养为寺院的仆役。但他聪明过于侪辈，故智积禅师亦欲授以学问。当然，智积只是想将他培养为僧侣，故多教授佛典。

但陆羽对此并不满足，因为他更想学习儒家的经典。陆羽在少年时代是如何知道儒家的呢？可能正是在寺院的茶会上服侍的时候，通过与佛教界以外的文人接触，而获得了相关的知识。对于这个少年而言，佛以外的事物，可能都被当成了“儒”。少年陆羽身处寺院，若从内部的眼光来看，不论何种世界，恐怕大多会让人厌烦。如果把佛、儒对立起来，少年陆羽从心情上，可能会倾向于儒。《自传》记其质问智积禅师：

**终鲜兄弟，无复后嗣，染衣削发，号为释氏，使儒者闻之，得称为孝乎？**

不只是智积禅师，中国的僧侣早已习惯了这种站在儒家立场上的攻击。《自传》续云：

**公曰：善哉！子为孝，殊不知西方染削之道，其名大矣！公执释典不屈，子执儒典不屈。**

其后智积对陆羽课以“贱务”，使之洁厕、负瓦、牧牛。念其前途，欲施“矫正”，可谓为爱的鞭策，陆羽谓之“矫怜抚爱”。

陆羽牧牛“百二十蹄”，即三十头牛。尽管少年之身要承担不适的劳作，陆羽的向学之心仍然旺盛，在牛背上以竹写字，继续学习。

智积派来监督的小僧头，因为陆羽的怠惰而对他施以暴力。陆羽不想浪费宝贵的岁月，终于从龙盖寺出走，躲入一家巡回演出的小剧团。陆羽貌陋音鄙，只能本色出演，饰演丑角。此外，他还写剧本。剧团中会写字者甚少，能写剧本梗概的就更为罕见了。《自传》言其“著谑谈三篇”，似对写作喜剧甚为得意。创作戏剧，须体人心。以最低的姿态来表现人所共感，是喜剧的核心。陆羽所具有的与其年龄不相称的丰富的人生经验，对其戏剧的创作一定会有帮助。

有一次，竟陵沧浪举行“酺”的活动。“酺”是一种官府给予百姓酒食的慰劳会，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一种怀柔政策。在“酺”的同时，举行戏剧表演，地方官也出来捧场。当时，新任竟陵太守李齐物注意到了陆羽。

李齐物是唐的远房宗室。其祖父李神通是唐朝建国元勋，唐代第一个皇帝李渊的堂兄弟。李齐物曾任陕州刺史，后升为河南尹（洛阳的长官），此时左迁为竟陵太守。玄宗时，唐改州为郡。陆羽家乡的复州也改为竟陵郡。州的长官是刺史，此时作为郡的长官，改称太守。安禄山之乱以后，复改为州。刺史和太守可以看作是相同的官职。

当时（天宝五载，746年），朝廷中政争激烈，“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断地弹压政敌。随着宰相李适之迁为太子少保这样的闲职，与之素来友善的李齐物亦被远放为湖北乡下的竟陵太守。李齐物是个有些奇怪的人，喜揭人隐私，但为人清廉。或因其性格独特，故对巡回剧团的演员兼编剧陆羽青睐有加，以其聪颖，授以诗书。《自传》云“捉手拊背”，甚是亲密。后李齐物推荐他就学于天门山邹夫子，这使得久欲问学的陆羽终偿夙愿。

此时应该正是陆羽的青年时代。“捉手拊背”，是对年轻人的态度。但他既然能创作剧本，恐怕就不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了。依陈彬藩陆羽生于开元十七年（729）说，李齐物新任竟陵太守时为天宝五载，陆羽虚岁十八。翌年，李齐物一党的首脑李适之服毒自尽，其子李霅迎柩至洛阳，李林甫诬杀之。李林甫为人忌刻，睚眦必报，派监察御史罗希奭到各地追杀被放逐的政敌。邺郡太守王琚被贬江华司马，听到罗杀奭至江华的消息，即自杀身亡。

李齐物不仅只是被贬，他甚至不知何时送命。陆羽或许也会向其献茶。他当然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这个在饮茶的功夫也在等死的人的心理状态，陆羽一定在默默地观察着。

李齐物并没有被李林甫派出的死神打倒，其后他又被中央复用，升为京兆尹。但在竟陵的时期，则是每日如履薄冰。与太守隔茶相对的时候，陆羽应该也在思考着，二者当中谁更幸运的问题。饮着同样的茶的两个人，命运却如此不同。

迫害李齐物的李林甫真的就幸运吗？他汲汲于官位，杀害对手，远放政敌，唯恐他们爬到自己头上去。唐代位阶的特别升迁要依靠战功，李林甫推荐异族将军成为掌握边境军权的节度使，因为节度使立功机会甚多，而异族武将不论如何升迁，也不会威胁到李林甫在朝廷中的地位。安禄山等异族将军掌握权力，正是李林甫猜忌的结果。

李齐物被贬六年后即天宝十一载（752），竟陵又迎来了被贬的官员。这次是礼部郎中崔国辅。崔国辅并不是因为李林甫的猜忌而被贬。他是被京兆尹兼户部侍郎王珙弟弟的谋反案牵连，而被贬为竟陵司马的。崔国辅与李林甫关系甚密，他竟被贬放地方，是因为李林甫的权力已渐次衰退。杨国忠因杨贵妃受宠而势力渐增，这次轮到李林甫如履薄冰了。正是在这一年，李林甫死了。据说晚年的他总是害怕被刺杀，因而惶惶不可终日。

被贬后崔国辅在竟陵过着优雅的生活，与陆羽也有交游。此时陆羽在邹夫子的门下学问日深，比六年前与李齐物相会时已经进步了许多。且李齐物虽是降职，却任太守，是一州之长，其下是别驾等官员，再下面才是长史和管理治安的司马等官。

崔国辅贬为司马，大概相当于地方警察局局长。与六年前比，陆羽的知识水平提高了，而对方的地位则下降了。作为文人，陆羽和崔国辅的地位是相等的。

陆羽最向往成为自由人。与人饮酒时，意有所适，不言而去，不管别人的疑惑。反过来，一旦与人有约，则必守不渝，“虽冰雪千里、虎狼当道而必行也”（《自传》）。但即便是自由人，也须承担自由人的责任。

李林甫死后三年，也就是崔国辅被贬三年之后，安禄山举旗造反，唐朝陷入混乱。李林甫因害怕出现竞争对手而任异族将军为边境节度使亦是一因。但政争的激烈导致正常政治的缺失，才是大乱的根本原因。

李齐物被贬第二年，皇帝诏求通一艺者，试后登用。这虽是玄宗的意思，但李林甫担心有才能的人物会因此涌现而取代自己的地位。受试者虽经过了诗、赋、论三门考试，但李林甫全部使之落第，并向玄宗报告“野无遗贤”，可喜可贺。此次，杜甫、元结皆在试中。

宫廷之中，杨贵妃渐得宠爱，杨氏一族日益兴盛，比李林甫更为无能的杨国忠继承了李林甫的位置，与安禄山产生冲突。杨贵妃的三个姐姐，各受国夫人的称号，杨氏一族春风无限的时候，有识者已经意识到天下大乱正在临近。

陆羽写作《茶经》的时候，正值安史之乱甫平之际。在经历了大乱的陆羽看来，理想人物的形象是“精行俭德之人”。茶是给这样的人饮用的，这是《茶经》的大前提。

# 俭德之人

“喝酒不会倾家荡产，饮茶却使人不名分文。”这句话不知典出何处，但我四十年前在台湾就听到过。因酒怠工，损财破家，在日本的典型是小原庄助，但这句话说的是酒的价格的问题。不论是多么昂贵的酒，一人酒量有限，有钱人是不会因此而倾家荡产的。但茶的价格是无上限的。某山某坡，某个高度，某棵茶树某部分的茶叶，再加上采摘的日期、时间、气候等条件，关于茶叶的条件是无限的。若饮此茶，无从计价，所谓“无价之宝”，即英语中的priceless，如欲得手，只好接受对方的开价。开价无顶，那么为茶倾家荡产，亦有可能。

正如一个故事所说，某位先生嗜茶荡产，不名一文。后投于某大茶商，成为品鉴茶等级的专家，勉强得以温饱度日。其品茶定级绝无差误，对于茶商而言，实属难得人才。

中国有一本被拍成电影的畅销书《美食家》，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陆文夫，我有缘成为这本书的监译。书中讲到一个苏州的资本家，以吃作为生存的意义，尽力追求美食的极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一度落魄，但在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授予“美食家”的称号，成为专家，东山再起。这与其说是以艺谋生，不如说是以爱好谋生。在这一点上，两个故事具有相似之处。

但品茶先生果然能被当成是“茶人”吗？陆羽在《茶经》中认为，适合饮茶的是“精行俭德之人”。嗜茶破家，为亲友及他人带来痛苦的人是称不上“精行俭德”的。所以品茶先生不过是专家而已。陆羽认为宜于茶者，绝非此种人。但茶室等表面简陋，内饰以金，示人以俭，或称雅致，是否符合茶之真精神，值得怀疑。

陆羽自传中提到了提拔自己的两个人即李齐物和崔国辅，而友人只举出了释皎然一人。释皎然是陆羽朋友中的代表，因其是真正的茶人。陆羽与皎然相识，是在从竟陵搬到吴兴以后。吴兴即现在浙江省太湖南岸，唐代属湖州。今天的地图上，仍注明吴兴的别名是湖州。陆羽就在流入太湖的苕溪岸边结庐定居。

陆羽的迁移是因为安史之乱。《自传》中轻描淡写道：“至德初，秦人过江，子亦过江。”秦人指陕西人。玄宗皇帝逃跑以后，长安人也大量南迁避难，大概陆羽认为竟陵亦非安全之地，故迁往更南处。安禄山造反后，玄宗退位，逃至蜀地，而肃宗则于灵武即位。肃宗之弟永王璘在南京附近兴军勤王，诗人李白成为其幕僚。但异母兄弟的肃宗和永王璘不和，因永王不奉诏入蜀，故被视为反叛。知名诗人高适时任淮南节度使，举兵讨伐永王。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兵集安陆。安陆在竟陵近侧，故当时陆羽的故乡一定是群情汹涌。虽为故乡，但作为弃儿，陆羽在此并无亲属财产，故易于避难，当时陆羽大概不满三十岁。陆羽在吴兴早早就隐居起来，一直活到70高龄，在吴应的时间比在故乡还要长。

唐代的一名诗人在一首题为《竟陵西塔寺陆羽茶泉》的五言律诗中写道：

**竟陵西塔寺，**

**纵迹尚空虚。**

**不独支公住，**

**曾经陆羽居。**

**草堂荒产蛤，**

**茶井冷生鱼。**

**一汲清泠水，**

**高风味有余。**

智积禅师抚养陆羽的地方是竟陵的龙盖寺，而西塔寺则大概是陆羽离开龙盖寺以后居住过的地方。支公是东汉三国之际的支谦，或晋的支遁。二人在《梁高僧传》中皆有传，但都无居于竟陵的记载。曾住于此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寺院方面的说法。

西塔寺除了曾经有高僧支公驻锡以外，陆羽曾经居此，似亦颇为闻名。其中有陆羽茶泉或称茶井，陆羽曾于此汲水烹茶。从“纵迹尚空虚”、“草堂荒产蛤”两句来看，诗人访问之时，已甚荒残。

上述这首诗在《全唐诗》中被归于裴迪名下，但裴迪是王维（701—761）之友，有名的《辋川集》即是二人唱和的结集。《唐诗选》亦收其五言绝句二首，皆为与王维的唱和。安史之乱后，他任蜀州刺史，与杜甫甚为亲密。显然，他要大大年长于陆羽。

裴迪之访陆羽遗迹，看来似乎年代不合。据《全唐诗》以为底本的统签的《唐诗》中的注，此诗虽见于明杨慎的石刻，但因年代差异，恐非裴迪所作。此注亦收于《全唐诗》中，以示存疑。然诗定有原作者，或自残碑、断简收集此诗时，因作者名似裴迪，故致误读。实际上，五代后梁武将即有名裴迪者。无论如何，竟陵西塔寺有陆羽茶泉，晚于陆羽的诗人探访遗迹，怀思古人而作此诗，当可无疑。

竟陵出现陆羽遗迹应是在陆羽被奉为茶圣以后的事。竟陵时代的陆羽仍在修习的过程当中，他成长为精通茶道的人应是在战乱中移居到湖州与皎然相会以后的事。陆羽《自传》中云二人是“缁素忘年之交”。缁是黑衣，即墨染的僧衣，素是指普通人穿的白衣。“忘年”是指不受年龄差距的拘束。皎然是缁，陆羽是素，二人的友谊超越了僧俗的界限。从“忘年”来看，两人的年龄应有相当的差距。皎然虽生卒年不明，但陆羽恐怕是更为年轻的一方。

皎然俗姓谢，名昼。据说是六朝诗人、政治家谢灵运的十世孙。谢灵运在诗中引入了自然美的新主题，钟爱山水，与庐山慧远等高僧交游，注《金刚般若经》，是佛教徒。皎然与其十世祖十分相似，文章隽丽，号为“释门伟器”。其传教“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以诗文为教化的武器。皎然天才似祖，性格则完全相反。《宋书·谢灵运传》言其“性奢豪，车服鲜丽”，并不满于与才能远不相称的地位。皎然于佛典以外，经史子集无不精通，对记载于《宋书》、《南史》中的先祖事迹必定十分熟悉。谢灵运由于性格过激而致死于非命，皎然定当以之为鉴，修身养性。《宋高僧传·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云：“昼清净其志，髙迈其心，浮名薄利所不能啖。”实乃俭德之人。传中也提到他与陆羽是“莫逆之交”，可见他们志同道合，陆羽当是认同皎然的“俭德”的。

某年重阳，皎然与陆羽于僧院饮茶，皎然遂作《九日与陆处士饮茶》五言绝句一首。陆羽虽曾被任为太子文学这一东宫官职，但并未就职。弃官不为者即为处士。将这一称号置于姓和名之间，是中国的习惯。其诗云：

**九日山僧院，**

**东篱菊也黄。**

**俗人多泛酒，**

**谁解助茶香？**

诗中无疑用了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典故。重阳节有以菊花撒于酒中的习俗，但菊花亦可增加茶的香味。“谁解”一句，即言无人知其奥妙，只有在僧院相对的二人——皎然和陆羽——知道而已。这不仅体现了二人“莫逆”、“忘年”的情谊，也正是陆羽茶道修习的过程。

皎然诗现存470余首。其中有一首《塞下曲》，收于《唐诗选》中。但奇怪的是，陆羽的诗只有一首收于《全唐诗》中。作品是否得以保留，固然与作者的实力相关，但运气也是一大关键。在印刷时代以前的手书时代，抄写下来的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即便抄写下来，也不一定就可以留存。晚唐韦庄的《秦妇吟》即是一例。这是一首描写黄巢之乱（875—884）惨状的长诗，十分流行，被广为传写，韦庄亦被称为“秦妇吟秀才”。即便如此，此诗亦竟然亡佚。20世纪初，其抄本于敦煌石窟被发现，方才重见天日。其原因一是由于篇幅过长，一是由于韦庄忌于人言而没有收入到自己的文集中。

皎然的作品得以留存，是由于其文名甚高，死后即有敕命抄录其诗并收入秘书监保存的缘故。前引其《传记》中云：“贞元年终山寺，……贞元八年正月敕写其文集，入于秘阁，天下荣之。”可见其死于贞元八年以前，而陆羽如前所述，大约死于贞元二十一年，这是推测其忘年交皎然较为年长的根据。

重阳日，二人饮茶，当时之诗，只有皎然所作留存下来，陆羽应也有诗，因酬诗应和乃是文人所好。如皎然有一首题为《寻陆鸿渐不遇》的诗：

**移家虽带郭，**

**野径入桑麻。**

**近种篱边菊，**

**秋来未着花。**

**叩门无犬吠，**

**欲去问西家。**

**报道中山去，**

**归时每日斜。**

这是一次不速之访的记录。皎然突然想拜访莫逆之友，却不巧没有在家。这首诗无疑是写给陆羽的，陆羽当有应和之作，可能会有入山观景、流连忘返等内容。但他的诗并没有留传下来。

皎然著有诗论《诗式》一书，摘录古人名篇佳句，分为五格、十九体。据其《传记》，在写作过程中，他以诗非禅者之意，故中辍其事。他不仅是作家，也是理论家。与之相比，陆羽的诗恐怕要逊色不少。他虽曾作诗，但未收入文集，故致渐渐散佚。陆羽现存唯一一首诗是题为《会稽东小山》的七言绝句：

**月色寒潮入剡溪，**

**青猨叫断绿林西。**

**昔人已逐东流去，**

**空见年年江草齐。**

剡溪是自天台山流入杭州湾的曹娥江的上游部分，以景胜闻名。虽距湖州有相当距离，但陆羽似经常出游至此。杜甫年轻时亦游于此地，晋代的隐士戴逵亦居于此。诗中所说的“昔人”，可能就是指他们。后面还要讲到，陆羽至剡溪，除了游玩以外，主要是为了清心洁志。在这里，他自然会缅怀曾经的隐士戴逵。

东晋末年，戴逵以琴技高妙闻名。武陵王闻其名而召之，他对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遂避居于剡溪。其性高洁，以礼自处，虽为隐士，而以放达为非道。他诟病竹林七贤之清谈，斥其乱道。“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是对于模仿前贤的似是而非的行为深恶痛绝。如此守礼隐士，正是陆羽心目中的理想人物。戴逵早于陆羽四百年，不仅是居于同地的同时代的朋友皎然，像戴逵这样前辈的俭德之人，陆羽亦以之为师。正是通过咀嚼从他们身上吸收来的东西，陆羽才能构建茶文化的体系。

在湖州除了皎然以外，陆羽还与隐士张志和交往。张志和是十六岁即明经及第的逸才，虽曾一度为官，但很快即归隐，自称“烟波钓徒”。擅画山水，嗜酒酣饮，击鼓吹笛，挥毫立就，并首创“渔歌子”形式的词。词牌名典出屈原《渔父辞》，“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渔父对屈原的劝告。张志和《渔歌子》有五首，其中第一首写道：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归”这里无疑是说归于官场。而进入仕途，正是当时士大夫的理想生活。其第五首云：

**青草湖中月正圆，**

**巴陵渔父棹歌连。**

**钓车子，橛头船，**

**乐在风波不用仙。**

钓车子是指钓竿把上挂的丝卷车，橛头船大概是钓舟的一种。其诗歌咏风波之乐，胜于为仙。《西吴记》以《渔歌子》为张志和与湖州刺史颜真卿、陆羽、徐士衡、李成矩等唱和之作。但颜真卿、陆羽等人的作品今已不存。只有张志和之兄张松龄的和诗留存至今。其兄希望俊才之弟能宏扬家声，为其建家，欲其定居，其词曰：

**乐在风波钓是闲，**

**草堂松径已胜攀。**

**太湖水，洞庭山，**

**狂风浪起且须还。**

这里体现了兄长的担心。宪宗欲求志和《渔歌子》真迹而不得。宰相李德裕亦赞其“隐而有名，显而无事，不穷不达”。

# 湖州刺史颜真卿

隐士到底以何为生呢？有一点令人挂心。皎然这样的出家人，隶属僧团，所属明确。或为住持，或游方乞食。而张志和则家境殷实，兄为筑室，不会为食所困。然而弃儿陆羽不会有这样的运气。

隐士行俗务，这固然可笑，但什么都不做而能够生存，则更是荒诞。不知指导茶艺是否收费，而提出建议、收取礼金的情况，可能还是存在的。陆羽定有上好的茶叶，仅凭饮茶不能生存，故陆羽可能会将好茶叶赠与懂茶之人，而收取薪、米、盐、菜等生活必需品作为回报。收集良茶，可能就是陆羽的生计。考虑到这点，陆羽现存唯一的诗中提到剡溪就不奇怪了。剡溪是名茶的产地。虽然《茶经》中列举茶产地时未列剡溪，但《茶经》“七之事”条引六朝时期的《异苑》：

**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毎饮辄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冢何知，徒以劳意。”欲掘去之，母苦禁而止。其夜梦一人云：“吾止此冢三百余年，卿二子恒欲见毁，赖相保护。又享吾佳茗，虽潜壤朽骨，岂忘翳桑之报？”及晓于庭中获钱十万，似久埋者，但贯新耳。……**

值得注意的事，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剡县。此外，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以“越人遗我剡溪茗”开头，可见剡溪确是名茶的产地。陆羽从湖州远入剡溪山中，正是为了寻求名茶。剡县今名嵊州，至今仍以产茶闻名。茗与茶虽大致相同，但《茶经》中以早采之茶为茶，晚采之茶为茗，而加以区分。陆羽是自尊心甚强的人，俭德的背后，是自尊心的支撑。他的生活并非容易，更缺乏安定。

陆羽写下自传的十年后，湖州来了新任刺史，这就是安史之乱时组织勤皇义军并且以书法闻名的颜真卿（709—785）。他关心地方上虽不至穷乏而生活不定的文人隐士，欲使其获得固定收入。

大概在这个时候很难考虑修撰《地方志》，但颜真卿策划编修了《韵海镜原》这样一部大著作。这大概是从古今文献中搜寻佳句，以韵分类的辞典。清代七十六位学者历时八年编修的著名的《佩文韵府》一百零六卷及《拾遗》一百零六卷卷，规模大概与此相似。说“大概”，是因为颜真卿的《韵海镜原》三百六十卷虽已完成，但并未留存至今。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参加其中的文人会在一段时间内，以报酬或研究费的形式获得有保证的收入。陆羽和皎然都参与了这一工作的策划。

州长官名刺史，唐代的州常常分合废立，但大体上全国有三百个左右的州。但州也有不同等级，既有左迁官才去的州，也有大家都争着要去的州。苏州、杭州的刺史，甚至与中央的阁僚地位相当。

唐代的州分上、中、下三等，上州刺史三品，中央政府的丞相从二品，各部尚书（阁僚）正三品，各部侍郎正四品上。上州刺史位于阁僚和次官之间。湖州是富庶地区，当然是上州。

颜真卿大历七年（772）九月被任命为湖州刺史，翌年正月赴任，其时六十五岁。此前，他已任阁僚，五十六岁任刑部尚书，封鲁郡公。为人刚直，上司不正，亦严厉弹劾。第二年因反对宰相元载而被贬峡州别驾。如前所述，别驾是刺史的副手。峡州位于湖北宜昌西北。接着，他又任吉州和抚州的刺史。抚州是江西临川。湖州虽比抚州条件好，但颜真卿的内心恐怕仍渴望返归朝廷。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年事已高，他也向往着悠然自适的生活。他虽然在湖州只有五年，但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中，湖州时代可谓是最为幸福的时期。他与陆羽、皎然、张志和等文人可以快乐地聚会，以《韵海镜原》编修会的名义会饮作诗。有时候也和知心的朋友们一起游山玩水。有一次，大家一块去杼山游玩，陆羽于此折青桂花赠颜真卿。皎然之寺及陆羽的住处似亦在杼山。特意赠花说明其时颜真卿并未同行。

**群子游杼山，**

**山寒桂花白。**

**绿荑含素萼，**

**采折自逋客。**

这是颜真卿一首诗的前半部分。“逋”是逃的意思，“逋客”是指逃世的隐士。诗中的折花者是文雅的逋客陆羽，而“群子”意思相当于“诸君”。

杼山这个地名似乎今已不存，颜真卿的其他诗里还有题为《题杼山癸亭》的诗，其自注云：“亭，陆鸿渐所创。”但其诗中作“三癸亭”，看来“癸亭”是略称。诗云“歘构三癸亭，寔惟陆生故”，可见此亭是颜真卿为陆羽而建。他不仅为陆羽提供了《韵海镜原》编修的工作，还给他提供了居所。三癸亭之名是因癸年癸月癸日建造。颜真卿湖州刺史任上的癸年只有其到任的大历八年（癸丑年），三癸亭应为其年癸卯月癸亥日建。赴任之初即造此亭，值得注意。

三癸亭大概是颜真卿以私财所造。作为隐士的住处，未必豪华，但借《韵海镜原》编修之名，用公费建造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公费私费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唐代公私之分可能并不那么严格。颜真卿的政敌元载最后被处决，其财产甚多，仅胡椒即有八百担。

州刺史应有保护高名之隐士、文人的职责。隐士、义人在刺史辖区穷迫而死，刺史亦颜面无光。但各人在文化上的投入当然是不一样的。颜真卿自己就是个大文士，所以对于文化事业远比他人热心。这是陆羽的幸运。而《茶经》已在上元二年（761）完成，这在陆羽的自传中列举自己的著作时已经提到。这早于颜真卿赴湖州任十年，所以颜真卿可能早已读过这本书，并引起他的共鸣，故其在赴任初期，就迅速地为陆羽建立了三癸亭，以表达对他的敬意。

《韵海镜原》完成时，当然会有贺宴。在这次风雅的聚会上，作为主人的颜真卿作了一首五言律诗，但今已不存。然而和其诗韵的皎然的诗仍然留存下来。皎然的诗文奉敕留存，这与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的帮助有关。对于颜真卿与陆羽的友谊他当然是非常了解的。这首《五言奉和颜使君真卿修韵海毕州中重宴》写道：

**世学高南郡，**

**身封盛鲁邦。**

**九流宗韵海，**

**七字揖文江。**

**借赏云归堞，**

**留欢月在窗。**

**不知名教乐，**

**千载与谁双。**

据说颜真卿是《颜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531—590？）的后裔。颜氏原为琅邪人，南迁仕于南朝，居江陵。“世学高南郡”指的就是此事。第二句是指颜真卿本人被封为鲁郡公一事。皎然极赞《韵海镜原》编修之功，广集资料，乐在其中，千载无双。

唐代的诗歌经常重收于两人甚至多人的诗集中，所以很难判断到底是谁作的诗，我且称之为“徘徊诗”。《全唐诗》中有一首诗同收于颜真卿和皎然的诗集中。在颜真卿集中题为《僧皎然赠》，在皎然诗集中题为《奉和颜使君真卿与陆处士羽登妙喜寺三癸亭》。使君是指地方长官。一首诗同收各处，是因为在同一地方所作，分不清是谁的作品。从皎然诗的题目可以看出，这首诗也提到了陆羽。

**境新耳目换，**

**物远风烟异。**

**倚石忘世情，**

**援云得真意。**

以上是这首长达二十二句的诗中的一部分。颜真卿当时全国闻名，安禄山叛军进攻洛阳，河北官员望风而降。唯平原太守颜真卿和其从兄常山太守顔杲卿高举勤王之旗，奋起反抗。城破后杲卿力尽被俘，引至禄山前，犹骂其反叛。颜真卿独守空垒，奋力抵抗。次年放弃了平原郡，急行至凤翔的行在所，朝见肃宗。一族之悲，举世怜之，国民英雄，举国颂之。

颜真卿孚于人望的另一原因是对抗权臣，决不妥协。安禄山之乱前，在中央政府一路不断升迁的颜真卿被流放为平原太守，原因是为杨贵妃同族的宰相杨国忠所憎恨。那么为何遭受憎恨？那是因为他不愿阿谀奉承之故。

颜真卿驰参凤翔的行在所之后，被任命为宪部（原刑部）尚书，又兼御史大夫，这是一个要职，相当于法务部长兼检察总长。但半年后，又因言语不和宰相之意，被调到外地任冯翊太守，后历蒲州（山西）、饶州（江西）、升州（江苏）地方职务。宰相与其说是嫌恶他，毋宁说是害怕他。

颜真卿曾弹劾武部侍郎崔漪醉酒上朝，谏议大夫李可忌朝会不肃，这两个人最后被贬职。肃宗长子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代宗）为收复长安，率二十万大军从凤翔出发时，步行走出木马门乘马，因门内除皇帝以外皆须下马。而侍从长管崇嗣先于广平王上马，被颜真卿弹劾。为此，肃宗向他解释说：“朕儿子每出，谆谆教诫之故，不敢失礼。崇嗣老将，有足疾，姑欲优容之，卿勿复言。”于是把奏状还给他。

颜真卿还指出，在长安收复后的告庙文中，没有写上皇（退位后留于蜀地的玄宗）之名。肃宗以其为名儒，深达礼体。长安太庙毁于叛军，颜真卿上奏说：“春秋时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既为盗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但未被接受。《旧唐书》有“宰相厌其言，出为冯翊太守”的记载。大概大家都在想，眼下就要返回长安了，有这么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跟在身边，实在难受吧。别说宰相，也许就连肃宗也会拿他没办法。

虽然新旧《唐书》的《颜真卿传》中都说太庙遣使之请未被接受，但两书本纪中皆有肃宗行哭礼的记载：

**上素服向庙哭三日。**

因此他的意见实际上还是被采纳了。

颜真卿所重的无非是礼法，例如不得带酒上朝，廷宴喧骚，乃至祝文守式，礼仪尊典，都是为了遵守礼法。

因为是在行在所，万事都比在长安时来得疏略。凤翔的宫殿非常简陋，远远比不上长安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长安的宫殿本身便静肃宽广，环境森严，即使干咳一声，也都能听见。而凤翔的行宫大概是由刺史官署临时改建而成，本来就不是举行庄严的仪式和朝会的地方，自然言行举止便较为随便。非但礼仪，文书、仪式等一切从简。非常之际，难以责备，大家一定是这么认为的。

与之相反，颜真卿似乎以为，正是在这非常时期，才更应该控制涣散的人心。涉及费用之事，固可从简，但正礼守式，无关费用，必须遵守。

从凤翔时期的颜真卿的态度，似乎可以隐隐约约地窥见他与茶的关系。

在豪华的场合是不饮茶的，只有在简陋狭窄的地方才饮茶。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守礼。肃宗云其“深达礼体”，正是谓其守礼之严。礼体驰坏，则全局皆崩，不仅仅关系到国家体制和政治，个人的人格亦会堕落。兹事体大，莫有甚者。但颜真卿虽如是想，宰相重臣们却对他敬而远之。

被疏远而在地方任职两年多以后，颜真卿又复归中央，任刑部侍郎，较之左迁之前的刑部尚书，下降了一级。但仅过半年，由于为肃宗信赖的宦官李辅国所憎恨，又左迁蓬州（四川），且并非州的长官刺史，而是次官长史。李辅国担心已退位的太上皇玄宗复位，故将之由兴庆宫迁到太极宫。兴庆宫靠近长安西面的春明门，经春明门上朝的官员经常向上皇问安，故李辅国特意将玄宗迁到与外界隔离的太极宫。此时颜真卿率百官问上皇起居，李辅国以其非己类，左迁其官。

宝应元年（762）十二月，颜真卿重返中央，任户部侍郎，很快又升为刑部尚书。但在任不到四年，由于与宰相元载对立，又被外放。此时已是代宗时期，代宗的宠臣元载令各部长官的上奏须通过宰相奏闻，其目的是将对自己不利的上奏搁置起来。颜真卿对此举表示反对，元载自不愿让颜真卿这样的刚直之士在中央担任要职，故于永泰二年（766）将颜真卿处放陕州（湖北），后经吉州、抚州二任，而到湖州刺史任上。

大历十二年（777），元载伏刑，颜真卿再还中央。而此时他已经经过了十一年的地方官生涯，其中最后的五年是在湖州刺史任上。回到长安以后，他历任刑部、吏部尚书，最后官至太子太师。但是，在我看来，他最好的时光是在湖州时期。他从湖州还归长安时已经六十九岁了。刚直的颜真卿大概决意继续在朝廷为国为民效劳，此后直至七十七岁，为国家壮烈捐躯。他没有在湖州同交心之友陆羽、皎然一起隐居，真是令人遗憾。

不过，我总觉得陆羽所创的茶文化的体系，颇受颜真卿人格之影响。颜真卿在凤翔行在所展示的是与茶之“俭德”同道的理想。他在赴任湖州之初，即为陆羽建三癸亭，这不是意味着颜真卿也将茶的理想等同为自己的文人理想呢？

颜真卿任平原太守时，集清河、博平两郡之军，在堂邑大败安禄山叛军中的袁知泰部。其后，北海（山东）太守贺兰进明亦举勤皇义军，颜真卿遂将自己的功绩全部让给贺兰进明，此举史家评为“宽厚”。颜真卿让功于贺兰进明，其目的大概是期待各地义军继起。为他人而引身相让确为“俭德”，但让功给根本没有参加堂邑战斗的贺兰进明，实在是“过度”的俭德了。俭德用“过度”来形容并不相称，只是那种让功的行为构成了一种象征。

“过度”非常适于描述颜真卿的理想，然而过度太多，又使其理想与现实出现矛盾。对于颜真卿本身而言或许无所谓。平原的部队为了实现太守的理想而战，似乎辛苦劳累也还顺理成章，但清河和博平的部队本非颜真卿属部，却因他的让功而所得恩赏极薄。

颜真卿左迁不断，恐怕与他的这种“过度”的俭德有关，因为他的理想拒绝与现实妥协。

颜真卿的经历很辉煌，但他是个特殊的人物，在现实世界中的存在感很薄弱，只有在书和茶的世界中，才能映衬出他的清晰形象。从他的书法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知他的存在。我们知道他和陆羽的交友，而感觉到他将其理想寄托在饮茶的过程中。

喜爱书法的人都知道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这是他在抚州刺史任上的作品。《八关斋会报德记》署名为“前抚州刺史”，故为其转任湖州前的作品。赴任湖州之前，颜真卿曾到过洛阳，并作《与蔡明远帖》。从此时的书法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与茶结缘以后的颜真卿的心情。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竹山堂连句》，据说是颜真卿于大历九年（774）春三月所誊写的湖州潘氏竹山书堂联句会参会者的联句。亦有人认为这不是原本，而是宋人的临本。在十八人的联句中，开头的是颜真卿的两句：“竹山招隐处，潘子读书堂。”紧接着是陆羽的诗句：“万卷皆成帙，千竿不作行。”对于在湖州隐居的陆羽而言，颜真卿任刺史是一件大事。参加《韵海镜原》的编修，促使陆羽考虑“诗和语言”的问题。从古今诗中集其名句，以韵分类，是一种解析文学作品的工作。《韵海镜原》现已不存，无法知其形式，但可据类似的《佩文韵府》类推。如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的承句“千里江陵一日还”分为三个部分：“千里”、“江陵”、“一日还”，分别按最后一字的韵目分类，归入“纸”、“蒸”、“删”三韵。“里”分在“纸”韵当中，同韵还有与“紫”、“指”、“裏”、“美”、“耻”等同韵字相关的复合词，如曹植《洛神赋》中的“淑美”、李白《送别诗》的“称美”等词语。

陆羽通过茶追求生活的美，这是一种人格化的把握，也就是综合把握的方式，依赖于直观。而颜真卿分配给他的任务则是一种分析的工作，这种从细部入手的工作方式和陆羽以前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这可能更加磨砺了陆羽的审美意识。

皎然的五言排律《春陪颜使君修〈韵海〉毕东溪泛舟饯诸文士》云：

**研精业已就，**

**欢宴惜应分。**

作为编修的一员，陆羽当时也应在东溪的船上。

《韵海镜原》是颜真卿年轻时代起的夙愿。在赴湖州任前，他已经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进入整理阶段。被选入编修工作中的十几名文士在东溪泛舟欢宴，召开送别会。这里既有陆羽这样的本地文士，可能也有远地招聘来的文士。编修既毕，不得不分别了。不仅编修工作结束了，颜真卿也不得不离开湖州了。因致其左迁的元载伏诛，他重返中央的障碍已经清除了。元载醉心权术，已经忘记了自己权力的来源，专横日甚，这使代宗亦感不快。最后，元载被以反逆的罪名逮捕，于大历十二年（777）三月处死。其妻子及同党亦被诛杀。只有与其深相结托的王缙，因年事已高而被贬谪。这个王缙就是早逝的大诗人王维的胞弟。他是有名的佛教徒，同时也以受贿闻名。同年九月，颜真卿复任刑部尚书，离开了湖州，时年六十九。他虽以陶渊明为理想，但现实中不能归隐田园，而湖州时期可能是与理想最为接近的时期。颜真卿有一首题为《咏陶渊明》的诗：

**张良思报韩，**

**龚胜耻事新。**

**狙击不肯就，**

**舍生悲拖绅。**

**呜呼陶渊明，**

**奕叶为晋臣。**

**自以公相后，**

**每怀宗国屯。**

**题诗庚子岁，**

**自谓羲皇人。**

**手持《山海经》，**

**头戴漉酒巾。**

**兴与孤云远，**

**心随还鸟泯。**

# 末茶兴亡

当我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到傣族民家访问时，亲眼目睹了一种奇妙的泡茶法。

这种方法是将刚从茶树上连枝一起折下的茶叶在火上稍微烘培一下，再加入热水淹泡，做法相当豪爽。虽然试着喝了一口，不过因为听说是茶，所以才觉得像茶的味道。

人类早期感受茶的味道时，大概也是采用这样的饮茶方式吧。从云南到老挝、缅甸北部的这片区域，似乎有些地方会将茶叶当作蔬菜一样食用。

那么，陆羽当时喝的是什么茶呢？想必是以抹茶为主吧。中国在三国时期以前，好像就是直接用茶叶煮水喝。这跟现在傣族人的喝茶方法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当时的茶叶是在日光下晒干后储藏起来。王褒的仆人到武阳买茶，想必就是这种茶叶吧。魏晋以后，据说普遍的做法是将干燥的茶叶压制成固定的形状，即所谓的“饼茶”。饮用时将饼茶打碎、煎炒、炙干，再用臼捣细。这分明就是抹茶。当然，把茶叶直接煮水饮用的方式也继续存在。只是隋唐以后，即进入七世纪之后，抹茶逐渐成了主流。

在陆羽的《茶经》中，列举了四饮：桷茶、散茶、末茶、饼茶。桷意为“粗”，桷茶则大概是与“屑茶”同类的茶。散茶是指与固形茶相对的叶茶，品质优于桷茶。将饼茶捣碎成粉末，盛放在瓶缶之中，大概就成了末茶了。但是，直接将叶茶而不是饼茶捣制成粉末，似乎也可称之为末茶。末茶取粉末的“末”字命名，而日本则强调捣制成粉的过程，将之称为“抹茶””或“挽茶”。以下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统一写作“末茶”吧。

据记载，末茶在唐代是主流，而在如今中国，末茶却已绝迹，完全不见踪影了。日本至今则仍有末茶。原本从中国传入，如今在中国已经灭绝而在日本依然留有的东西，其例子屡见不鲜，末茶便是其中一种。

末茶在中国被淘汰的最大原因，大概是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罢造团茶，改为直接进贡叶茶。据《明史·食货志》的记载：

**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太祖（洪武帝）以其劳民，罢造，惟令采茶芽以进……**

制造团茶需要耗费相当的劳力。以勤俭朴素为要的洪武帝，恐怕原本就不喜欢团茶。虽然标榜以节省人民劳力为由，但无疑其原因在于团茶与皇帝的趣味不合。

虽然笼统地称作团茶，但当时的固形茶与唐代已有很大的区别，这是陆羽始料未及的。倘若陆羽能够看到宋元的团茶，恐怕会将其作为违背茶道之物而大加评判吧。

宋代向朝廷进贡的团茶，价格非常昂贵，以致有人因之而随即倾家荡产。

即便同是固形茶，唐代的饼茶如前所述，经捣碎成粉末后固制成形，而宋代则将茶叶研磨成粉末。与捣碎相比，研磨后的茶叶粉末更细。经过研磨而制成的茶称为“研膏茶”。据史料记载，粉末需使用银板压制成形，银板上有圆形龙纹的模子，压制后的茶便称作“龙团”，其大小不一而足。

宋朝是尊崇纤细的时代。在文学上，相对于唐诗之雄浑风格，宋诗则显得精致。宋朝历代皇帝文化修养都很高，特别是北宋末年的徽宗，在绘画和书法上的造诣可谓是超一流的。宫廷中聚集着趣味极为考究的人。不消多说，这些人的舌头肯定对茶的味道非常敏感。

研磨过的茶叶比捣碎的茶叶更细，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然而，磨细的茶叶其味道是否因此更为上佳，恐怕未必。蒸青过的茶叶称为“膏”，将之研磨成粉，即为“研膏茶”。据宋代文献记载，“研膏茶”于唐贞元年间（785—805）由建州刺史常衮首先研制而成。而据新旧《唐书》的常衮本传，他在贞元以前便已去世。陆羽的晚年正值贞元年间，他在生前是否知道研膏茶不得而知，但研膏茶最早产于福建，唐代时似乎还不怎么普及。唐灭亡之后的短暂一段时期，福建处于地方割据政权南唐的控制之下。南唐于开宝八年（975）降宋，因此向宋朝宫廷进贡研膏茶，当是此后的事情。

随后，茶的制作日趋精良。据说到了唐朝末年，福建产制“蜡面茶”并向朝廷进贡。大概是因为这种茶制成固形，有着像蜡一样光滑的表面吧。不过，也有别的说法认为在烹煮这种茶时其表面像蜡一样熔化，故得此名。由于蜡面茶是贡品，因此必定是上等好茶。福建的贡品有橄榄和蜡面茶，而据记载，到唐末时贡品中已无橄榄，只剩下蜡面茶。

不久，又出现了比蜡面茶更好的茶——“龙凤茶”。在福建产茶区，辟出特别的地域，命名为“北苑”，专门栽培茶树，生产用于进贡朝廷的茶叶。自然，所选地域的土壤和日照等条件都是最好的。那里所出产的最上等茶叶，都要用龙凤的模型压制成团茶。

据记载，龙茶进奉给天子，天子再将龙茶赐给亲王、长主（天子的姊妹）及宰相。其他皇族和重臣则赐予凤茶。

然而，比龙凤茶更上乘的团茶又出现了。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家的书法名家蔡襄（1012—1067）在任福建路转运使（掌管租税运输的官员）期间，创制了“小龙团”并进贡给朝廷，这种茶深得宋仁宗的欢心。

蔡襄为福建仙游人，对茶产地非常熟悉，著有《茶录》一书。在他从福建上调中央任职右正言后，不时被仁宗召见咨询茶的事情，所以《茶录》也采用向天子奉答的形式。仁宗驾崩后，蔡襄这本著作出版，后来他又亲自订正了其中的错误，将内容刻在石上。大文豪、历史学家兼宰相欧阳修（1007—1072）随后为之作序。这篇序言提到，宋仁宗格外喜爱小龙团，就连辅政宰相这样的重臣也得不到小龙团的赏赐。只有一次赐给了中书省和枢密院（宋代称之为“二府”，乃政府的最高机构）的正副长官各四人，且每府仅得一个。二府八大重臣只得两个小龙团，可见仁宗确实非常珍重爱惜这种茶叶。

结果，一个小龙团被分成了四份，每个人能分到的不过是极少的一丁点儿，但却成为每个人的传家宝。获赐的八个人中，没有人当真把茶叶碾碎调饮。而是每逢宾客来访，便毕恭毕敬地取出来，供人观赏而已。这就是“传玩”，即手手相传，顺次鉴赏。

只供用手抚摸把玩，这便不能称作是“茶”了。茶是品饮之物。宋朝皇帝可将小龙团研磨成细末，欢心调饮，而对于得到赏赐的重臣而言，小龙团却不再是茶了。

欧阳修在《归田录》中也提到，两院曾获赐共分一饼；无论出价多高，都不可能得到小龙团。茶已经不再成其为茶，而成为珍宝了。

茶成了珍宝，这是有违陆羽的夙愿的。他认为茶适合于俭德之人。朴素的人与茶的本色相近。因此，将蒸青的茶叶研磨成粉末，未必就一定好于捣碎的茶叶。确实那种茶的粉末更细，但却很可能失去了质朴的本色。蔡襄在《茶录》中还记述道，宋代的饼茶多“以珍膏油面”，增其光泽。另外，贡品茶中掺有微量的龙脑（南方龙脑树的汁液），以增其香。这恐怕又剥夺了茶的“真”。而掺进异果香草，则更为恶劣。蔡襄对此提出批评，对这种趋势予以批判。这么说来，他所创制的小龙团茶中，应该不会掺杂其他异物。

这与陆羽的观念不谋而合。在唐代，也有用葱、姜、橘皮、茱萸、薄荷等煮水后添加到茶中饮用的方法。陆羽曾感叹这种风气尚未能停止。只用于品饮的茶方可称作茶。

蔡襄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创制了纯粹的小龙团。这样做倒也不错，只是小龙团变成了用钱都买不到的珍宝，有人即使偶尔得到了却舍不得品饮，这终究也很难说是真正的茶道。

小龙团已贵为传家宝，然而元丰年间（1078—1085）“密云龙”面世，夺走了小龙团茶中第一的宝座。随后不久，密云龙改名为“瑞云翔龙”。

不过，到了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又出现了“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这三种茶，比“瑞云翔龙”更胜一筹。随后在宣和二年（1120），转运使郑可简创制出“新龙园胜雪”，夺走了头把交椅。这样下去真可谓无穷无尽也！

“新龙园胜雪”的原料制作过程是，去掉经过精挑细选的熟叶的外皮，只取其芯细细一缕，将之放入清泉中浸泡，使茶缕变得白如银线。单凭上述这些，你一定会惊叹这种茶有多么了不得，不由得垂涎三尺。然而，再重新细读一下其制作方法，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陷宋朝首都开封，将钦宗及其父亲、已退位的徽宗一同带回北方，宋朝灭亡。钦宗之弟赵构南逃，不久定都临安，重建王朝，这便是南宋。中国的北半部分归入金的版图，南宋仅保全了淮河以南的地区。之前的王朝与南宋相区别，被称为北宋。

北宋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新法与旧法之间的党争削弱了国家的活力。但是，为何会出现新旧两法之间的党争呢？这是因为由于国家财政困窘，就所应采取措施的不同而划分成两大派别。再追问一句，为何国家财政会陷入困境呢？其原因纷繁复杂，但奢侈成风的宫廷生活却也难辞其咎。奢靡的作风有各种各样的表现，而贪得无厌地搜集“龙凤茶”、“小龙团”、“瑞云翔龙”、“御苑玉芽”、“万寿龙芽”、“无比寿芽”、“新龙园胜雪”等上等好茶，且为此不惜血本，这种态度可谓与亡国之苦果不无关联。这是违背了陆羽俭朴之教诲的报应。

北宋末年政府实行了“茶纲”，所谓“茶纲”是指大规模地运送进贡的茶叶。纲即是大量货物的总称。人们对“纲”深恶痛绝。这是“花石纲”所招致的恶果。

中国原本需将南方丰富的物资运往北方，以维持整体的平衡。粮食需要这么调运是无可奈何的做法。茶叶也早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小龙团”等顶级贡品，其数量非常少，而大多数茶纲本来也应该是普通老百姓使用的廉价物品。然而，徽宗这位艺术家皇帝，却执意要在黄河流域的首都开封欣赏到江南的自然风光，于是便下令搜罗北方所没有的、产自江南的名木、名花、奇岩、珍石等，将其运送到北方，这便是“花石纲”。

奇岩中最珍贵的，当数取自陆羽等人的故乡太湖湖底的石头，即太湖石。北宋时期还没有炸药，因此要从水底将岩石切断并吊运上来，实在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为了这种非生产性的劳作，官府动员了民间的劳力。逐片地剥去茶芽外皮的工作，其艰辛程度绝不亚于采运太湖石。

“纲”乃专供宫廷之御用，因而运输队伍极为飞扬跋扈，所过之处无不给当地民众带来极大痛苦。于是民怨沸腾，纷纷酝酿着起义造反。《水浒传》的故事，正是以这样的时代为背景。

到了南宋，首都位于南方的杭州，且深知前代奢侈无度的代价，因此颇为低调收敛。

一般认为，将茶传入日本的人是平安初期的僧人永忠（743—816）。在此之前，也许遣唐使和留学生会把茶当作中国的特产少量带回日本，供家人和朋友尝试品饮。而据说在唐长达三十五年的永忠，念念不忘要把唐文化移植到日本，遂将茶树的种子或树苗随身带回。

空海、最澄渡唐时期的遣唐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完成了使命回国，永忠就便乘船与之同归，于延历二十四年（805）回到日本。最澄也同船返回，而空海则在长安逗留。此前，在长安的宿舍西明寺附近，永忠向初来乍到的空海讲述了三十五年的在唐生活，并给予他各方面的建议。两人可能会有这样的对话：

**——我欲带回茶树种子，因为日本国内尚无茶树。**

**——如此甚好。**

据《日本后纪》记载，嵯峨天皇弘仁六年（815），大僧都永忠在近江的崇福寺献茶。这是四月发生的事情，六月天皇即下令，在畿内、近江、丹波、播磨诸国种植茶树，每年向宫廷进贡茶叶。永忠归国十年后，所种茶树当已蔚然成林。《凌云集》收录了嵯峨天皇所作的《夏日左大将军藤冬嗣闲居院》联句：

**吟诗不厌捣香茗，**

**乘兴偏宜听雅弹。**

此外，被认为是东宫时代的淳和天皇在同时期所作的《夏日左大将军藤原朝臣闲院纳凉》一诗中有这样的联句：

**避景追风长松下，**

**提琴捣茗老梧间。**

他想到了兄长天皇的联句，将茶与琴赋入诗中。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出，虽然当时喝的是末茶，但制茶时并没有研磨，而是采用捣的方式。若据《类聚国史》记载，这首诗是“弘仁五年四月，幸左近卫大将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冬嗣闲院……天皇染翰，群臣献诗”时所作，那么其时间是在永忠献茶一年以前。

平安朝宫廷人嗜茶，这也反映在其诗文中。嵯峨天皇在答最澄《奉献诗》的诗中写道：

**羽客（长有羽翼的仙人）亲讲席，**

**山精供茶杯。**

在同一本《文华秀丽集》中，收有锦部彦公的《题光上人（僧光定）山院》的五言律诗，最后两句是：

**相谈酌绿茗，**

**烟火暮云间。**

菅原道真也咏道：

**烦懑结胸肠，**

**起饮茶一碗。**

不过，饮茶的嗜好似乎尚未传到宫廷以外。在菅原真道的建议下，日本废止了遣唐使，而流传至日本的唐风余韵便逐渐消退，原本基础薄弱的饮茶也在不知不觉之间日渐衰微。

茶在日本再度流行，应归功于荣西（1141—1215）。他曾两次渡海赴宋，第二次是从后鸟羽天皇的文治三年（1187）起前后大约五年。当时中国处于南宋时期。日本各地的茶园肯定也都荒芜了。大概荣西重新带回了茶树种子和树苗吧。

从平安初年永忠回国，到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的前一年荣西归来，岁月流逝了三百八十六年。

永忠归国的时候是唐贞元的最后一年，正巧也是人们推断的陆羽去世的同一年。质朴的茶风在那个时代蔚然兴盛，平安朝的宫廷人士亦是如此，田园牧歌般的捣茗声，声声入耳。此后，中国的茶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宋朝的历代皇帝对茶叶“精”无止境的追求，产生了以“新龙园胜雪”为最高峰的许多绝代茶品。这是过度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俭德之心丧失殆尽。

可以说，北宋便是亡于这种奢靡的心态。南宋必定对此进行了反省，不会像前朝一样索求无度。北宋时期有许多关于茶的著作问世，而南宋则没有什么重要的茶书。南宋虽不至于恢复唐代的质朴，但与北宋相比，应该有所返璞归真。荣西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渡海到达南宋，拜访了茶的产地浙江的各个寺庙。

荣西参谒了天台山万年寺的虚庵怀敞禅师。当年陆羽为了寻访名茶，曾数次到过剡溪这处天台丛山怀抱的地方。后来怀敞禅师移居天童山，荣西亦随同前往。

天童山也是道元参禅过的寺庙。几年前，我曾到访此处，当时建起了一座全新的道元纪念碑。不过这座寺庙与荣西的渊源也很深。荣西回到日本后，还送来日本的名木，供寺庙修复千佛阁使用。天童山位于明州，陆羽曾记述道，浙东数越州的茶最佳，其次为明州。不过，这个地方所出产的太白茶，到了元朝才变得非常有名。

荣西掌握了在尊崇朴素之风的禅寺品饮朴实的南宋茗茶的方法，回到日本。

当饮茶在日本日渐式微之际，正值中国北宋所谓的狂乱时期。就像为了避过这段时期的奢靡之风一样，到了荣西才引进安详而富含深意的茗茶。由于佛教已经渗透到平民之间，荣西所带回来的茶风便不会像平安时期那样后继乏力，乃至消亡。

南宋灭亡，随后是延续不到一个世纪的元朝，紧接着是汉族所期待的明王朝的建立。这是1368年的事情，时逢日本的南北朝时代——南朝为长庆天皇，北朝为后光严天皇。

与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相比，汉族人建立的明王朝并非截然不同的政权。从历史上看，明朝也继承了元朝的一些特点，常常显露出元朝的某些性格。明代人具有尚武的精神，尤其蔑视个性的软弱。明朝是重农主义的国家，排斥商业。农民可以穿着丝绸，而商人则不得如此。

朴素受到尊崇，而奢侈则遭受敌视。必须排斥北宋式的风气——徽宗皇帝所代表的艺术考究。

知道了明朝的这一基本风气，那么也就能够理解朝廷为什么会废止了末茶，取而代之以叶茶作为贡品了。他们希望回归到饮茶的初期，连唐人陆羽的时代也要超越，更遑论北宋了。茶叶直接煎煮后品饮，这种极为质朴的品饮方式成为主流，重新流行起来。

到了明朝，末茶便在中国衰亡了。而在这段相当于足利时代的时期里，荣西当年从南宋寺院带回日本的末茶，逐渐流行起来，迎来了黄金时代。

末茶在中国正要走向衰亡，而恰恰是这个时候，却在日本开始盛行，真是有点讽刺意味。

下诏与末茶诀别的明太祖洪武帝朱元璋是一位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既不是像隋文帝和唐高祖那样的贵族，也不是像宋太祖那样的军阀。虽然与汉高祖刘邦颇为相似，但刘邦尚且是沛县亭长这样的低级官吏，而朱元璋相传原是乞丐。正因为如此，他对末茶才会有这样的果断之举。也许他还对宋徽宗时代那样追求高雅品位的风气深恶痛绝呢！

自陆羽在世时起，末茶便逐渐高级化，日益远离普通民众。正是有鉴于此，陆羽才不得不强调“俭德”之精神。

袁高（726—786）是唐代一位很有骨气的政治家。据《新唐书》记载，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担忧京畿田地抛荒，令各道献上耕牛，委托于京兆尹（首都长官），欲将耕牛分给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的人家。对此，袁高奏请道，拥有田地五十亩以下的人家才是穷人，应将耕牛分配给他们，每两户共用一头。德宗从善如流。袁高历任京畿观察使、韶州刺史、给事中等职，死后追封礼部尚书。《全唐诗》中仅收录了他的一首《茶山诗》。起首两句是：

**禹贡通远俗，**

**所图在安人。**

禹贡是《书经》中的一篇，是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志，所述内容为天下租税贡赋之事。这两句诗的意思是说，古代圣人之所以指定进贡物，为的是民众生活的安定，而后世的帝王却失去其“本”。忘记了原本的精神，反而由于征收贡赋而陷万民于赤贫之中。

袁高举茶为例。为了进贡茶叶，人民荒废了农耕，痛苦地采摘茶叶，而朝廷的使者则不断催促。这便是：

**选纳无昼夜，**

**捣声昏继晨。**

整夜都能听到捣茶声，这是为了制作末茶进贡朝廷。

袁高是陆羽同时代的人。两人年龄相仿，袁高逝世在前。他感叹贡茶令人民疲敝不堪，全诗以“丹愤何由申”一句结尾。

陆羽应该读过这首《茶山诗》。

袁高在《茶山诗》中，以一句“日使万姓贫”，表达了对进贡茶叶成为一项制度后所带来后果，即贡茶之弊的愤慨。

这与茶道中的“贡茶”意义完全不同。茶道的贡茶是一种比赛，指品饮不同味道的茶，然后辨猜茶的味道，决出胜负。具体而言，这种游戏是将三种茶各包四服，先分别喝掉各一服。十二服中饮了三服，还剩九服。然后再加上另外一种茶，凑成十服，供大家品饮竞猜。相传孔子的弟子子贡是闻一知二的人，即推理的高手，因此他取名为“贡”。贡茶又名“十服茶”。

唐的“贡茶”，“贡”乃“贡品”之意。由于是向天子进贡，因此非得要上等的茶不可。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最好的茶运送到长安，据说其绩效事关地方官的仕途。

在陆羽所居住的湖州及其西北相接的常州之间，是名茶的产地。吴兴西北方向二十多公里是长城县（今长兴县），县内顾渚山是著名的产茶地。从此处再向北沿着太湖进入常州，到达义兴县（今宜兴），有名茶阳羡茶。

据《苕溪渔隐丛话》记载，陆羽看到这些地方所产茶叶冠绝各方，因此进言“可向皇上推荐”。常州刺史李栖筠听闻此言，遂向朝廷进贡茶一万两，这便是贡茶的肇端。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陆羽也需对贡茶负有一部分的责任吧！陆羽当时的想法一定是很纯粹的，认为如此绝妙的茗茶，无论如何也要献给陛下品尝，因此才提出进言。然而，一旦将贡茶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事态便陷入狂乱的境地。地方官为了升官晋爵，挥鞭驱赶民众采茶。这是一种夫役，民众拿不到工钱。他们可能还宣讲道，你们该觉得采摘贡茶是一种光荣的义务。酷吏层出不穷，不少民众只好选择逃亡。袁高在《茶山诗》中写道：

**我来顾渚源，**

**得与茶事亲。**

顾渚山设有贡茶院（制茶工厂），袁高曾到这里亲自参加过茶的生产，因此对实际情况非常了解。

贡茶从大历五年（770）才开始，但茶向精致高级化的发展，则从这个时候便已经露出端倪。而另一方面，茶的平民化也在向相反的方向推进。一斤的茶叶中才能挑选出一钱的高级茶，与碎茶相比真是千差万别。

唐朝政府从建中三年（782）起开始课征茶税。此后茶税又几经废立。向奢侈品征税是理所当然的，而将日常生活必需品纳入税收范围则实在是苛政。茶具有奢侈品和必需品的双重属性，因此，茶税便免不了反复废立。

到了宋代，像前面所述那样的茶的高级化永无止境，而励行朴素之风的明太祖实施新政，脆弱的末茶则不堪一击，彻底灭绝。

“一击”这样的形容确实恰如其分。实际上，在此以前就有散茶，即蒸青后干燥的茶叶，用热水冲泡饮用。但散茶有臭青味。到了明代，主流的制茶法首先将茶放在锅里炒，使冲泡的茶更好喝。有人认为这也是导致末茶走向衰落的一个原因。在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当时似乎还零星残留有末茶，但不久也消失了踪影。纵观历史长河，名噪一时的“新龙园胜雪”也不过就是南柯一梦。

# 寻觅名茶

陆羽为寻觅名茶，想必遍访了各地。他从竟陵迁居湖州，恐怕也是由于湖州附近出产名茶的缘故吧。

被尊为贡茶之始祖的顾渚茶，其产地便在湖州辖区内。这里的茶用于进贡可能最初是在唐代，但在地方志中可以见到记载，这里的茶在五世纪的南朝时期已经用于进贡。

顾渚山距离湖州只有一天的路程，因此陆羽一定经常前往。他在《茶经》中写道：

**野者上，园者次；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牙者次；叶卷上，叶舒次。**

野生茶最佳，因此只能自己四处寻找。阳崖是指日照良好的山坡，但也不能终日遭受曝晒。最理想的是附近有树林，有适宜的树荫遮挡。

湖州顾渚山的上等好茶称作“紫笋茶”。色紫，形状像竹笋，故为最好的茶。

陆羽的莫逆之交皎然有诗题为《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唐代的丹阳县在今江苏省镇江市南部，距离湖州颇远。这首诗讲的是，皎然来到这里，听说陆羽在此，虽有寻找却未能相遇。皎然可能是为所属教派办事，来到这里。而陆羽一定是为了寻访名茶而逗留在丹阳。

丹阳这个地方当时住着诗人皇甫冉。他生于甘肃，因喜欢丹阳而迁居至此。他原本过着悠然自得的生活，后因张九龄举荐，走上仕途。其弟皇甫曾也是颇有名气的诗人，也住在丹阳。皎然写有送别皇甫曾返回丹阳别墅的诗。皇甫兄弟与陆羽也交往甚密。

皇甫冉写过一首题为《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的五言律诗：

**采茶非采菉，**

**远远上层崖。**

**布叶春风暖，**

**盈筐白日斜。**

**旧知山寺路，**

**时宿野人家。**

**借问王孙草，**

**何时泛碗花？**

栖霞寺也写作“棲霞寺”，是坐落在南京摄山山麓的一座古寺，经后世重修，现仍保存完好。栖霞寺背后的山多出产草药，因能“摄生”，故名为摄山。

“菉”是出现在《诗经》、《楚辞》里的植物名称，字典里解释为“荩草”。其叶与竹相似，茎圆小，汁呈黄色，可作染料。从这首诗来看，菉似乎是很容易采到的草药。

而茶则不然。采茶需要攀越层层山崖，有时还不得不借宿农家。经历千辛万苦所采得的茶，恐怕只能用“王孙草”形容了。王孙草本是牡蒙的别名，这里可以理解为只是对珍贵植物的形容。

丹阳位于湖州和南京之间。想必陆羽和皇甫冉曾在此相遇。

《唐诗选》中收有皇甫冉的三首绝句，其中有一首题为《曾山送别》的七言绝句：

**凄凄游子若飘蓬，**

**明月清樽只暂同。**

**南望千山如黛色，**

**愁君客路在其中。**

曾山所在何处不详，而这首诗是诗人送别谁的也不甚明了，不过理解为送别陆羽也不奇怪。寒地艾蒿，到了冬天则根尽脱，球状花絮随风飘散。读罢此诗，陆羽为寻觅名茶而四处流浪的形象便浮现眼前。

皇甫冉历任无锡县尉、王缙（王维之弟）的掌书记，后成为右补阙（天子的顾问），出使江表（江南），卒于家中。他在五言绝句《送陆鸿渐赴越》的序文中写道：

**君自数百里访予羁病，牵力迎门，握手心喜。**

从序言来看，这首诗是其他时期的作品，而且可能是皇甫冉晚年所写。

皇甫冉之弟皇甫曾比其兄早三年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名气与其兄长不相上下。皇甫曾有一首题为《送陆鸿渐山人采茶回》的五言律诗。有些版本没有“回”字，这么一来，意思就变成“送陆羽出去采茶”；如果是前者，则是送陆羽在附近采完茶回湖州的诗。

**千峰待逋客，**

**香茗复丛生。**

**采摘知深处，**

**烟霞羡独行。**

**幽期山寺远，**

**野饭石泉清。**

**寂寂燃灯夜，**

**相思一磬声。**

诗中将陆羽形容为山人。既非僧侣，亦非道士。虽然也可称为“隐士”，不过隐士给人的感觉是结庐静修的形象。而陆羽虽说隐栖在三癸亭，却时常出门寻找名茶。名茶数山崖野生者为最佳，因此陆羽专门踏进深山探寻。称他为山人是再恰当不过了。

陆羽所著《茶经》共十章，其中第八章篇名为“八之出”，正是论述茶叶产地的部分。

在第八章的最后，陆羽写道：“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

对奢侈和精致的追求无以复加的北宋时期，茶以福建出产的为多。出产顶级贡茶的北苑，位于福建建安（今建瓯县）东部凤凰山的山麓。然而，在陆羽的时代，此处仍属“未详”之地。

当时福建还不是人所熟知的茶之产地。为觅名茶而云游四方的陆羽，也未曾踏足此地。

皎然有一首诗题为《送清励上人游福建》。往来于湖州和福建之间的人不少，想必陆羽得到的福建茶便是这些人送给他的吧。

在陆羽的时代，一定还没有希望考证茶的原产地的想法，茶被笼统地称作“南方嘉木”。

关于茶的原产地，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产于长江和湄公河上游，也就是四川、云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中国东部至东南部地区。也有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正确。英国人曾经提出茶原产于印度的阿萨姆。1826年在阿萨姆发现野生茶树，于是便有此一说。然而，这种说法的前提是，印度人原本没有喝茶的习惯，茶树只可能是野生的。但是，印度人喝茶至少在十七世纪的文献中就有所记载。在大英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室里，存放有东印度公司所属的外科医师塞缪尔·布朗（SamuelBrown）和爱德华·巴尔克利（EdwardBulkeley）二人于1698—1702年在印度的马拉巴地区所采集到的茶树。印度似乎在相当早以前，便从中国移植茶树。因此，阿萨姆原产地说的影响逐渐淡薄。

陆羽旅途中没有探寻茶的原产地，而是为了寻找名茶。从陆羽及其友人的诗文中可以了解一部分他曾游历过的地方。可以推定，陆羽不曾踏访《茶经》第八章产地条目中那些记述“未详”的地方。不解风雅的现代人，如果说要进行茶之旅，怎么也想去探寻茶的原产地吧。

1987年，在我访问北京期间碰巧遇到了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吴觉农先生。吴先生生于1897年，当时大家正好为他举办了九十华诞暨从事茶叶工作七十周年的庆祝。

按中国的说法，吴先生过完了“九秩大庆”。先生是浙江上虞人，原名为“荣堂”，年轻时因立志为振兴祖国农业而献身，故改名为“觉农”。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现浙江省农业大学的前身）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手，后于1919年考取浙江省教育厅的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到静冈县的茶叶试验场实地学习。

原本向全世界出口茶叶的中国，由于印度和斯里兰卡茶的兴起，国内茶业衰退。再加上政治的腐败和政局的动荡，衰退进一步加剧。

茶本由留学僧人永忠和荣西从中国带回日本，而吴觉农先生却不得不赴日研修茶叶，他一定感到非常遗憾。据说吴夫人也在大约同一时期来日本留学，学习丝织品。她与吴先生一样，没有进入学校而是到工厂实习，学习古代从中国传来的丝织技术。

留学期间，吴先生撰写了两篇相当长的论文：《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前者是对阿萨姆原产地说的反驳，虽然流露出民族主义的情绪，却也不乏科学的论据。现在，针对中国原产说的反驳说法几乎毫无影响力了，但在当时的日本也存在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说，认为在中国传过来以前，就有野生的茶树了。据说这对年轻的吴先生造成了很大的刺激。

吴觉农先生从日本回国的时间是1922年，《茶树原产地考》在同年的《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距今已有六十六年了。在北京一家茶业公司的接待室，我见到了九十岁的先生。我冒失地问道：“茶树的原产地在中国，那么具体是中国的什么地方呢？”先生毫不见怪，笑容满面地作答：

**我认为是四川……**

吴觉农先生把自己所著的书签字赠送给我。书名是《吴觉农选集》，这是为纪念先生九十寿辰而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结集出版的。编集委员会在序文的末尾写道：

**衷心祝愿吴先生老当益壮，年逾“茶寿”！**

那么究竟何谓“茶寿”呢？经询问，才知道是指一百零八岁。草字头是两个十，即二十，下半部分可念作“八十八”，加起来便是一百零八岁。

《吴觉农选集》共收文章六十一篇。关于四川原产地说，分别在《四川茶业史话》和《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两篇文章中展开。这两篇文章均发表于1978年，与五十多年前的《茶树原产地考》相比，论述得更为详尽。

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军师，于公元前1050年前后灭殷商。据《史记》记载，在发动征讨的前夕，周武王犒劳来自西土的兵将，号召赠戈。文中列举了各民族的名字：庸、蜀、羌、髳、微、纑、彭、濮。蜀人肯定是从四川远道而来的部族。他们大概不会两手空空地到来吧。

《华阳国志》中有关他们以茶为贡品献给周武王的记载，但这件事在《茶经》中并无交代。吴觉农先生在论文的开头提到这一点之后，便展开其论述。《华阳国志》成书于四世纪，而所记载的事情却是关于公元前1050年殷周革命的故事。

有学者认为，殷商灭亡的原因在于酗酒。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殷代青铜器，几乎都是酒器。周灭商后，担心将来自己也会因酒丧国，于是对国人发布了戒酒令。在当时的诏敕集《书经》中，有篇《酒诰》，相传为周公所作，里面提到：

**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

这是对酒的祸害进行严厉声讨。接着记述道，对群饮者严惩不贷，抓捕后送至京城，“予其杀”。大概是由于殷人嗜酒过度，周人竟然用死刑禁酒。若果真如此，则必须另有东西可替代酒。

吴先生考虑到了“以茶代酒”的可能性。在讨伐殷商的时候，蜀等八个部落向周献茶——这段四世纪的记述，正与这种可能性相对应。

吴先生的论文并不只是停留在这样的文献推理层面，他还以气象和植物学的科学根据为基础进行了阐述。不过这一部分的专业内容过于艰深，在此从略。

第二篇论文则将范围从四川扩展到中国的西南地区，论证了该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仔细想想，其实四川、云南的划分，主要是为了行政上的方便。植物是不会受限于这种界线的。这篇论文在中国茶业学会于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的研讨会上发表，比《四川茶业史话》更为专业。

包括蜀地在内的中国西南部地区是茶树的原产地，这一点大概陆羽也曾作过推测吧。不过，我们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曾到过蜀地。陆羽的活动中心在湖州，周边的名茶不少。对他而言，寻访名茶比探索源头更为重要。

是否到过当地暂且不表，陆羽对四川的茶倒是非常熟悉。在《茶经》中，他对剑南道的茶进行了排名。

唐朝的“道”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稍有出入，但最早全国被划分为十道。道大于现在的省。不过，道并非行政区划，而是监察区域。剑南道包括剑阁以南的四川全境及云南省的一部分。昆明当时叫昆州，也在剑南道中。

陆羽推断，剑南道的茶以彭州出产的最佳。其后顺次为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书中附有相当详细的注释，例如陆羽指出，蜀州青城县丈人山所产的茶与绵州的不相上下。出产最上等好茶的彭州位于现彭州市附近，成都以南约六十公里。倒数第二的眉州位于如今的眉山市，紧邻着最上等茶的产地彭州。现在的彭山州市和眉山市之间，相距不过十数公里。

1980年4月，我在从成都到乐山市的途中，经过了彭、眉的产茶区。在《中国的历史》第二卷开头，我把当时的体验记述下来：

**当我在四川省旅行，从成都去峨眉山的途中，经常看到茶馆的招牌。茶园、茶社、茶庄、茶铺等，名字五花八门，却都是喝茶的去处。与其他地方相比，我感觉四川的茶馆特别多。**

**乡间的茶馆边上，大多长着枝繁叶茂的大树。究竟是先有茶馆再种树，还是先有树再开茶馆？我在车里百无聊赖，想着这个问题……**

根据当时的备忘录，从成都南下到乐山市车程为四个小时。据说清明（4月5日）前后采摘的茶叶是最好的，那天是4月24日，刚刚过了采茶的最盛期。

1987年4月8日，正好在清明后，我踏访青城山。从成都向西北方向出发，前往因都江堰而闻名的灌县的西部，路上只需大约一个半小时。茶田随处可见。这里正是陆羽所说的蜀州青城县丈人山。从其环境氛围来看，俨然一派道教本宗圣地，不过现在已经完全成为旅游景点了。国内游客似乎比外国游人更多。

青城山是中国著名的方士张道陵和范长生等人所隐栖之地。比陆羽年代稍晚的方士杜光庭也曾到此修行。

有这样一句俗语：“剑阁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然而，青城山如今何幽之有？它已淹没在一片拉游客乘轿的喧嚣声中。

丈人山大概得名于这里的道观丈人观。曾在此地做官的南宋诗人陆游（1125—1210）有诗名为《丈人观》或《题丈人观道院壁》。山上另外还有长生观、储福观等。储福观是唐睿宗之女玉真公主修行之处，陆游在此游览时留下了诗篇，其中有两句是：

**绿藓封茶树，**

**清霜折药花。**

我时隔七年分别拜访的乐山和青城，位于成都南北不同方向。以成都为基点，测量两地之间的距离，大约是二百公里。

这两个地方似乎完全不同，但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这两个地方都在岷江边上，一川相连。

乐山市东部的凌云山是青衣江和大渡河汇入岷江之处，在河的东岸雕刻了一座巨大的弥勒佛菩萨的座像。这座巨佛高七十一米，超过了巴米扬的石佛，是全世界最大的佛像。从唐代开元初年开始雕刻，至贞元十九年（803）始告完成，大约用了九十年。完工那一年是日僧空海入唐的前一年，正值陆羽晚年。

对于古人而言，有河川通汇的土地一定会感觉比实际的地理距离更近一些。各地物产也可以经由水路运输。岷江在宜宾附近汇入长江，再经泸州市和重庆市，进入三峡。

陆羽在湖州修建居所，也许其行踪所至仅限于江南地区吧。然而，因为有长江的水路相连，他应该感觉到四川并不遥远。虽然后人认为陆羽并没有到过福建和四川，他对福建的茶“未详”，却能对四川的茶详细划分等级。

不过，对于陆羽所评定的等级，从唐代起便开始引发异议。有人抱怨陆羽遗漏了邛崃山脉的蒙山所产的名茶。蒙山位于连接青城山和乐山的岷江以西，在名山县西部，是一段绵延至雅安县的山峦。雅安县即雅州，陆羽对该地出产的茶评价并不高。乃至有诗为此打抱不平，其大意是，假使陆羽公正的话，世上第一的茶当数蒙山茶。

陆羽去世后，白居易（772—846）在三十五岁那年，吟作“茶中故旧是蒙山”的诗句。“故旧”意指过去熟悉亲切的东西，因此是不可或缺的。这句诗与“琴里知音唯渌水”相对。茶数蒙山好，琴以渌水佳，山与水相对。

蒙山之巅是五座似莲花一般的山峰。其中最高峰是上清峰，其余诸峰分别是菱角、毗罗、井泉、甘露。山上有天盖寺、永兴寺、千佛寺、静居庵等古刹。在蒙山顶上所采摘的茶，称作“蒙顶茶”。

关于蒙顶茶有一个传说。后汉的甘露普慧禅师在蒙山的顶上栽下了七株茶树。人们将其唤作“仙茶”或“汉茶”。

蒙山山顶始终雾气笼罩。据说一年当中雾天就有二百八十天到三百天。据记载，一年的日照时间只有一千小时左右。蒙山的山顶被特别称为“蒙顶”，此外其他地区也都全部是茶的产地。蒙顶茶全部进贡给长安的朝廷，陆羽也许只是品尝过蒙顶以外地区所产的茶。

陆羽是处士，即隐居不仕之人。不管陆羽多么努力希望遍尝各地茶的味道，恐怕也有处士所求之不得的茶吧。

甘露普慧禅师在蒙顶上所栽种的七株茶树，据说直到清雍正年间（1723—1735）仍然存在。那么，甘露普慧禅师的茶树是从哪里移植而来的呢？对此，有广东说、福建建溪说、峨眉山说等各种说法，甚至还有认为蒙山本身就是中国茶树的发祥地的说法。吴觉农先生在《四川茶叶史话》中提到，不少探寻茶之起源的人都来到蒙山进行调查。蒙山即便不是茶的原产地，也一定是极早期的移植地。

# 茶树王

西双版纳位于中国云南省南部，与老挝和缅甸接壤，是众多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其中尤以傣族为多，因此西双版纳现为傣族自治州。

听说那里是产茶地，我便计划从昆明飞过去。从昆明出发，搭乘螺旋桨飞机大约一个小时，便到达思茅。

思茅是清朝末年根据中法商务专条所开放的商埠。英法两国在此设置了领事馆，但由于生意惨淡，不久便关门大吉。虽然原先是以采购茶叶为目的，不料运输成了问题，只好作罢。

从思茅坐车大约四小时，便来到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首府所在地景洪县。当地人把这里称作CheLi。元朝时设置徹里军民总管府，明朝改为车里军民府，清朝设车里司，民国时期成为车里县。虽然“徹”和“车”的音调不同，一个是第四声，一个是第一声，但都是念CHE。不过，民国初年的地图，则在车里下面标注了“江洪”。当时英国人所绘地图，把这里称作KangHung。

清初在这里设置车里宣慰司，一度成为该地区的中心。不过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政府首长便改驻思茅，这里成了普洱府思茅厅车里司。

旅行前我查阅了古文献，发现这里有许多与诸葛亮有关的地名，如诸葛营、诸葛池、诸葛井、诸葛寨、孔明山、孔明塔、武侯营等。

诸葛亮在北伐曹魏前，向南用兵。这是对蜀国南方的诸民族进行以宣抚为目的的作战。

“七擒七纵”这个著名的典故，说的是孔明与南方民族的首领孟获交战，七次将之生擒，又七次放回的故事。最后，孟获感叹“明公天威（您具有如上天一般的威力）”，心悦诚服。

这是诸葛亮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进言的结果，这是非常杰出的策略。而刘备等人却认为马谡夸夸其谈，称之“言过其实”，对他心存警戒，乃至告诫诸葛亮“马谡不可重用”。不过，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进言，对南方民族进行“攻心”战，且屡试不爽，终于让孟获心服口服，为日后北伐扫除了后顾之忧。然而，在北伐征战中，因其违反军纪，诸葛亮被迫挥泪斩马谡。

从成都飞到昆明，再转机到达思茅，我作为一个旅人，不禁对一千七百六十多年前诸葛亮竟然向南远征至此感到非常惊讶。

我读清末的《续云南通志稿》，在这部洋洋洒洒的大部头著作接近末尾的“古迹”项下，看到有关宁洱县“茶王树”的记载，便在上面画线做了记号。书上说，武侯诸葛亮在宁洱城南的六座山上，各埋放了一样东西，例如在攸乐山上留下了铜锣，在莽芝山上放置了，在革登山上埋下了马镫。这六座山均是茶的产地。其中莽芝山上有巨大的茶树，为其他五座山上的植物所不及。那就是“茶王树”，相传是诸葛亮所栽种的。

我在当地听到的是，没有“茶王树”，而是“茶树王”，且地方也不在宁洱（普洱府所在地），而是在勐海县。但不管怎么说，似乎云南南部有很多巨大的茶树。而据阮福的《普洱茶说》的记载，六大茶山的名称为倚邦、架布、嶍崆、蛮砖、革登和易武。

4月11日我到达西双版纳，13日离开，只逗留了三天两夜。听到我这个行程安排，当地人歪着脑袋说：“14号开始就是泼水节了呀！”

傣历中雨水的节气，即4月20日左右是新年，由于闰月闰年的关系，这个时间也有所变动。新年最引人注目的活动，便是互相之间“泼水”。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火魔王劫走了七个女孩。女孩们用长头发绞死了魔王，回来后互相泼水，洗掉身上黏附的血迹。据说这便是“泼水”习俗的由来。

互相泼水大概是一种消灾辟邪的仪式吧。丝绸之路上也有类似的活动，唐代时传到长安，成为盛行一时的“苏摩遮”。“苏摩遮”又称“乞寒泼胡”，据说为的是祈祷寒冷。只有天气真正变冷，四季正常更迭，对作物才是最理想的。但由于这个活动流行过广，且奢华过度，八世纪初被宰相张说奏请禁止。

若与植物密切地比邻而居，你就能够切身感受到水有促进植物复苏和生长的力量。泼水仪式的发祥，或许也与这样的认识有关。

为了观赏泼水节，人们蜂拥来到西双版纳。而我却安排在泼水节开始前离去，恐怕多少有点儿奇怪吧。

但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看看采茶时节的西双版纳，尤其是想对“茶树王”一探究竟。

景洪县西边是勐海县，这里因产茶而闻名。县的中心有规模颇大的茶厂。茶树王就在勐海县的南糯山上。

我乘坐汽车，从铺砌的公路进入山道，直到前行无路。我们以步代车，沿着山坡向下走。最近可能因为茶树王也成了一种观光资源，山坡上还铺了一段石阶。周围都是茶树，以树身高大者居多。妇女们背着箩筐，正在采摘茶叶。有一些茶树看起来颇有年岁，还有一些则像老梅树那样身上长着苔藓。茶树王是这些茶树中的代表。

茶树王的枝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大概相当于日本的“指定天然纪念物”。茶树王高5.48米，树幅为10.9×9.8米，树干周长4.34米。树龄达八百余年，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就有了，相当于日本保元、平治之乱的时候。

南糯山高1800米，人们说山中的茶树王究竟是野生的还是人工栽培的，很难作出判断。也有人说可能是半野生的。虽然已有八百多年的高龄，茶树王至今仍然抽绿。

我围着茶树王，在树下转圈。

泼水节时穿着民族服装的妇女们现在换上了务农装束，正忙碌着采摘茶叶。当地的妇女擅长劳作。《三国演义》中，就描述了这样的场面：蛮王孟获之妻祝融夫人骑着卷毛赤兔马，手提八尺长标，背插五口飞刀，活捉了张嶷和马忠。似乎这个地方“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子不在少数。

南糯山出产优质的茶。据介绍，在1982年全国名茶评比会上，南糯山所产的茶叶“南糯白毫”被推举为全国名茶之一。

云南到处都有树高5米以上的茶树。据说，在勐海县的巴达大黑山（海拔1900米）的原始森林中，还有比南糯山的茶树王更巨大的茶树。由于地处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普通人无法轻易接近。而南糯山的茶树王就在公路和民宅附近，正好适合供游人观赏。相传诸葛亮在莽芝山所栽种的“茶王树”，一定比茶树王更大。

对于茶树来说，日照很重要，而如果还有其他的巨树为之提供些许树荫，便更理想了。陆羽称之为“阴林”。南糯山上发挥“阴林”作用的树或许便是樟树。樟树和茶树夹杂在一起，生长得非常繁茂。

由于我缺乏民族学的专门知识，分不清在茶树王附近采摘茶叶的妇女属于哪个民族。这里是傣族自治州，我想她们是傣族人吧。但向傣族导游姑娘一打听，我才知道自己猜错了。行政区划的名称一般冠以代表性的民族名称。例如，新疆是维吾尔自治区，但新疆境内除了维吾尔族外，还生活着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塔吉克族、蒙古族、回族等十多个民族。导游告诉我说，现在正在我们面前采茶的妇女，是哈尼族人。

在云南省境内，哈尼族的人口与傣族差不多，可能比傣族稍多。只是西双版纳傣族人更多。与之相邻的东北部的江城、红河等地区，则以哈尼族居多，自治州和自治县均冠以哈尼族的名称。

除了茶树、樟树以外，南糯山上随处可见水冬瓜树和天料木（天料木属乔木）。据说这些树木是哈尼族所栽种的。这两类树都比樟树高。就这样，哈尼族过着与树林为友的生活。那么能够想出食用树叶，或将树叶泡水饮用的，恐怕应该是这样的人吧！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在云南长期生活，是值得信赖的“云南通”。几年前，冯牧送给我《滇云揽胜记》这样一本云南纪行的著作，我读之爱不释手。书中有专门的篇章描写了西双版纳哈尼族的采茶风情。身穿红白条纹民族服装的哈尼族姑娘成群结队地一起劳动。头发上戴着的银饰，闪闪发光。不过，我所看到的并不是一群群的姑娘，而是穿着黑色务农装束的年纪稍长的妇人，一个个分散地挨着茶树采茶。完全不是姑娘的样子。也许明天就是泼水节了，姑娘们都在忙碌地做着准备吧。

根据冯牧的形容，姑娘们采茶时灵巧的双手快速操作，简直“让人眼花缭乱”。她们双手从一棵茶树移到下一棵茶树上，就像一群蝴蝶穿梭在花丛中。

说到蝴蝶，云南可真是蝴蝶的宝库。明代大旅行家徐弘祖（1586—1641）在《徐霞客游记》中，记述了云南大理泉水边上的蝴蝶奇观：四月初大树绽放出如蝴蝶一般的花朵，吸引了成千上万只真蝴蝶到来，从树上一直绵延到泉水水面，形成了一道蝴蝶“悬崖”。冯牧在书中提到，他在西双版纳沿着澜沧江（湄公河的上游）溯流而上，亲眼看到过这样的蝴蝶盛景。对此，徐宏祖用“五色焕然”形容，而当地把这种现象称作“蝴蝶会”。冯牧看到这个奇观之后，在南糯山又看到年轻姑娘们采茶，于是便想到将身穿民族衣裳采茶的女孩子比作“一群蝴蝶”吧。

观赏了茶树王之后，我们便动身前往勐海县的茶厂。

刚刚采摘下来的茶叶一筐筐地运送到茶厂，工厂的人当场称重，并用现金付款。背着箩筐来到茶厂的人，许多都是少年。傣族导游姑娘替这些少年解释说道：“今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学。”也有几个年长的妇女在场，但始终不见年轻姑娘的身影。泼水节对于她们的重要性，在此可见一斑。

勐海茶厂所生产的茶一般称为“普洱茶”。在建有机场的思茅以北大约五十公里，有一个县叫普洱县。不过，那里却并不产茶。“普洱”现在是县的名称，在清代却是府名。思茅原本和西双版纳一带，都属于普洱府管辖。因此，这些地方所产的茶，都叫做普洱茶。据《云南志》记载，唐代时当地住民已经用椒姜、桂等具有香辛性的植物与茶叶混在一起烹煮，饮用所得的茶水。这是原始的饮茶方法，不是“制茶”的过程。为了能够销售到云南以外的地方，才开始出现制茶的工艺。

普洱茶中有一种称为“紧压茶”的种类。将蒸青过的茶叶放入模具中压缩。碗形的称作“沱茶”，方形的称作“方茶”。圆饼形的则称为“饼茶”或“圆茶”。饼茶出口到东南亚，也有一小部分供应给国内的藏族。黑色的心形茶称作“紧茶”。与饼茶相反，大部分紧茶供应给藏族人饮用，而只有一小部分出口到东南亚。据说以前还有球形的，称作“团茶”，最小的像乒乓球，最大的与人的头部一般大小。

大的团茶称为“人头茶”，过去用作贡品。所选用的茶叶自然是最上等的。现在已经不再生产了，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仍保存有清代的几个人头茶。这些人头茶是过去故宫所收藏的，压制工艺精良，不但形状保持完好无损，连品质也没有发生变化。

据说清代紫禁城的习惯是，夏天饮用浙江的龙井茶，冬天则饮用普洱茶。

四川成都也是如此。而云南的茶厂，红茶的产量更多。即使从中国茶整体的出口量来看，红茶的出口量也远远高于包括乌龙茶在内的绿茶。虽然在日本流行中国茶的时候，主要是乌龙茶，但其数量也不及出口到欧美的红茶。我所参观过的工厂的仓库里，堆满着包装好的红茶。然而，虽然有大量红茶出口，但在欧美却很少看到以“中国红茶”为名的茶叶。原来是和其他茶叶相混合，成了大吉岭茶了。

红茶是经过发酵的茶叶，而乌龙茶则是半发酵的茶叶，也可以认为乌龙茶介于红茶和绿茶之间。

普洱茶属于红茶的一种。据说，在清代，紫禁城里的人将普洱茶放入银壶或铜壶中，再加入玉泉水一起煮。北京颐和园以西约四公里有一座玉泉山，山上的水自古以来被誉为“天下第一泉”。北京下雪少，听说下雪时，也有用雪代替玉泉水的。普洱茶煮好之后，加入牛奶饮用。当时由于难以大量储藏新鲜的牛奶，因此使用乳酪制品。皇族和宫女均是满人，他们原本就嗜好乳制品。据说云南边境附近的茶树王至今仍年产茶叶二百斤，而在过去，这些茶叶都运进了紫禁城专供宫里消费。

勐海县也被称为“茶城”。这里的的确确是茶之乡。另外还有“雾城”的别名。一年当中，雨天多达一百四十天到一百八十天。全年温暖如春，恒久湿润，因此茶树总在抽新芽。旧历二月所采摘的极为细白的芽芯称为毛尖，三四月所采摘的称为小满茶，六七月的则称为谷花茶。

西双版纳澜沧江沿岸的地区也是茶的主产区。这条河正是流经老挝、柬埔寨，流入越南南部的湄公河的上游，又名九龙江或湄江。

清末，当地政局不稳。其中，又以回族和汉族之间的纷争最为棘手，民族宗教问题纠缠不清，要想解决并非易事。因鸦片战争被问责而流放新疆的林则徐（1785—1850），于1847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北京朝廷期待他能够解决汉回之间的纷争。林则徐抵达云南之后，以“只分良莠，不问汉回”为基本方针，着手解决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汉族回族，但凡为恶者均严惩不贷。林则徐在前后三年的任职期间，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民族纠纷。然而，此前的汉回矛盾旷日持久，茶业也必定受到牵连，动荡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作者聂耳（1912—1935）是云南人，他在日本藤泽市的鹄沼游泳时溺水身亡。鹄沼海滨上至今仍矗立着一座耳形的纪念碑。因为这一缘故，云南昆明市和藤泽市结成了友好城市。《聂耳歌曲集》中收有歌曲三十一首，其中包括《茶山情歌》和《采茶歌》两首采茶歌曲。聂耳生长在云南，大概听过采茶歌，于是将这种情调谱写成曲。《采茶歌》的歌词如下：

**春风吹，**

**春风暖，**

**茶叶儿发芽遍山青。**

**采茶啊，**

**采茶啊，**

**毛尖、雨前和眉珍，**

**快快采，**

**不要停，**

**谨防错过好时辰，**

**快快采，**

**不要停，**

**谨防错过好时辰。**

**去年采茶数十担，**

**一家大小喜在心，**

**谁知茶叶贱似土，**

**尺布斗米贵如金。**

**捐和租，**

**逼人命，**

**饥寒交迫受苦辛。**

**春去春又来，**

**茶山年年青，**

**人人都说茶味好，**

**吃茶的人儿笑盈盈。**

毛尖前面一有介绍，而“雨前”则是谷雨（4月20日前后）之前采摘的茶叶，“眉珍”也是名茶。从这首歌曲中，我们可以看出茶的市场行情并不稳定。究其原因，既有人为的市场操纵因素，也一定有动乱所造成的不小影响，一如林则徐在诗中所悲叹的——“澜沧江外路，战骨积年寒！”

# 境会亭

中国茶叶学会的机关杂志《茶人之家》1985年第一期曾刊载了阳羡茶会成立的消息。

位于太湖西岸的江苏省宜兴，秦汉时期被称为阳羡，产名茶。位于太湖南岸的吴兴就是当年陆羽所在的湖州，尽管现在分属江苏、浙江两省，但同在太湖圈，两地距离非常近。而从茶叶产地来看的话，也可说是相连之处。如今从湖州长城县（现在的长兴）顾渚山上所采的茶也被称为阳羡茶。唐代时，宜兴隶属常州。

生活在湖州的陆羽曾经言道，应将当地所产的如此好茶贡献给天子，于是自唐代起阳羡茶便被作为贡品。由于阳羡茶要从常州和湖州采收，所以这两个州的刺史（长官）便成了贡茶的共同负责人。农历三月是采茶时节，每逢此时，两州官员便聚到两州交界的顾渚山，共同负责制茶和运送的监督工作。于是便在该地修建了“境会亭”。

到陆羽晚年即贞元年间（785—805），采茶工人达三万余人，制茶工人则有千余人。官员们将艺妓带到山上，树起彩旗，用彩色的帷幔围起来，饮酒作乐。也有人从山上下来，泛舟太湖，在画舫（颜色鲜艳的游船）内欢宴的。

当然不光是喝酒游乐，茶的进贡任务也十分繁重。虽统称为“阳羡茶”，然而最上等的茶当属呈紫色、笋型的“紫笋茶”，这种茶必须尽可能多地采集，并要尽快送到长安。作为献给皇室祭祀用和赐予近臣的贡品必须要赶在清明之前（阳历四月五日左右）送到。从太湖湖畔到长安，昼夜兼行快马加鞭的话也需要至少十日。也就是说要在清明前十天必须送出。这就是所谓的“急程茶”。

因为是要送给那些生活奢侈的官员享用，所以不管多急都要保证质量。进贡的业绩关系到这些官员的仕途。开成三年（838），湖州刺史裴史由于进贡不力而被革职。故一些想获得晋升的官员们往往在茶的品质上煞费苦心，请来茶鉴定师，听取他们的意见。为了从他们那里获得选茶指点，便在境会亭设宴款待这些专家。席间，经过多次讨论，多次试验，茶的质量便得到了不断的提高。

《茶人之家》中所记载的“阳羡茶会”组织，大概就是为了追随唐代境会亭而成立的。不过他们当然不是以寻欢作乐为目的，而是与专家们共商茶业发展大计。相对于境会亭之事，这篇报道似乎对日本的“茶道”更为津津乐道。介绍了利休茶道的四律——和、敬、清、寂，强调了茶道重视礼仪、陶冶情操和开展社交活动的方面。

“阳羡茶会”是在宜兴县政治协商会议的指导下成立的。干事会由七名积极分子组成，从中选出总干事一名，副总干事两名，负责“茶会”的活动组织工作。会员由茶爱好者组成，从各界“著名人士”中选出，预定几十名。旨在介绍茶与健康的启蒙运动，重视礼节，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活动项目繁多。集会时收取“茶费”，活动费用由会员自理。

白居易曾被任命为苏州刺史，于宝历元年（825）五月到当地上任。苏州位于太湖东北岸。任太湖南岸湖州刺史的是与白居易同年应试的崔玄亮（767—833）。邻州常州的刺史就是后来成为宰相、并在甘露之变中遇害的贾（？—835年），此人也是白居易的同年。

地方长官不可与邻州长官私自会面。因为州的行政区域较大，几个州如果联合起来的话会形成强大的势力，从而造成谋反和割据的威胁。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期间，他的好友元稹（779—831）任驻邻州越州的浙东观察使，两人只在元稹上任途中见过一面，此后两人在任期间从未会面。

此外，白居易在任苏州刺史期间，与近在咫尺的同窗崔玄亮和贾也是一次也没有见过面。然而崔贾两人却可以借工作之便公然在境会亭会面，这令白居易羡慕不已。宝历二年（826）白居易题诗《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亭欢宴》曰：

**遥闻境会茶山夜，**

**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

**灯前各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

**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

**蒲黄酒对病眠人。**

当时白居易由于坠马损腰，卧床不起，相传蒲黄酒对治疗跌打疗效甚佳。诗中第二句就描述了当时境会亭的欢宴景象。

大中十年（856）进士李郢曾作诗《茶山贡焙歌》，诗中说道：

**春风三月贡茶时，**

**尽逐红旌到山里。**

诗中还描写了平日寂静的山林里偶尔也会有热闹的场景出现：

**山中有酒亦有歌，**

**乐营房户皆仙家。**

**仙家十队酒百斛，**

**金丝宴馔随经过。**

而在这些热闹背后，繁重的贡茶任务还在进行着，这一切都没有离开诗人的视线：

**半夜驱夫谁复见，**

**十日王程路四千，**

**到时须及清明宴。**

王程是指为完成王命的路途，也就是期限。从太湖湖畔到长安，如果仅用十天赶到的话，途中必然十分辛苦。半夜里还要不停地督促壮丁赶路。虽然越早送到越好，但是要想焙出上等好茶，就又不得不等到最后。期限截止为清明。在清明的宴会上，王公大臣可以得到皇上赐予的火种，这意味着火的复苏。清明被称为扫墓节而成为一种习俗是在此后稍晚，而在中唐，清明是宫中重要的节日。茶必须要赶在这之前送达。

清明前三天开始禁火，因此也被称为寒食节。在此期间不可食用热的食物。火用的时间长了，就会认为其能量在渐渐衰弱，于是便有了换火种的传统。古时候似乎每逢四季都要换木取火。由于火在人们生活中作用很大，所以换火种也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仪式。孔子时代开始实行一年一次的改火仪式。在《论语·阳货》中，弟子宰予问孔子，服丧三年似乎期限太久，改为一年如何呢？

**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隧改火，期已可矣。**

意思是说，旧谷吃尽，新谷已收，钻隧接火之木也都改了，似乎一年之期也就够了。孔子答道，你既觉心安，就那么做吧。

由此可见，改火也是每年一次。阴历是根据月的盈亏制定的，每年比阳历约少十一天，因此第四年就必须增加一个闰月。因此根据阴历的话就会产生季节更替的偏差，对农业生产也会有影响。于是古人便根据太阳的变化，制定了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个节气，清明被列为其中之一，定于每年阳历的四月五日。虽然每年可能会有误差，但最多也不过一天。按照节气行事，季节感更为准确。一年伊始虽被定在旧历的正月，然而从实际感觉来讲，清明更像一年的开始。

从清明的命名便可以看出，这时正值晚春初夏交接之际的好时节。在这一天的仪式活动中，品茶自然是少不了的，况且此时也正是产新茶的季节。由于前几天过“寒食节”，吃的都是凉食，此时若能喝上一口暖暖的香茶，便是再好不过了。

长安人一般很少能在清明喝上新茶，而宫中却在此时可以品尝到从常州、湖州急运过来的紫笋茶，充分显示出了区别于一般庶民的优越感。宫中位居最高的当属皇上，新茶自然是先呈献给皇上，然后再由皇上赐予大臣公卿。这时除了可以享受到喝茶所带来的优越感，还享受到了“皇恩”的沐浴。因此将紫笋茶在清明前夕送达长安，是关乎地方官员仕途前程的重要任务。

进贡紫笋茶始于肃宗（756—762年在位）年间任常州刺史的李栖筠。而似乎到了贞元年间（785—805）才被列为定例，规模扩大。进贡量由原来的五百斤增加为两千斤。到了会昌年间（841—846）竟多达一万八千四百斤。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期间（773—777）适逢贡茶初期，所以当时两州长官在境会亭共同监督贡茶的情况应该尚未出现。

虽然简单地说是五百斤、两千斤，最好的贡茶都必须采自野生的茶树，这些茶树通常生长于山的斜坡上。所以采茶工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生长得差不多高、排列整齐的栽培茶树一旁一边唱歌一边采茶，而是要走在令人胆战心惊的悬崖峭壁上，找寻散生的茶树。袁高在《茶山诗》中描写到采茶人“手足皆鳞皴”，手和脚都被割破，布满了伤口。茶树还未发芽时，朝廷的使者便开始不停催促。“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刚直的诗人这样悲伤地吟唱。

到了期限如果还没有收齐的话，遭殃的不只是被革职的官员，更痛苦的是那些在官员们的皮鞭下干活的老百姓。官员们自然也可以因公受赏。尤其是为皇上办事，中饱私囊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的。

只因为陆羽曾说过“其地之茶与其地之水最合”，顾渚山的金沙泉水也必须一并进贡。据说这里的泉水在修贡时会涌出，而等进贡结束后便会干涸，真是不好对付。盛水的器皿必须是银器，于是便要生产大量的银瓶，因为这也是敕令，并不需要付款给制银器的人。有些贪官污吏往往会谎报数量，多出来的银瓶便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包茶用的“龙袱”（画有龙图的方巾）、“龙袋”以及特制的木箱都被作为实物纳税，不支付给任何费用。灾难便也殃及到了这些工人。在到长安昼夜兼行的运送途中，沿途居民自然也会被勒索高额的财物。而相关官员从中捞取好处，最稳妥的大概是可以借机向亲朋好友赠送茶叶。似乎只要是量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中唐时期号称玉川子的卢仝（795？—835）博学多才，韩愈对他的诗评价极高。卢仝生性喜茶，无仕进之意，过着隐士的生活。韩愈为他的《月食诗》深受感动，曾赋《寄卢仝》一诗，广为流传。卢仝还写有《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送茶给他的是一位谏议大夫，名为孟简，别号畿道，任常州刺史。卢仝在其他诗中曾提到过“常州孟谏议”，由此推断，这位孟简应该是以谏议大夫的身份兼任常州刺史的。

孟简自元和六年（811）起任常州刺史，到元和九年调任越州刺史并兼任浙东观察使。期间至少有两次曾到境会亭监督贡茶，大概就是在这时把茶送给卢仝的。侍奉于朝廷的人可以从皇上那里获赐新茶，而卢仝是在野之人，且家境十分贫寒。据《唐才子传》记载，“家甚贫，惟图书堆积”。心地善良的孟简特意送给他十分喜爱的茶，且是贡茶，卢仝自然喜不自胜。他在这首表达感谢之意的长诗开头这样写道：

**日高丈五睡正浓，**

**军将打门惊周公。**

意思是，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但我不是耕作之人，所以还可以呼呼大睡。这时军将的敲门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孔子在感觉到自己精力逐渐衰退后，便感叹“梦不到周公了”，因此周公便成了做梦的雅称。军将是指下级的将校。诗人继续写道：

**口云谏议送书信，**

**白绢斜封三道印。**

**开缄宛见谏议面，**

**手阅月团三百片。**

军将是受孟谏议派遣来送信和新茶的，他带来了一包用白绢包着并加了三道印泥密封的新茶。打开信，仿佛好友孟简就在眼前。打开包裹一看，里面有三百个满月一样圆的茶饼。无疑贡茶都是做成这种形状的。卢仝在诗中继续写道：

**闻道新年入山里，**

**蛰虫惊动春风起。**

**天子须尝阳羡茶，**

**百草不敢先开花。**

清明往往是在农历的二月或是三月初。为了赶在这之前完成修贡，过了新年，就该准备采茶了。阳历三月五日是惊蛰，到了这一天蛰伏的虫子便要结束冬眠从地下爬出，正好是在清明的三十天前，因为天子要先尝新茶，所以百花不敢先于茶树而开花。

卢仝这首诗中的“数数歌”十分有名，而在这之前还有两句：

**至尊之余合王公，**

**何事便到山人家。**

至尊指的是皇上。剩下的茶要送给王公大臣们，而我作为一个不在朝中任职的庶民，为什么也会有人送来贡茶呢？这里表达了诗人的惊喜。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一切都源于和孟简之间的友情。一定是孟简在境会亭和湖州刺史共同监督修贡之时，看着眼前成堆的茶叶被捣碎做成茶饼，便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无比爱茶的卢仝。心想如果在清明前送给他的话，那他一定会很高兴吧。

确实如此，卢仝将自己的欣喜之情都写到了诗中：

**一碗喉吻润。**

**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羽化登仙”的意思是，人身上长出了翅膀，飞上天成了神仙。喝到第七碗茶时就是这种感觉了。

卢仝写给孟简的这首感谢诗并不是以这首数数歌而结束的。升天的仙人清高无比，与下界风雨相隔，而自己喝了这么香醇的茶，感觉十分美妙，仿佛也成了神仙。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

**堕在巅崖受辛苦。**

**便为谏议问苍生，**

**到头还得苏息否？**

虽然喝了这样美的茶，感觉像是成了神仙，但是也深知为了制成这样的茶，无数的苍生黎民从陡峭的山峰和悬崖上坠落。借此向身为谏议大夫和常州刺史的孟简询问他们的情况，是不是已经恢复了健康。

卢仝的这首诗被后人广为传诵。宋朝苏东坡（1036—1101）有诗云：

**何须魏帝一碗药，**

**且尽卢仝七碗茶。**

意思是，魏武帝（曹操）在《博物志》中虽记载有仙丹处方，但是与此相比，卢仝的七碗茶更为灵验。

中国有句谚语：“清晨一杯茶，饿死卖药家。”

卢仝诗中提到喝茶的容器是“椀”，但后世文人在引用时多用“碗”。可能在卢仝所在的时代，用的是木头或漆器制成的碗。元朝契丹族出身的文人宰相耶律楚材在诗中曾提到“清兴何消七碗茶”，明朝画家徐渭在诗中也提到过“七碗何愁不上升”，南宋杨万里（1127—1206）有诗云：

**不待清风生两腋，**

**清风先向舌端生。**

由此可见，这些人都熟知卢仝的这首诗。

曾坐在境会亭长官席上的还有我们所熟知的杜牧（803—852）。经常游逛于扬州妓院的杜牧实际上承担着养活一个大家族的重担，其中还有一个失明的弟弟。为了出人头地，在中央政府任职，即担任所谓的京官更为有利。然而京官的额外收入很少。作为地方官，如果是在杭苏比较富裕的一带任职的话，便会有一些灰色收入。比如地方豪族家中有父母去世，如果能得到地方长官所写的墓志的话，就算是最高的孝行了。只需写几行字便可以得到相当于现在一两千万日元的红包。如果在盛大的庆典之际受到委托的话，也会收到大额的礼金这类似于贿赂行为。杜牧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不断活动，希望成为杭州刺史，然而由于有更强大的竞争对手，最终未能如愿。大中四年（850），他被任命为湖州刺史。湖州虽不像杭州那么富足，但也算是不错的地区了。杜牧在当年七月走马上任，并于第二年冬天作为京官返回长安，在湖州任职仅一年多，他坐在境会亭长官席上时应为大中五年（851）年初。那一年的清明是阴历三月十二日，到了三月的时候，所有贡茶都必须送出。

杜牧的《题茶山》就是在当年的二月左右写于境会亭。诗的开头写道：

**山实东南秀，**

**茶称瑞草冠。**

这时大概是贡茶已备妥，平安地送往长安之后吧。

**拜章期沃日，**

**轻骑疾奔雷。**

拜章是指写给天子的上表文，自然是要和贡茶一并运往长安宫中。沃日指晴天，意思是说在清明之前可以送到。

**舞袖岚侵涧，**

**歌声谷答回。**

描写的是在送出贡茶时举行的宴会。歌声在山谷中回荡。坐在杜牧身边的是共同监督贡茶的常州刺史。“好是全家到”是说杜牧把全家人都带到了现场。

**重游难自克，**

**俯首入尘埃。**

任务已经完成，宴会也该结束了，还有没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再来就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了。低下头来，该是返回刺史驻扎所在地吴兴的时候了。正如杜牧预感的那样，当年冬天他便被召回长安并于第二年去世，也再没去过境会亭。

# 茶马与茶盐

“茶”字在如今中国的大多地区都念chá，不过在我的母语闽南方言（通用于福建南部至台湾的方言）中，则念te。人们认为，英语的tea便是模仿自te的读音。

据说，茶叶传入欧洲是在17世纪初叶的时候，最早由荷兰人从厦门贩入，因此其读音来源于闽南方言。清代自中期起将贸易港仅限于广州一地，按说“茶”字应该随当地所说的广东方言读作chá，不过被称为广东十三行的中国特许贸易商，其原籍几乎都在厦门附近。十三行的领袖——怡和行伍家便来自厦门，在鼓浪屿还拥有别墅。这些人到了广州，想必也会用自己的母语告诉外国人“茶”是te。

te的最大经营商应该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不过印度却把茶称作cha。也许是传播途径不同的缘故。向中亚、伊朗，或绕道北方传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俄语区在内，这些地区都把茶念为cha。波斯语辞典、印地语辞典中，收有chā和chāi两词。

顺便说一下，大部分地区都把茶的叶称作“茶叶”，唯独闽南语圈一般将其称为“茶心”。对于普通的茶，母亲常常称之为“茶心茶”，幼年时听闻此说，颇感奇怪。正因为放了茶心（茶叶）才叫茶，那么为什么还要特意强调呢？当时想到的是，也许这是为了和麦茶、红茶相区别吧。最近我到福建去旅行，又听到这样的叫法，忽然悟到：也许这是为了和末茶有所区别吧。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末茶了，据说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在福建，因此这种解释未必站不住脚。

茶叶于17世纪进入欧洲，而欧洲人接触到茶叶的时间则要更早。这是因为之前来到中国的欧洲人肯定在中国喝过茶。同样，在更早一些的时代，将喝茶的习惯带给所谓的塞外民族的传播者，肯定也是这些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

茶的普及是在隋唐之后的事情，而在此之前，喝茶的习俗在南朝时已经形成，在北朝地区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北魏时期洛阳居住着许多外国人。城里有四夷里这样的外国人居住区，还开设有四夷馆。这些外国人大多在此逗留经商，中国的商人与之打交道时，应该也会献茶招待吧。

在洛阳、长安居住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波斯人。“胡”字所指称的，几乎都是这些人。波斯人是商业民族，待人亲切热情。想必主人上茶时，他们总会笑意盈盈地一饮而尽吧。这样一来，肯定也就逐渐喜欢喝茶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到了9世纪下半叶之后，才成为像现在这样的维吾尔族聚居地，在此之前则属于波斯人即胡人的地盘。由于与唐朝接壤，货物的流通非常顺畅。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茶是生活必需品。而在茶的传播上，想必是商业民族先行一步。

当北方的汉族开始喝茶时，与之杂居的胡人也开始在交际场合喝茶。胡人来自干旱地区，在他们的故乡，茶也一定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不用说他们也把茶称作chá。

西藏人何时开始爱上喝茶，确切的时间无从知晓。只是由于临近四川、云南等产茶区，人们认为茶叶很早就进入西藏。

四川人常提到“边茶”，意思是边境之茶，似乎指的就是专供西藏地区的茶叶。藏人有自己独特的嗜好，倘若与之不合，则无论多好的名茶，也不会接受。

相传英国首任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斯（WarrenHastings，1732—1818）曾将锡兰茶带到西藏，希望取代盛行于藏区的中国茶，却以失败告终。这件事发生在第一次马拉塔战争爆发（1775）前夕，并非只是以争夺西藏市场这样的商业目的为出发点。在西藏与中国内陆的联系中，茶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英国看到了这一点，遂将尽可能削弱北京与拉萨的联系作为国策。

茶叶在西藏人的生活中早已是不可或缺之物。西藏本地不产茶，而依赖四川、云南的供给。这种关系是将北京与拉萨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其中一条纽带。哈斯丁斯试图切断这条纽带，在英国和西藏之间另行建立关系。英国人之所以对锡兰茶寄予期待，正是这个原委。

后来，英国为了生产符合西藏人口味的茶叶，偷偷将云南普洱茶的树苗拿到大吉岭（Darjeeling）栽培，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加工制茶。据说那个时候连商标都是假冒的。但是，由于水土不同，移植的茶树似乎并不能长出与原产地相同的茶叶。产自西里古里的普洱茶，终究不符藏人口味，这项计划又遭受了挫败。

中国本土也有一种必不可少却又不能自产的东西，即名马。在那个时代，拥有更多骏马的一方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汉武帝命令远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千里迢迢远征中亚的大宛国（费尔干纳，Farghana），为的是夺取当地所产的被称作汗血马的名马。汉朝与匈奴交战中处于下风的原因，就在于与匈奴军相比，汉军的良马不足。

马匹是国防能力的基础。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必须确保良马的供应。国产的马匹不够好，而即使有了良种马，还必须要有优良的牧场。这个道理和茶一样，单纯的移植是行不通的。中唐时期，福建观察使柳冕曾尝试在福建修建大牧场，结果失败了。倘若能够建成牧场，则将有助于充实国防，可谓功莫大焉。然而，水土不服，却也无可奈何。空海所乘坐的遣唐使船漂至福建，竟羁留于此约莫三月，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时适逢修建牧场失败的柳冕职务调动，福建地方政府无暇顾及遣唐使船的问题。

对于历代中国王朝而言，大量获得良马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柳冕可谓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进行挑战却遭受失败的人物。中国仍然不得不向西方购买良马。

在唐代，中国卖丝绸买马。当时居住在现今青海地区的西藏人，向唐朝供应马匹。他们好像并没有将从唐朝买到的丝绸用于自己消费，而是进行倒卖，挣钱谋利。藏人比中国本土稍微晚近一些才养成喝茶的习惯。一般认为，茶与马的交易真正取代丝绸与马的交换，是到了随后的朝代——宋代之后的事情。

“权”字的原意是指一条独木桥。独木桥只能通行一人，因此“权”也指利益为一人所独占，这无非就是官方专卖。《宋史》食货志中便载有“权茶买马”，即用茶叶专营所得购买马匹，更直截了当的，便是开设茶叶与马匹的交易市场。

宋初在原州、渭州、德顺三郡开设了茶马市。这三处地方相当于今镇原、平凉和静宁三县，均在甘肃省境内，靠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南部。在今宁夏境内，当时存在着由藏族分支党项人所建立的西夏这一独立政权。因此，这三个郡均在与西夏接壤的国境附近。

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又在熙州和河州增设茶马市，就在现今的临洮和临夏两地。金兵攻陷首都开封之后，宋室南渡，这就是所谓的“南宋”。此时茶马市在金的版图之内，因此便在更南的地方开设新的交易市场。茶马市既有像阶州（今武都）和文州（今文县）这样的位于甘肃南部的，也有像黎州（今汉源）那样的位于成都以南的地区。茶马市虽然南撤了，但实际上却距离茶叶产地更近了。

北宋时期的茶马市虽距离马的产地近，却距离产茶区相当遥远。南宋之后，这种距离关系发生了倒转。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焉马均为良马，其余大多为驽马，而宋人不分良莠，即便是驽马也同意用茶叶交换，以表示他们的“怀远之恩”。这是一种观念，即偏安杭州的南宋皇帝，仍念念不忘远方的诸蕃之民，要对他们施以恩泽。而这样做能够羁縻（即笼络）住蛮人之心。

焉即为焉支，大概是指燕支山，位于甘肃省山丹县东部。在这片被称为“天马之乡”的土地上，有解放军所管理的山丹军马牧场，NHK特别节目《丝绸之路》中所播放的内容至今仍旧令人记忆犹新。

宋代最初买马和卖茶的衙门是单独设立的，自然其主管官员也为不同之人。据《宋史》记载，熙宁七年（1074）李杞受命入蜀监督茶叶运输，他看到买马与卖茶是同一件事，根据这个经验，建议二职合而为一。于是本为茶场司的李杞也兼任马政。但是，大概是因为官吏们划分地盘的劣根性作祟，二职刚刚完成了合并，便又重新分拆，不久陷入了混乱。元丰六年（1083），郭恂被任命为买马司，他上书提出，马政倘若不兼任茶场司，便不能顺利执行使命。马政和茶场司二职合并遂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于是出现了“茶马司”这个衙门，其长官被称为都大提举茶马司。

从《宋史·吐蕃传》中，我们试着从西藏方面窥探一下茶马互市的一鳞半爪。

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吐蕃向宋太宗献马，使者在崇政殿受到优厚的抚慰，获赐束帛。使者得到了丝绸，却无关于茶叶的记载。不过，次年秦州知州因蕃部（西藏的部族）进献羊马，上书奏请以茶和丝绸作为答礼，朝廷准奏。另据史载，咸平五年（1002）十一月，因藏人呈献马五千匹，朝廷除了支付马匹价钱之外，还另外赐予绫绢百段、茶百斤。

距离茶的产地不远的藏人成了茶的俘虏，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远离产茶区的塞外各民族，不久竟也需要依靠茶叶才能生活，这真是不可思议。

将宋朝赶到南方、建立金朝的女真族此后又称为满洲，他们来自东北地区，其发祥地就在哈尔滨东南附近，此地与茶并无关系。

有一种解释认为，塞外民族以肉食为主，需要通过喝茶补充维生素C。但是，对于这种说法，肯定有人会反驳说：那么在茶叶传入之前他们怎么办？一旦他们记住了茶的味道，恐怕就很难忘记了吧。

金与南宋的对峙大致以淮河为界划分国境。在军事上金长期占有优势，处于劣势地位的南宋便须向金提供白银二十五万两、丝绸二十五万匹作为岁贡。

虽然金在军事上处于优势，在经济上却相当落后。他们将南宋每年所提供的岁贡用于维持每年的开销。金朝的海陵王心想，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将南宋吞并，于是起兵南征（1161），不料此举反而使金陷入了困境。战事既起，南宋当然就不再提供岁贡，金朝的国家财政便难以为继。海陵王被部下所杀，宋金重新缔结和约，岁贡白银和丝绸的数量均减至二十万。

两国的国境线上设置了若干互市，交易非常兴盛。互市也被称为“榷杨”。在此所进行的交易中，金是严重的入超。南宋向金人购买人参和毛皮，向金人出售茶叶和药材，其中金人为进口茶叶耗资甚巨。虽然有专门的岁贡，却被用于填补贸易赤字，结果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南宋。于是，金在自己的辖地上积极奖励栽培茶树，却不见成效。茶树原为南国嘉木，不适宜在北方生长。

茶的消费成为赤字的元凶，于是金朝也考虑尽量减少茶的消费。朝廷还曾发布禁令，七品以下的官吏、下士官以下的军人禁止喝茶。然而，嗜好品是不可能单凭一纸法令就能够禁止的。

在金的版图内居住的汉人，长期以来一直有喝茶的习惯，而在女真族中，喝茶之风日渐形成。榷杨中最受关注的商品便非茶莫属了。

南宋在西边进行茶马交易，在与金接壤的国境线上则进行茶和人参的交易，结果是把提供给金的岁贡又拿回来了。

“岁贡”意思是每年的进贡，对南宋而言是一种屈辱的说法。于是在金海陵王鲁莽地南征兵败之后，岁贡的数量各减五万，并改名为“岁币”。无论使用什么名称，都是一种无偿给予，类似于现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

与生活水平存在巨大落差的国家为邻，潜藏着极大的危险。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较低一方的经济，恐怕会有摩擦之虞。现在的经济援助，也应该是以缩小生活水平差距为目的。虽然是特意无偿提供的资金援助，往往也要求用这笔资金购买援助国的商品。有时候这也会作为援助的条件。

金从南宋所得到的岁贡或岁币，被用于购买南宋的茶叶，如仍有不足，则用人参或毛皮贴补。一旦茶融入了生活中，就不再是奢侈品。这正是茶的奇异之处。

荣西曾两度赴宋。第一次在1168年四月来到宋朝，九月返回日本。第二次在1187年，前后大约逗留了五年时间。南宋最著名的诗人陆游是荣西同时代的人，比他年长十六岁。

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次年调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

顾名思义，“常平”就是指时常将物价维持在平价的状态。在物价较低的时候由政府买进，防止物价下跌损害生产者的利益，而当物价高企之际则将商品投放市场，防止物价上升损害消费者的利益。需要进行这种操作的，自然只限于重要物资。陆游所提举（管辖）的，是福建一地的茶和盐的常平。没有盐，人们就无法生存。茶也跟盐一样，被认为是同等重要的物资。

国家总是把国防作为最为优先的事务。国防所必需之物是马匹，而马匹则通过与茶的交换而获得。因此茶叶受到重视的程度与盐不相上下。当然茶盐并称还有其他原因，两者均是“权”，均是官方专营的对象，即“摘山煮海之利，以佐国用”。茶乃山物，盐是海产，摘得山物，煮得海产，所得之利为国家所垄断专有。

盐的专营始于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茶的专营则要晚得多。唐代开征茶税，但无专营。宋乾德三年（965）才建立茶的专卖制。

虽然有些时期从茶的生产到运输、流通等各个环节均由政府控制，但这种做法很难推行，不久便将茶事转交给商人经营，政府只对此征税。不过由于需要进行茶马贸易，便只在四川一地实施“权茶法”。

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国防所需的马匹供应，还因为政府成为茶叶的唯一供给源，可以有效牵制塞外各民族。若与中国发生纠葛，很可能就会被切断茶叶的供给。

清代对茶叶的供给放任自流，清朝政府也因此吃到了苦头。俄国人逐渐养成喝茶的习惯，其象征便是俄式茶饮萨马瓦尔。他们对茶叶的需求急速增加。虽然俄国人每年从中国进口的茶叶量有增无减，清朝政府却对出口茶叶的去向疏于跟踪调查。实际上，俄国从中国进口了超过国内消费量的茶叶，然后转而供应给外蒙古地区的蒙古人。于是这些蒙古人就不必从中国购买茶叶了，清朝政府便不能将茶叶作为武器，用于牵制外蒙古了。外蒙古最终从清朝政府的支配下脱离出去，虽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一般认为失去了茶的纽带联系，对此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俄国人可能是向塞外民族习得了饮茶的习惯，英国的茶则源自福建。饮茶之风在欧洲东端的俄国和西端的英国极为盛行，而法国和德国等中间地带的人们大多喝咖啡，这实在有趣。

养成了饮茶习惯之后，茶便深深渗入英国人的生活中。中国茶的流入急剧增加，而英国却没有与之相匹敌的出口产品。为了改变入超这种不均衡的局面，英国人制造出鸦片，很快便在数量上形成逆转，中国陷入了入超的困境。然而鸦片这种东西所带来的并不只是贸易摩擦的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黑色鸦片引发的往事中，隐约可以窥见茶的投影。

# 荣西在宋

荣西第二次渡海前往南宋那年（1187），周必大（1126—1204）成为南宋的宰相。他是诗人陆游的朋友。早在七年前，陆游便已卸任福建和江南西路的“常平茶盐”的职务。

在陆游任职期间，江南西路抚州（江西省临川市）的百姓因水患而生活艰苦。陆游拿出国储粮救济民众。由于事态紧急，来不及禀报上级获得许可，但擅动国储粮，论罪当罚。为此陆游被罢免官职。

此前两年的秋天，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在动身赴任时，友人周必大作诗一首相赠：

**暮年桑苧毁茶经，**

**应为征行不到闽。**

**今有云孙持使节，**

**好因贡焙祀茶人。**

陆羽号桑苧翁。晚年陆羽诋毁自己所写的《茶经》，也就是说带有否定的意思。据《新唐书·隐逸传》的记载，御史大夫（监察长官）李季卿到江南宣慰时，有人向其推荐陆羽，于是李季卿设茶招待。然而，由于陆羽身穿“野服”，李季卿便不以礼相待。陆羽对此感到羞愧，便写下了《毁茶论》。由于这篇文章早已佚失，没有流传下来，究竟内容为何，不得而知。“毁”字有“诋毁”之意。陆羽早前所写的《茶经》对茶极尽赞美，而从《毁茶经》的标题来看，似乎论述的是茶的负面内容。

周必大的这首诗题为《送陆务观赴七闽提举常平茶事》。常人均知陆游号放翁，务观是其字，七闽泛指福建。这首诗的大意是：

陆羽晚年之所以写下了贬低茶的文章，那大概是因为他没有去过福建的缘故。现在云孙陆游携带朝廷使节（给予使者的符节，任命的证据），前往福建赴任。那么，正好用贡焙（贡茶）祭奠茶神陆羽。

云孙是指从自己算起第九代孙。子孙后代的顺序依次为子、孙、曾孙、玄孙、来孙、昆孙、仍孙、云孙。说陆游即是陆羽的子孙并无根据，只是同为姓陆，也许这是周必大在开玩笑——权且将陆羽当作你的先祖。

陆羽提到福建茶时称“未详”，即不太清楚。那么福建茶究竟有多好喝呢？你是管辖福建茶的官员，请好好努力，用最佳的茶叶祭奠你家先祖茶神陆羽吧！周必大的诗中正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勉励之情。

周必大认为陆羽的《毁茶论》是写于晚年的著述。而另有别的说法认为这篇文章写于更早的时期，在陆羽尚未结识颜真卿的时候。根据《茶人之家》1985年第4期所刊载的由浩耕编的《陆羽略年表》，《毁茶论》写于广德二年（764）。其根据何在并不清楚，不过这一年是平定安史之乱之后的第二年。李季卿之所以前往江南，正是为了宣慰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同年，颜真卿也动身到北方进行宣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陆羽在著文论述茶的坏处时，年龄大约三十岁。那他并不是在年轻时对茶一边倒地倾慕，而到了晚年才略微进行反省。而是在刚成为茶人不久，便已意识到茶的弊端。《毁茶论》失传，实在非常遗憾。

在陆羽的时代，也有其他茶人，例如常伯雄。在李季卿南下宣慰时，常伯雄在临淮（现安徽省泗县）向其献茶。李季卿很喜欢，一饮再饮。随后李季卿再往南行，在江南邀请陆羽。如前所述，由于陆羽身穿粗衣，李季卿感到不快，便不以礼相待。

基于这样的原委，陆羽写了《毁茶论》。大概常伯雄衣冠楚楚地站在李季卿的面前吧。李季卿乃礼部侍郎兼御史大夫。他想到，对像自己这般位高权重的人的召唤，陆羽竟然如此失礼，一定会很生气。虽然我们并不知晓《毁茶论》的内容，但考虑到这篇文章是在发生了上面的事情之后写成的，可以推测其主要内容当是论述茶的坏处的。尽管常伯雄用什么态度献茶不得而知，但面对高官，想必在仪容举止上都想取悦对方。陆羽所贬斥的，也许正是这样的态度。虽然以“毁茶”为题，所发议论可能并非针对茶本身。

周必大从文章的题目，猜想陆羽之所以“毁茶”，是因为他对所有的茶都感到不满，那么如果他的足迹能远及福建的话，遇到“完美的茶”，就应该不会感到不满了。

陆羽为了探访名茶而四处出游。如果他听说福建有名茶，定会慕名前往。中唐的时候，福建茶尚未为人所熟知。到了宋代，福建茶名列贡茶第一，栽培皇室御用茶的北苑也设置于福建。

北苑为帝室茶园，完全由官府经营。然而民间的茶园也不少。

如前所述，宋代的茶并非全部由官府专卖，而是采用商人经营政府课税的形式。有文献记载，福建北部的官私茶厂竟达一千三百三十多家。北宋熙宁三年（1070），民间制茶产量太多，竟无法全部收购后再转交给商人售卖，于是允许民间自由交易，茶叶产量由此进一步增加。元丰七年（1084），苦于财政窘境的北宋政府再次实行专卖制。于是茶叶产量开始渐渐回落。民间的活力大抵如此，一旦被戴上枷锁，便马上陷入萎缩。

陆游赴任时，福建茶的产量约为百万斤，只相当于元丰七年专卖制再度实施时的三分之一。大概是因为有中央派遣直接的专门人员管理帝室茶园北苑，陆游所管辖的范围仅限于民间的茶园。

北苑的茶全部用于进贡，再由皇帝下赐给群臣，但这也并不等于一般人就不能得到。便是住在杭州郊外，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一生独身过活的和靖先生林逋（967—1028）那样的人，也有机会品尝到北苑茶。在二十年间足不出户的林逋的诗作中，有一首题为《烹北苑茶有怀》的诗：

**石碾轻飞瑟瑟尘，**

**乳香烹出建溪春。**

**人间绝品应难识，**

**闲对茶经忆古人。**

这个时候茶已经不用捣而改为碾了。“瑟瑟”一词形容风倏地吹过，也用于形容碧绿色。这里也许两种意义兼而有之。

烹茶的时候，表面鲜白者为佳。因此，用“乳”来形容上等的茶。茶的泡沫称为“乳花”。

“斗茶”是一种比试布茶优劣的游戏。北宋初期尚无茶筅，人们使用的是匙子，将搅拌的动作称为“击拂”。匙子必须够重，最好的是黄金制成的勺子，也有银制和铁制的。蔡襄在《茶录》中提到，竹制的匙子太轻，因此至少在福建地区不使用。“击拂”之后，表面鲜白，即呈现乳状，没有水痕者为佳。也有的茶一开始并没有水痕，但过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出现。早出现水痕者输。胜负结果有一水之差、二水之差等。

蔡襄的诗《试茶》有这样的句子：

**雪冻作成花，**

**云闲未垂缕。**

以“雪冻”形容茶盏中的茶叶如同雪花般洁白清纯，“缕”是指茶汤中的纤维状叶筋。茶盏中出现波形，那是因为水痕出现的缘故，因此蔡襄说：“愿尔池中波，去作人间雨。”

陆游也有题为《试茶》的诗，在这首诗中他把煎调好的茶描述为：

**绿地毫瓯雪花乳**

毫是指细毛。大概是说绿色质地的茶碗上有像毛一样的细纹。蔡襄的《试茶》中也有“兔毫紫瓯新”一句。“兔毫”的纹理相当于日本所说的“芒目”，这种瓷器的釉面部分在烧制时垂流成像芒一样的细小条纹，在中国称为“兔毫盏”。

瓯是越州的青瓷。陆羽在《茶经》中，将越州的青瓷列为茶碗中的第一位。他的排序是：

**越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

在陆羽的时代，邢州（河北）的瓷器备受赞誉，似乎也有人认为邢瓷比越瓷更好。对此，陆羽反驳道，若把邢瓷比作银，那么越瓷则为玉。

一般认为，理想的瓷器近似于玉，瓷艺的目标便是要达到玉的温润和深沉。前面提到的“盏”字，有时也写作“玉”字旁的“琖”，即“兔毫琖”。

邢州瓷白，茶色红。陆羽还说，越州的茶碗是青色的，因此茶色呈绿色，这恐怕说的是布茶前的样子吧。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

然而，到了宋代，人们推崇呈乳白色的茶，因此又以能够衬托其色泽的黑色茶碗为佳。蔡襄在《茶录》中记述道：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

于是越州青瓷便与茶不相宜了。

可见时代不同，审美意识便会产生变化。陆羽和蔡襄两人所处的时代，相隔大约三百年。

真正将茶带回日本的荣西来到宋朝的时候，当时已经是黑盏时代了。大概是因为在浙江天目山禅寺留学的日本僧人将黑釉茶碗带回日本的缘故，日本将这种茶碗称作“天目”，只是天目山并没有瓷器窑。那里的茶碗也许是在江西或福建的瓷窑中烧制而成的吧。其坯微厚，也就是有些许厚重感的茶碗为佳。

要想理解日本的“茶”，就必须关注其源流。平安初期，永忠等僧人所带回的茶，只在宫廷和一部分的贵族当中流行，特权的氛围浓厚，不久便衰落了。现在日本茶的直接源头可归于荣西。当时中国处于南宋时期，与其同时代的名人有诗人陆游和程朱理学的始祖朱熹。蒙古的成吉思汗在荣西第一次来到宋朝的前一年出生，平清盛则在荣西第二次入宋的六年前逝世。

与唐代相比，宋代显得更为保守内敛。虽然没有盛唐时期的豪华气派，然而实际上，宋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远高于唐代。

唐代是贵族社会，留下了恢宏的诗文，然而在其背后，却是为贫困所迫的平民。在宋代，虽然贵族的浮华受到压抑，然而由于平民生活的改善，其社会内涵非常丰富。

先后不断遭受辽、金和蒙古压迫的宋代，绝非雄武强大的朝代，但却大概称得上是一个蕴藏着深厚底蕴、注重内敛的时代。至于皇室所用之茶，虽然说不上华美，但在我们看来，其要求却超越了限度。不过，这也并非追求表面的奢华，而似乎更强调内涵。

传到日本的茶中，可以说也沾染了宋朝那样的时代气息。内里饱含着情感，却绝不呼号。平息呼号便是茶的任务。

在多产诗人陆游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首题为《临安春雨初霁》的七言律诗，被世人视为屈指可数的佳作。其中有一联为：

**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

这两句诗深受文人的喜爱，被公认为佳句。这首诗作于淳熙十三年（1186），为荣西第二次入宋的前一年。在这一年，陆游在《书愤》一诗中悲愤地感慨，诸葛亮作《出师表》已过千载，然而在北半国土沦丧的今天，竟没有可与之相匹敌的气概。

陆游作为诗人而负有盛名，不过他出仕很晚，且在江南管辖茶盐时因擅自开仓放粮而被罢免官职，此后被贬。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严州（浙江省建德）的代理知事，前往首都临安（杭州）觐见皇帝。皇帝对他说：“严州风光明媚，卿可心平气和地作诗。”陆游空有报国之心，却听到皇帝的这番言语，深感意外。陆游在小楼中强忍着这一腔郁愤之情，听着春雨落下。大概在雨停之后，明天一早就会听到杭州名产杏花的叫卖声吧。就这样，陆游虽然试图摆脱悲愤的纠缠，心情却仍然激动。诗的下一联是：

**矮纸斜行闲作草，**

**晴窗细乳戏分茶。**

在细长的纸片上，斜斜地写上草书，尽量让心绪平静下来——然而，依旧徒劳。也罢，且在春光明媚的窗前，调理出细细的乳白色的茶水。煎调茗茶称为“分茶”，这种说法出自《茶经》：

**凡煮水一升，酌分五碗。**

心有抑郁愤难平。提笔书写为不能使心绪平和下来。这时百般无奈，最后只好寄情于品茶了。

# 武夷三十六峰

淳熙十年（1183），朱熹辞去官职，来到福建北部崇安县，在武夷山中创办学校。这是荣西第二次入宋四年前所发生的事情。

如今武夷已成为名满天下的产茶地，而在中唐陆羽的时期，武夷这个地名与茶还没有什么关系。到了宋代，《茶录》中以建安茶即北苑所产的茶为天下第一，而武夷仍名不见经传。

有人认为，直到南宋以后，武夷才作为产茶区而名扬天下。确实在南宋之后，北苑衰微，武夷起而代之。但此前武夷并非完全默默无名。唐代诗人徐寅收到朋友赠送的蜡面茶，因作诗感谢：

**武夷春暖月初圆，**

**采摘新芽献地仙。**

徐寅是唐末至五代时期人。

在北宋时期，苏东坡（1037—1101）也有诗作《咏茶》记曰：

**武夷溪边粟粒芽，**

**前丁后蔡相宠加。**

“粟粒芽”指的是细幼的茶的新芽。“前丁”是指《建安茶录》的作者丁谓，“后蔡”是指《茶录》的作者蔡襄。这两人均是官至宰相、来自南方的北宋官僚，从时间来看，丁在前，蔡在后。遗憾的是，《建安茶录》现已完全佚传了。

以“先忧后乐”的名言而人所共知的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在《斗茶歌》中，也有“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的诗句。这个时候，茗作为茶的雅称，似乎已为一般人所熟知。在北宋时期所编著的大百科辞典《太平御览》中，茶的项目也收在饮食类“茗”的标题之下。

流经武夷山区的河流蜿蜒曲折，被称为“九曲”。武夷丛山秀美，总称为“三十六峰”，各有名目，其中以大王峰、狮子峰、玉女峰、隐屏峰、接笋峰、玉华峰、天柱峰等最为有名。

朱熹所创办的学校，位于第五曲之隐屏峰山脚下。朱熹自己将之称为“武夷精舍”。“精舍”是讲学布道的场所，在佛教中也指寺院，如非常有名的“祗园精舍”。

朱熹的父亲曾在安徽省紫阳山读书，于是朱熹便将自己的书斋起名为“紫阳书室”。不久武夷精舍也被称为“紫阳书院”或“武夷书院”。创办学校的初衷在于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而辞官引退大概是对当前政局感到失望吧。朱熹之友陆游作此猜想，并批判了朱熹的敌前逃亡。

**身闲剩觉溪山好，**

**心静尤知日月长。**

**天下苍生未苏息，**

**忧公遂与世相忘。**

人民尚未苏息，而您却在这个时候隐居于武夷这样景色优美的地方，究竟是何打算！陆游这个时候五十九岁，比朱熹年长五岁。

写这首诗的时候，陆游大概也煎调了茗茶吧。用小勺“击拂”的描述倒与这个场景很贴切，不过这时已经普遍使用茶筅了。

编写于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武夷山志》中，插入了武夷九曲的简略绘图。第五曲的插图中，隐屏峰之下有文公祠。那里祭祀的是被谥为“文公”的朱熹，过去正是武夷精舍的所在地。天柱峰与晚对峰隔水相望，在溪中还有一块叫做“茶灶”的巨石。虽然希望把它叫做“岛”，但确实太小了。灶是“竈”的异体字，据朱熹的《武夷精舍杂咏诗序》，“茶灶”是溪中的巨石，可供八九个人围成一圈坐下。第五曲附近水较深。而巨石的中央凹陷，就像灶台一样，大概这里又是茶产地，因此便被称为“茶灶”吧。在杂咏的诗中，朱熹用如下的诗句描绘这块巨石：

**仙翁遗石灶，**

**宛在水中央。**

**饮罢方舟去，**

**茶烟袅细香。**

方舟指的是两船相并，而“方”也有木筏之意，也许方舟指的就是船或木筏。1980年在我到武夷旅游时，九曲上漂走的几乎都是木筏。木筏上固定着椅子，我们就坐在上面。

朱熹的诗告诉我们，当时的人们果真在“茶灶”上调茶品饮。饮罢离去，煎煮茶叶后留下的火烟还在细细悠悠地上腾缭绕。

《武夷山志》的作者、清人董天工按照朱熹诗作之韵，作了如下一首《茶灶》：

**试茗寻仙灶，**

**赋诗夜未央。**

**紫茸翻雪浪，**

**舌本有余香。**

紫茸即紫色的蘑菇，这里大概指的是翻覆白色波浪（雪浪）的黑浪吧。沿着九曲溪流而下的景点之一，便是形态各异的翻腾的波浪。起泡的水波让人想起茶的理想状态——乳清。南宋端平年间（1234—1236），泉州通判陈梦庚所作的《茶灶》诗便提到这种情形，并接着吟道：“此水此茶须此灶。”

武夷精舍背靠隐屏峰，与隐屏峰相邻的山峰称为接笋峰或折笋峰。据说是由于笋形的山岩横向裂成三段而相互连接，故得此名。接笋峰下有“茶洞”。根据《武夷山志》的说明，“茶洞”原叫玉华洞。三十六峰的山峦中，有玉华峰、玉华泉，玉华洞似乎与之有关系，但附近层峦叠嶂，把洞名称作“玉华”并不一定妥当，于是改称“茶洞”。据说因为这个地方“产茶甲于武夷”。“甲”为最优秀之意。

不过，在民间传说中，“茶洞”却是武夷山的第一株茶树生长的地方。相传九曲住着一位张姓老人，以采草药为生，为人非常善良。他为村民们治病，并视此为人生的意义所在。武夷山的仙人为张老人的心肠所感动，送给他茶树。张老人最早种植茶树的地方就在这里，因此得名为“茶洞”。

送给张老人茶树的是仙人，原本武夷山便是仙人之山。

传说中彭祖是一位长寿翁，据说他从圣君尧的时代一直活到殷朝末年，活了七百多年。彭祖有两个儿子，名字分别是“武”和“夷”，他们开山引水，堆石成峰，便有了武夷山。武夷山的山形地貌确实鬼斧神工，令人不由得联想到神仙。而那里所生长的茶树正是仙人所赠，这种想象可说是非常自然的。

将这里命名为“茶洞”是合乎情理的。或者说也许是先有了茶洞的名称，随后才创造出传说。有几首以茶洞为主题的诗，却没有一首提到前述的传说。例如，明代谢肇淛作了如下题为《茶洞》的七言绝句：

**小屋编茅竹结亭，**

**藤床瓦鼎黑磁瓶。**

**山中一夜清明雨，**

**收却先看一片春。**

谢肇淛的生卒年不详，他是万历二十年（1592）的进士，因此其写作时期大约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福建长乐人，官至广西左布政使（副知事）。

清人李卷曾作有题为《茶洞作武夷茶歌》的长诗，也没有说到仙人授茶树的传说。诗中对武夷的茶咏赞道：

**顾渚蒙山逊韵致**

这句诗的意思是，太湖沿岸的顾渚山、四川的蒙山原本是名茶的产地而举世皆知，后起之秀福建武夷也并不逊色。李卷在这里提出了“韵致”这一不易理解的判定标准。

明代吴拭在《武夷杂记》中将武夷描写为“骨山”，即没有肉的山，换言之是指全是岩石的山。

**磅薄一百二十里外，山始有肤。……**

肤指的便是土。同为明代人的张于垒记述曰：

**山皆纯石，不宜禾黍；遇有寸肤，则种茶。**

寸肤是说很少的一点土，山岩的表面如果堆积有一些土，就在上面种植茶树。从高处向下望，这些茶树仿佛绿苔点缀在山坡上。清冽的山风吹过，茶的嫩叶散发出的清香扑鼻，据说这些茶并不只是供人们饮用，也是献给山灵的纯洁的供品。

在这种岩石间隙的土中生长的茶，称为岩茶，非常珍贵。岩茶中有叫“大红袍”的，逐渐被人们视为最上等的茶叶。

关于大红袍的名字来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这种茶树生长在断崖绝壁上，人们无法直接采摘茶叶。据说只有捡起被风吹落的茶叶制茶。人们说这种茶能够医治百病。

关于大红袍的各种传说中，最祥和温暖的是下面的一则故事。

相传崇安县县令得了难治之症，久久不能治愈。当时武夷山一带也归崇安县令管辖。天心寺的和尚向县令献上岩茶，服用几服之后，病立即就治好了。县令非常感激，将红袍披挂在那株茶树上，并烧香拜谢。此后人们便将这株茶树称作“大红袍”。

在这个传说中出现了天心寺的和尚，大概这座寺庙就是天心峰上的天心庵吧。天心庵又名永乐庵，很久以前便已荒废，现在连踪迹也找寻不着了。在其近处有个地方叫九龙窠，在其中的一个山岩上，有一株被称为鼻祖的“大红袍”茶树。攀爬上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困难。不过为我们做向导的茶叶界人士却说：“老大爷还是不要爬的为好。”山岩的上面，长着三株平平常常的茶树，树高不过一米。据介绍，被称为“大红袍”的茶并不少，那大多是指岩茶的上等品，而真正的“大红袍”茶树，只有这三株。

岩石上显眼地刻着“大红袍”三个朱红大字。这三株茶树得天独厚之处在于日照：据介绍，早晨太阳可以照到树上，而到了正午前后，太阳就只能照在茶树后面的岩石上，三株大红袍避免了猛烈阳光的直射。另外，这处山岩上还有细小的泉水喷流而出。一切最好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们一般提到岩石，马上会联想到光秃秃的外表，其实并非如此。

关于大红袍还有别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这里大旱。老百姓不得不吃树皮和草根，树皮草根吃完了，便靠“观音土”充饥。我不知道观音土究竟是什么，大概是能够吃的土吧。饥饿的人吃了观音土不能消化，腹胀而痛苦不堪。

武夷山北的慧婉村有一位孤寡的老婆婆，靠给村里的人帮忙洗衣缝补勉强度日。因为她非常勤快，被村民称为“勤婆婆”。有一天，勤婆婆到很远的山上采摘还未干枯的树叶，回家后煮水喝。这时，她听见门外传来了呻吟声，出门一看，有个老人倒在地上，口干舌燥，嘴唇开裂。勤婆婆喂老人喝下她将刚刚煮好、仅有一碗的树叶汤。

老人醒过来后，为表示感谢，将自己随身所带的手杖送给了勤婆婆。勤婆婆仔细一看，只见手杖的手柄上雕刻着一条龙，龙口衔着一颗光彩四射的珍珠。勤婆婆忙说：“我不能接受这么贵重的东西。”就要把手杖还给老人。老人说：“你在那边的地上挖个坑，把手杖插进去，浇上一碗水。你将会获得幸福。”勤婆婆看了看老人所指的地面，回过头时发现老人已经不见了，原来他穿着红锦袍乘着清风离开了。

勤婆婆照着老人所说的去做了。第二天早上，原来的手杖变成了一棵高大的茶树，树上枝繁叶茂，吸引了小鸟、蝴蝶和蜜蜂飞过来。村民也纷纷过来看。神奇的是，摘过茶叶之后，茶树马上又发出了新叶。村民们喝了茶，被观音土撑得胀鼓鼓的腹部看着看着就恢复原状，痛苦也消失了。

皇帝听说这件事，派兵将这株神奇的茶树拔起，运送回京城，移植到皇宫的院子里。茶树在这里也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每当有人伸手想摘茶叶时，长有叶子的树枝就会向上长。茶树一直向上长，即使搬来了凳子，搬来了梯子，也都够不着。皇帝大怒，命令用斧头把树砍倒。巨大的茶树倒下，把皇宫压垮，皇帝也被压在下面，一命呜呼。不久飘来一朵瑞云，将茶树包着，向武夷山的方向飞去。

被夺走茶树而每日伤心不已的勤婆婆，有一天早上，在鸟的鸣叫声中醒来。她走出门外一看，茶树回来了……

第一个传说只有县令和和尚出场，显得比较简单。而第二则故事连皇帝也卷入了，巨大的茶树在云中飞行，场面可谓相当壮观。

第三个传说讲述的是一位赶考的书生在经过武夷山的途中病倒，被天心庙的方丈用茶救治的故事。这位书生进京之后，中了状元。皇帝也对这位眉清目秀的状元郎喜爱有加，将他招为驸马。状元为报恩，来到武夷山，重修了天心庙，并捐赠了一尊金身菩萨。回来后，发现皇后患病，状元献上从武夷山带回来的名茶，说：

**这种茶能治百病，请让皇后服用。**

皇帝便让皇后服用，并说：

**如果能够治愈皇后的病，我必将赐封那棵茶树。**

赐予树木官爵是有前例的，那是秦始皇在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举行泰山封禅仪式时发生的事情。封禅是最高的仪式，只有实现天下大治、社会安定的圣仁之君才有资格进行。这种仪式是在泰山上封土（筑土为坛，报天之功）、在山下禅（辟场祭地）。秦始皇登上泰山，立下石碑，举行仪式之后，正准备下山，突然风雨大作，只得在树下避雨。因大树遮雨有功，秦始皇封它为五大夫。五大夫是秦朝二十级爵位中倒数第九级。这棵树是松树，现在泰山上还有枝繁叶茂的“五大夫松”。当然，这些“五大夫松”大概都是后来栽种的吧。松的别名又叫“五大夫”，也是源自于此。

皇后喝了武夷的茶，完全恢复了健康。于是皇帝将自己的女婿状元派遣到武夷，赐予那棵茶树爵位，并将大红袍披挂其上作为标记。

另外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明朝永乐帝出游武夷，赐予茶树大红袍，不过这并不见载于史书。

在我去看武夷九龙窠的大红袍时，有人告诉我说清朝时这三株大红袍所产的茶叶是贡茶，为了防止盗茶，还专门派遣士兵值守。不过，在乾隆年间（1736—1795）的《武夷山志》八卷中，就我所查阅的范围，并没有见到大红袍的名称。

大概人们很早就知道了岩茶的出众品质，并将其中最好的茶叶进贡给朝廷。这种皇帝所品尝的珍品，想必孕育了若干“大红袍”的传说，且在清朝中期以后便流传开了。

武夷取代北苑的地位是在元代以后。从县域来说，建瓯县的北苑茶衰落，崇安县的武夷茶兴起。

武夷乃名胜之地，可是交通却颇为不便。其风光可与桂林、黄山相匹敌，不过从福州乘车出发，途中还需要住上一宿。1980年我去武夷的时候，游客模样的人几乎没有。住宿的地方也只有崇安县的招待所。不过，听说现在已经建起了气派的宾馆。人们解释说，那是因为有东南亚的华人大批大批到来的缘故。

祖籍福建的华侨很多，第二、第三代也听过父母讲起武夷的名胜。在背靠六甲山峦的神户，战前华侨创立登山会，其中也有“武夷登山会”。家父曾担任该会会长，对于祖籍福建的人来说，武夷是受人仰慕的名山。

从福州前往武夷山，途中在建瓯县停宿。我们住在县的招待所，第二天一早，还参观了附近的建瓯茶厂。北苑茶并未完全灭绝。

元代时武夷取代了北苑，到了明代，北苑便几乎处于荒废状态。这大概是因为它身为禁苑，拥有特权而又安于现状的缘故吧。北苑旁边有一座凤凰山，陆游曾以《游凤凰山》为题作诗吟诵其风光，但似乎从名胜景区来看，也已落后于武夷。到了明末清初，茶叶开始出口，需求增加，过去因北苑而兴盛一时的建瓯县也开辟了茶园。不过，到了20世纪初，在与西乡大湖茶的竞争中败北，茶园再度荒废。人们认为随后紧接而至的战乱也是茶园衰败的原因之一。北苑屡屡在竞争中落败，但曾经是顶级的茶叶产区，按说本身条件并不差。1963年，这里建成了国营茶园——凤山茶厂，终于实现了复兴。当然，现在不会再生产供皇帝一个人享用的龙团、胜雪等品种了。大概是过去生产这些奢侈茶品的荣光，反而将北苑置于死地。

将看到复兴曙光的北苑茶压垮的是上述的西乡大湖茶，它有一个优雅的名称——水仙，这种茶在武夷一带也广为栽培。

人们随意给茶起名字，简直数不胜数。我们在前面介绍了大红袍的传说，原本不过只有三株茶树，而天心峰一带的岩茶也都冠以“大红袍”的称谓。此外还有“不知春”、“黄袍”、“红梅”、“桃仁”、“雪梨”、“肉桂”、“奇兰”等。从明清时期的诗中可以看到有“先春”、“雀舌”等名称，但我不太清楚究竟指的是茶本身，还是茶的品种。

18、19世纪间，基本上都是英国商人前来采购茶叶，有一种茶被他们称为Bochea，大概便是“武夷”这一地名的谐音吧。当时英国人写报告说，中国人将这种茶称为“大茶”，并不是说叶片大，而是指茶叶的品质低劣。

Bochea中木质纤维含量高，经过长时间的焙烤，干燥后切碎，大多一经包装便碎成粉末，煎调后茶色浓厚。长期储存也不会发霉，但味道不佳。据说这种茶是专门卖给穷人的。

同样也是武夷出产的茶，经过更考究的工艺生产出来的，英国商人称之为Congo茶，写成汉字便是“工夫”茶。“工夫”在日语中是指颇费思量的意思，在汉语中则是指“耗费人力”。也就是要耗费人力，精选好茶，仔细加工，恰到好处地保留茶的香味，而不是胡乱地用强火长时间烘烤。火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便需要人手。经过这样的精细加工，茶叶碎成粉末的概率很低，只是不能长年存放。据说19世纪中叶，英国所购买的中国茶，大部分都是这种工夫茶[[1]](#_1_1)。

根据19世纪30年代的记录，有人批评本应是精品的工夫茶，其品质却非常低劣。似乎有人用Bochea茶混入Congo茶中滥竽充数。因出口需求旺盛而得以复兴的北苑，专门生产Bochea茶大概不是什么难事吧。

在茶叶大量出口的时期，荒废的北苑复苏，与武夷并驾齐驱。但由于印度锡兰茶的出口，中国茶的出口陷入萧条，再加上战乱频仍，北苑又再次掉队，断绝了关系。如今第三次再续茶缘。在我乘车从建瓯到崇安的旅途中，所经之处茶树生机盎然。

[[1]](#_1)编者注：现一般写作“功夫茶”。

# 铁观音

半发酵的茶统称“乌龙茶”。乌龙茶如今已变得非常有名，关于其语源有若干种说法。只是其名称似乎并不是那么历史悠久。

当年曾随亨利的船队来到日本的美国传教士萨缪尔·威廉斯（SamuelWillians，1812—1884）是一位与日本有深厚渊源的人物。他曾对茶做过一番考证。从1832年起有一份在广州大约发行了二十年的英文报纸《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威廉斯曾在上面发表文章。文中说：“乌龙即blackdragon，其名号来自一株有名的茶树，这株茶树正是这种茶的起源。”

威廉斯对此没有详述，不过却有一个传说，讲的是有一株散发芳香的茶树，其根部有一条黑蛇缠绕。蛇常常改称为龙。“黑”字在福建南部，是非常书面语的字，一般不使用，人们通常在口语中用“乌”来表示“黑”的意思。

从安溪县拿到的宣传册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说明：明末清初（17世纪），安溪尧阳南岩住着一位退伍军人，名叫龙。因为长年在外打猎，肤色黝黑，被人称为乌龙。乌龙总是前往深山打猎，顺便采摘一些茶叶，放在背后的筐子里带回家。这些茶非常好喝，附近的人们等乌龙打猎回来，便到他的家去喝茶，后来便把这种茶称作“乌龙茶”。

在福州市的福建茶叶学会所收集的民间传说中，乌龙这个人物姓苏。除此以外，关于乌龙茶的名称由来还有地名说。江西省著名的庐山有一个乌龙潭，浙江省建德县有一座乌龙山，这两个地方都位于产茶区。11世纪后期北宋的太学博士刘弇著有《龙云集》，在这本书中，作者列举了乌龙地区的茶，与顾渚、雁荡（浙江省温州）的茶相提并论。不过，根据研究人员的考证，这两处地方与现在福建的乌龙茶并无关系。

乌龙茶归根结底乃源于武夷山，南下传至安溪，并跨越海峡传至台湾。18—19世纪，当英国大量买入中国茶时，南部的安溪比北部的武夷更有优势。安溪近海，运费也就相应便宜。我也曾到过安溪，虽然地处山区，但我上午从泉州市出发，参观了安溪县的茶园之后，傍晚便抵达厦门市。由于占有地利，尽管同样是乌龙茶，安溪出产的茶叶大有取代其鼻祖武夷乌龙茶之势。

安溪县古代属于泉州府，为原来南安县的一部分。唐代灭亡之后，南唐地方政权在这里设置了清溪县。北宋宣和二年（1120），改名安溪县，直到现在。

在中国，一般县的中心城镇都筑有城墙，称作县城。不过安溪县原本却没有城墙。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倭寇从仙游、永春方向进攻过来，于是对筑城展开了讨论，五年后建成城墙。城墙周长三里余，即不到两公里，是个很小的城。

日本的海盗竟然攻入到这样的深山地区，确实令人感到惊讶。然而，都说倭寇只有十之一二为真，大部分好像都是沿海的暴徒，他们自称为日本人，胡作非为。据说只要一听是倭寇，居民便会很害怕，完全放弃了抵抗。

虽然地处山区，安溪县却经由西溪通过水路与沿海的泉州相连。安溪县原来所属的南安县，是国姓爷郑成功的老家，郑家是海商，拥有很大的势力。他们与海有着意想不到的密切关系。这为安溪乌龙茶进入海外市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安溪乌龙茶的代表是“铁观音”。

关于铁观音的名称，福建和台湾的解释各不相同。福建的说法是，铁观音是茶树的名字，从铁观音这种茶树上采摘的茶叶便称为“铁观音”。然而，台湾却将通过特定的制茶工艺所生产的茶叶称为“铁观音”。前者出自茶树的种类，后者则根据制茶方法。

如今铁观音的名气很大，然而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泉州府志》中，尚看不到这个名称。在这本书卷十九“物产”项下“茶”的条目中，有如下记载：

**晋江出者曰清源，南安出者曰英山，安溪出者曰清水、曰留山。**

安溪的茶原来称作清水茶或留山茶。另外，据《泉南杂志》记载，清源茶即晋江县出产的茶更为有名，不过现在则几乎销声匿迹，南安县的英山茶等其他茶的产量也很少，只有安溪茶一枝独秀，“然亦非佳品也”。

安溪茶质量提高，以及铁观音的名称出现，都是在乾隆年间的《泉州府志》刊行以后的事情了。在《泉州府志》中，收有阮旻锡所作的题为《安溪茶歌》的一首长诗。阮旻锡便是以鹭岛道人为名写作《海上见闻录》的人，曾在郑成功手下做事，后出家修行。在诗中，他吟诵道：

**安溪之山郁嵯峨，**

**其阴长湿生丛茶。**

接下来是

**居人清明采嫩叶，**

**为价甚贱供万家。**

这是“亦非佳品也”这样的社会评价的注脚。而武夷、漳州那边的人则出产“紫白、二毫、粟粒芽”这些上等好茶。诗人还以一句

**西洋番舶岁来买**

说到了英国商人买茶，生意兴隆的情形。

**溪茶遂仿岩茶样，**

**先炒后焙不争差。**

不用说，岩茶是武夷的高级茶，安溪茶此前一直都是供给万家的大众茶，而武夷的上等好茶却能够高价卖给英国商人，人们受到了刺激，纷纷仿制岩茶。“先炒后焙”大概是高级茶的加工原则。通过努力地模仿，最终生产出不差于武夷茶的茶。

安溪茶过去普遍称为“清水茶”或“留山茶”，现在已经听不到这些叫法了。恐怕是安溪人有意让这些名称消失的吧，因为这些名称已与便宜货的形象牢牢联系在一起。

安溪的茶需要新的名字。究竟是谁想出来的，抑或是自然而然产生的，现在无从考证，反正名字便定为“铁观音”了。实际上这个名称起得非常高明。

还有一个传说听起来更有道理。时间地点都很明确：清乾隆年间，安溪尧阳松林头乡，与乌龙茶起源说中退伍军人的家在同一个地方。村里有个名叫魏钦的人，非常虔诚，每天早上都要在观音像前供茶。有一天，魏钦出去砍柴，在岩石的缝隙中发现有一棵发光的茶树，他将这棵茶树挖出来栽培，这就是铁观音的起源。

观音信仰在中国南方尤为盛行。安溪县城西边有一座观音山，山脚下有座寺庙叫真觉院。创建的年代不明，但肯定是一座古刹。宋代诗人夏瑧到此游玩，写下如下一首诗：

**半天闻梵唱，**

**一径踏松阴。**

**起石云千仞，**

**悬空瀑万寻。**

虔心信仰的人在观音菩萨的指引下发现了奇妙的茶树，这原本不过是个传说而已。大概原先人们只是为了至少能够达到出口产品的标准而以武夷岩茶为师，努力进行改良，结果却生产出了铁观音。在命名的时候，也许是参考了虔诚供奉观音的人的意见吧。

有人认为，“铁”这个字眼是因为茶叶的颜色是暗绿色，与铁相似的缘故。另外，也有封建色彩的传说，讲的是茶叶献给皇帝，得赐“铁观音”的名号。实际上，安溪有一座名为“铁矿山”的山，据说还产铁。铁观音的名字可能是铁矿山与观音山这两个山名结合而来的。

台湾的台北近郊也有一座观音山，其附近一处名为“平顶”的地方是有名的茶产地。正如其字面意义一样，“平顶”是一片平坦的高地，二战时日军在此修建了机场。而据《泉州府志》的记载，安溪观音山“其形端好”，山上有一处可容纳一百人左右的天然石室。半山腰平坦，被称为“闾平山”。说不定移居台湾的安溪人，把故乡的山名原样照搬新土中。台湾的观音山外形也颇为端好，同样有寺院，同样有平坦的土地，并且同样产茶。

安溪的茶最初品质低劣，因此无法单独出口，只好偷偷混在武夷茶中。这种混合的作业大概是在厦门进行的吧。安溪茶运到厦门，安溪的居民也跟到厦门。在到处是山的安溪，当时并没有什么茶的产业。茶价极为低廉，单靠卖茶无法谋生。为了生活，必须提高茶叶的质量。铁观音这一名称的出现，意味着努力取得了成果。

虽然人们以武夷岩茶为目标，进行着品种的改良，不过在安溪生活仍然非常艰难。可用于耕作的平地非常少，自然需要外出打工。茶叶的运输路线，也是外出打工的路线。有许多人背井离乡，离开厦门，前往台湾和东南亚。

现在，安溪县的人口为八十万[[1]](#_1_3)。而据说住在台湾的安溪人的子孙后代，概算起来也超过了二百万。加上东南亚的安溪人，这个数字还会更多。远走他乡的人远比留在安溪的人多，不过安溪仍有八十万人口，这是因为还有乌龙茶的栽培和制茶的活儿可干。

把乌龙茶传到台湾的，不消说一定是安溪人了。而乌龙茶的正宗老家武夷，同样是在福建境内，只是位于北部，接近江西省。武夷地区的人很少移民海外。一般认为，武夷与安溪的地位发生逆转是在19世纪初。这个过程需要付出呕心沥血的努力，而台湾的乌龙茶也继承了这种刻苦勤勉的传统。

味觉基本上都是主观的，而要为茶的味道排出高下次序则尤为困难。我曾在前面提到“韵致”这个词，其解释相当微妙。韵致意为雅致，各人的感受大概存在很大的差别。浓淡过度，也可说是“失韵”。不过这种“度”也是因人而异的。即便口感很香，如果入口后即刻消失，也会被评价为“毫无余韵”。必须在饮后，口齿中尚留有余香，偶尔还在喉咙留有甘甜回味。“浓而不涩，醇而不淡”，这个标准颇为苛刻，不过最基本的是应该有清高的香气。

我曾参加过在武夷山麓的崇安茶厂举行的品茶会。崇安茶厂原是1934年创立的茶叶研究所，吴觉农先生也曾在抗战期间来到这里。战后研究所废止，不久重新在杭州设立，直到现在。1980年我到崇安茶厂访问的时候，那里仍有研究所的遗风。在那里举行的“品茶会”，试饮竞猜的茶品是水仙和铁观音，分别是武夷和安溪的代表。

试饮之前，茶厂的干部给了我一点提示。在武夷的地盘上说这样话大概是很自然的吧，不过若让安溪的人听到了，也许会生气。他说：

**请这么想：水仙是莺莺，铁观音是红娘。**

莺莺和红娘是《西厢记》中的女子，但凡中国人都知道，即使不识字的人也应该在戏里看过。《西厢记》是元曲的杰作，其作者是王实甫。元曲一般是四幕，而这出戏则洋洋洒洒达到二十一幕，是个大长篇。莺莺是个深闺中的小姐，非常贤淑。书生张君瑞暗中仰慕，却不便表露心迹。莺莺的丫鬟红娘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积极为二人牵线搭桥。红娘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活泼开朗，机智伶俐。有许多人喜欢女主角莺莺端庄优雅、深情款款的气质，而红娘的粉丝也为数不少。

将茶比作这两人，大概终归是有内涵的更胜一筹吧，红娘也有被视为肤浅的地方。

根据刚才的提示，我大概能够分辨出两种茶的区别。不过，究竟孰优孰劣则是见仁见智了。红娘率真直白，莺莺温温吞吞。即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其喜好恐怕也会不一样吧。在家悠闲休息的时候，在外紧张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希望喝不同味道的茶水吧。安静的时候，疲劳的时候，开心的时候，难过的时候，人的欲求都会产生细微的变化。

关于“水仙”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相传有个泉州人有一天在建阳县的大湖砍竹子，看到一棵像茶树的大树上开着白花，便折下一枝插在草帽上，顿时清香满溢，于是便试着用来制造乌龙茶。这棵树所生长的地方叫祝仙人洞，因此最初这种茶被称为“祝仙茶”。由于这个地方“祝”和“水”发音相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茶便被称为“水仙茶”了。水仙茶的树较其他茶树高，属于半乔木。移植到武夷的称为“武夷水仙”，另外还有“永春水仙”等。

上面的故事据说发生在道光年间（1821—1850），距今并不久远。那段时期茶叶贸易兴旺，就连沉寂许久的北苑茶也再度复苏。铁观音也罢，水仙也罢，都是在出口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

[[1]](#_1_2)此为作者记录的20世纪80年代的数字，如今已有人口一百多万。

# 龙井

因出口畅销而发展起来的中国茶业，理所当然也会随着出口的不景气而陷入困境吧。造成这种出口衰退的原因是出现了强劲的对手。自19世纪下半叶起，印度和斯里兰卡真正开始了茶树的栽培，中国茶便自此逐渐失去市场。

有一种学术观点称，印度自19世纪下半叶起才开始茶树栽培，但也有人认为是在更早的时期，比如吴觉农先生。其根据之一，就是因为在17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相关文献中有印度人在聚会时经常喝茶的记载。

自16世纪上半叶开始，在印度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庞大帝国的莫卧儿王朝，自称其母系源于成吉思汗，父系源于帖木儿，是从中亚进入到印度的。所谓莫卧儿帝国其实也就是蒙古，毋庸置疑他们到达中亚的时候，肯定会经常饮用茶。在气候干燥的中亚无法栽培茶树，这时饮用的茶叶可能是到了印度之后自行栽培的，或是继续从中国进口的。

第二个根据是，如前所述，1698年到1702年间，大英博物馆收藏有布朗和巴尔克利二人在印度马拉巴地区所采集到的茶树植物样本。

浙江农业大学的庄晚芳教授等四人合力编著的《中国名茶》中记载，第一任孟加拉总督哈斯丁斯的使者曾将锡兰茶带去西藏却未能成功。这是1774年的事情，根据之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在这个时代还不可能有锡兰茶。然而，如果当时南印度的马拉巴确有茶树的话，那么便不能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吧。

所谓哈斯丁斯的使者，大概指的便是乔治·波格尔（GeorgeBogle）。当时，不丹军队正在和印度军队交战，英国介入其中，击退了不丹军队。此事惊动了与不丹有着特殊联系的西藏，班禅喇嘛向总督送去了亲笔书信，希望参与仲裁。为了打开西藏的市场，总督借此大好时机，派去了东印度公司职员波格尔。

对可进入西藏市场的商品有着严格限制。茶叶等大概是销往西藏的非常重要的商品。波格尔可能将产于南印度地区的一种很难称得上是茶的东西带到西藏，因为他认为也许这种东西可被接受。最终未能成功，这大概是因为这种茶叶在西藏远不如想象的受欢迎吧。

英国最初从中国采购茶叶时，主要是买进绿茶。从18世纪初，购入的红茶开始渐渐增多。传说在运输途中，茶偶然发酵，因而出现了红茶。从此便有了将茶叶发酵的制作方法。

中国绿茶中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浙江省杭州市附近出产的“龙井”。在西湖的西南有个龙井村，其附近的山区是绿茶的主要产地，“龙井”因而得名。一般将其统称为“西湖龙井”，而在龙井之中，又属狮峰的茶叶是最上等的，因此狮峰龙井尤为珍贵。

龙井茶的叶子呈扁平，颜色为漂亮的翠绿色。龙井因“色翠、香郁、味甘、形美”四大特征而闻名，称为四绝。

唐宋时期，白居易、苏东坡两位大诗人曾出任杭州地方官。虽然这二人写了不少有关茶叶的诗篇，但那时还没有“龙井”之名。在元朝大诗人虞集（1272—1348）的《龙井诗》中首次出现了龙井相关的诗句。

其中写道：

**烹煎黄金芽**

江南是绿色之乡，山丘和原野都是一片碧色。在这一望无际的绿色茶海中，采茶女红色的布裙点缀其中，看起来分外鲜明。因著有《随园食单》而闻名的清代文人袁枚（1716—1797），曾在西湖畔吟诵一首《湖上杂事诗》：

**烟霞石屋两平章，**

**渡水穿花趁夕阳。**

**万片绿云春一点，**

**布裙红出采茶娘。**

所谓平章，是指公平治理天下。虽然这首诗写的是田园风景，而实际上在当时采茶是项非常辛苦的工作。有不少民间歌谣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比如有杭州民谣《伤心歌》这样唱道：

**鸟叫出门，**

**鬼叫进门。**

**日里摘青，**

**夜里炒青。**

**手指起泡，**

**眼睛发红。**

**种茶人家，**

**多少伤心。**

此外，还有民歌中说，要提起种茶人，皆是外地人。他们全都是从小在嘉兴长大，祖籍为绍兴。也就是都是外出打工的人，只能做庄稼汉不想做的非常艰苦的工作。这首民谣看似牧歌，实际上描述了茶农的艰辛。由于他们所加工的专门用于出口的茶叶，很难转入国内流通，因此经常被压低价格购买。

陆羽在《茶经》中记载，钱塘县的天竺寺、灵隐寺两个庙宇中产茶。钱塘县隶属杭州，这两个寺庙均位于西湖的西岸。

佛教寺庙与茶有着很深的渊源。日本的茶也是由佛教禅僧荣西带到日本的。

明代的童汉臣是防御倭寇的名臣。他是杭州钱塘人，也曾题写了《龙井试茶》一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一吸赵州意，**

**能苏陆羽神。**

意思是陆羽已经成了茶神，能让陆羽复活，是因为吸入了赵州之意（即是说喝了赵州用龙井之泉所泡的龙井茶的脱俗意境)。

唐代有一位叫从谂的高僧，住在赵州的观音院，据说活了一百二十岁，于乾宁年间（894—898）去世。由此可知在空海禅师入唐时，他应该有三十多岁了。从谂禅师先曰：

**喝茶去。**

意思是说请喝茶。客人来时，问：“以前来过吗？”若客人回答：“没有，这是第一次来。”从谂禅师便说：

**那么，请喝茶。**

若客人回答“曾经来过”，从谂禅师也说同样的话：

**那么，请喝茶。**

这被称为“禅茶一味”。达到茶的意境即是参透禅的内涵。人们将这称之为“赵州禅”。佛法也不例外，也会讲授日常茶饭中的事情。在日本把“喝茶”读作“喫茶子（きっさこ）”。童汉臣的“一吸赵州意”即指于此。茶是所悟之道，这不外乎就是陆羽的精神。

虽说茶神陆羽是由于讨厌成为僧人而出走的，但是他在佛教寺庙内长大，在钻研茶道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僧人皎然的影响。佛与茶的渊源极为深远。据说陆羽游历各地所待之处，大都是佛寺。

据说陆羽一到杭州，便会在灵隐寺或西岭草堂留宿。他和灵隐寺的高僧道标交情甚深。道标在灵隐寺后面灵鹫峰以南的西岭建造了草堂，因此道标又被称为“西岭和尚”。陆羽曾在此著有《武林山记》、《天竺灵隐二寺记》。陆羽的著作除《茶经》以外，其他的都已失传。不过，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编订的《临安志》中，引用了《武林山记》和《天竺灵隐二寺记》其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到这两部著作的部分内容。

前面讲到，清代的宫廷夏季饮用龙井。清朝的乾隆皇帝（1735—1795年在位）非常喜欢江南，乾隆期间改建的北京颐和园即是江南风格的庭园。在位期间，乾隆曾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必定会造访杭州。

**我虽贡茗未求佳，**

**防微犹恐开奇巧。**

这是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时，所题《观采茶作歌》中的诗句。贡茗是指进贡的茶，自喻体察下情，不像北宋的诸位皇帝那样对贡茶质量苛求。防微是指，很小、很细微的地方也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即使这般注意了，也还是担心臣子们做不到这般精细。乾隆皇帝借此讲述自己身为明君，对细节非常注意。

第二次南巡时看见采茶。乾隆皇帝立即看出是官员们事先安排的，很不高兴。第二天，采茶没有经过编排，很是自然，乾隆皇帝又看采茶去了，于是心情好转。作诗曰：

**敝衣粝食曾不敷，**

**龙团凤饼真无味。**

不敷，是指对事物无所知。所谓“龙团凤饼”，自不待言是指北宋时期奢侈的茶饼。书画诗文、才情兼备的乾隆皇帝，常常把具有相同喜好特征的宋徽宗当作反面参照。

第三次南巡，乾隆皇帝首次巡访龙井，赋诗《坐龙井上烹茶偶成》，其中开篇这样写道：

**龙井新茶龙井泉，**

**一家风味称烹煎。**

杭州又叫做“武林”。因天竺、灵隐诸山统称为武林山而得名。从山中流向西湖的河流叫做武林水。而武林水还有另外的意思。在杭州一带有优质的泉水，特别是龙井泉、虎跑泉、玉泉、狮峰泉等都非常有名。钱塘县曾一度被改名为泉亭县。像这样周围的水质极优的名泉也都统称为武林水。

龙井后来成为茶的名字，知名度尤高。而在武林水中，水质最好的是虎跑泉。“龙井茶”和“虎跑泉”又被为“杭州双绝”。巧合的是龙井茶、虎跑泉的首字组合起来即为“龙虎”。

传说唐代名僧寰中（性空大师）希望在此留住，但苦于没有水而决定放弃时，当夜梦见神仙命令两虎，搬来南岳的童水泉，以便留住性空大师。结果性空大师留了下来。虎跑泉的“跑”字，是奔跑的意思，说的是两只虎从南岳带上泉水，飞快地奔跑而来。

陆羽的后辈张又新著有一篇论述水的文章，题为《煎茶水记》。文中记录了刑部侍郎刘伯刍曾提到的天下七名水。此外还记录有陆羽向李季卿口述的天下前二十水。然而，虎跑、龙井却并不在七水、二十水之列。

北宋欧阳修对上述道听途说的关于陆羽的言论很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借陆羽之名给水排位次是妄说，与陆羽的《茶经》不符。李季卿其人，由于陆羽身穿“野服”，心中不悦，于是不加理睬。这样的气氛下应该不会讨论有关二十水的详细排序。

实际上，陆羽没有提过关于水的专有名词，只是说缓缓流动的水好，停滞不流动的水不好。所以建议井水还是经常汲取的为好。

1989年，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县收集有关太平天国的材料。渡过县城前面的浔江后大约二十分钟的车程，便抵达太平天国起义地点金田村。桂平县西部有座西山，据说直到隋代，县城都建在此山麓上。西山的别名又叫做思灵山，这里有一眼名水，名曰“乳泉”，还出产名茶。据《桂平县志》记载：

**西山茶，出西山棋盘石、乳泉井、观音岩下，矮株散植，根吸石髓，叶映朝暾，故味甘腴，而气芬芳，杭湖龙井未能逮也。**

即是说西山茶比龙井茶还要好。在这个地方提到龙井，或许可以说是对龙井的另一种赞誉。

中唐时期刘禹锡著有《西山兰若试茶歌》。兰若是指佛教寺庙。这是一首长诗，讲述了西山的茶不亚于蒙山、顾渚。其中写道：

**欲知花乳清冷味，**

**须是眠云跂石人。**

眠云，是指住在云彩很多的山中。跂石，是坐在石头上的意思。也就是说，要真正品尝极品的茶，就必须要住在广西的田园山中。蒙山、顾渚或许真有名茶，但由于封装后在风尘中运输，有些变味了吧。

西山有座龙华寺，现在有一部分已被用作“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历史陈列馆”。这里还有与龙华寺齐名的唐朝末期修建的尼姑庵，名叫“洗石庵”。我走访此处时，庵内有位八十四岁的和蔼的尼姑，法号“释宽能”。她的俗名叫“龙六伟”，广东南雄县人，听说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宽能法师请我喝了茶。她说：“今天的茶味道太淡，因为最近经常下雨的缘故。”

虽然取用了“乳泉”的名水，但由于雨水多，名水也稍微变得更淡了吧。在洗石庵，尼姑开始栽培茶树。1950年，第一次收获了三十斤茶，此后每年都扩建茶园，1957年开始甚至向附近地区卖茶。因为这里的茶叶质量是最好的，因此人们将茶树移植到了土壤等条件和西山很相似的地方栽种。湖南的湘峰茶，实际上就是1970年从西山移植而来的茶树所产。听闻宽能法师说到乳泉水，我不由得联想起虎跑泉，真实地感受到这片土地通过茶而联系在一起。

在日本把用黑釉制作的饮茶用的茶碗叫做天目。这大概是由到天目山的寺院留学的僧人带回来的名字吧。天目山虽然没有烧制器皿的窑，但却产茶。陆羽的《茶经》中虽然看不到龙井的名字，却有天目山出产茶的记录。在浙江和安徽的交界处，有东西天目山，两个山顶上分别有水池，看起来像两只眼睛，故取名“天目”。西天目山上有禅源寺，东天目山上有昭明寺。俗话说，有名刹的地方必有名茶。在此也得到了验证。天目山云雾缭绕，此地出产的“云雾茶”非常有名。但是云雾茶的名称好像各地都有，庐山也有与之同名的茶，我以前还买过。

天目山的支脉径山出产的茶也很有名。当地也有寺庙，名为“径山寺”。浙江的慈溪县也产茶，根据元代的《四明续志》考证，资国寺山的茶为最上等，其次为开寿寺附近的茶，而有关水只记载了化安寺的水。这些名茶名水全部都与寺庙有关。

北宋欧阳修所著的《归田录》中记述说，浙江是盛产茶叶的地方，日铸居第一。“日铸岭”位于会稽、山阴（绍兴）。据嘉泰《会稽志》中记载：

**昔欧冶子铸五剑，采金铜之精于（日铸岭）山下。**

说日铸岭乃是春秋时期名匠欧冶子铸造献给越王的五把名剑的地方。地名中的“铸”字，大概与“冶炼金属”有关吧。但是，与冶金相比，后来此地的茶更被人们所知晓。有时地名中的“铸”字，被改成了相同读音的“注”字。这就是对当地茶好的说明了。这也可看出茶与佛寺的关系至深。

舟山列岛中有名为“普陀山”的一座岛屿，这是众所周知的中国最大的观音灵地。距离该岛稍远处有座小岛，名为“洛迦山”。“普陀山”和“洛迦山”并称“普陀洛迦”，即取自南印度的观音灵地普陀罗（布达拉宫）之名。普陀山是一座面积只有十二平方公里的小岛屿，据说这是唐代时由日本僧人慧萼所创建的。慧萼是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录的真实人物。在明代，这里还是倭寇的根据地。此地和日本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自以前的遣唐使以来，到近代的长崎贸易，明州（宁波）一直都是中日往来的重要地点，普陀附近海面是必经之地。普陀山有普济、法雨、慧济三座寺庙。其中普济寺最大。这里也产茶，名为“普陀茶”。根据《定海县志》的记载：

**可逾肺痈血痢，然亦不甚多得。**

可见，普陀山的茶是真正的观音灵地的茶，可治愈疾病。

1985年10月底我访问了普陀山。普陀茶不是随处有卖的。正如《定海县志》中所说，至今产量仍然很少。

“普陀茶”又被特别称作“佛茶”。山中有被称作“神水”或是“洗眼池”的水池。传说水池里的水是佛尿。患有眼病的人，用此水洗眼，便可立即治愈。这里是聚齐名刹、名茶、名水的地方，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地方为数不多。

根据《定海县志》的记载，舟山列岛的茶中，野生品种很多。查阅《园茶》可知，其香味很差，桃花山出产的野生茶香味还算好些。不管怎么说，“普陀山”的“佛茶”成为佛教与茶紧密相连的名称。

# 松萝山周边

与普陀山隔海相望的舟山岛上有定海县城。舟山岛是舟山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鸦片战争期间，被英国所占，成为英军的基地。

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要逼迫清政府割让中国沿海附近的岛屿，使之变成殖民地，成为通商据点。备选的据点有二，一为香港岛，一为舟山岛。在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内部，香港派和舟山派争论不休，最终选择了香港岛。其主要理由在于，一旦事态紧急，需要从印度调遣援军，那么香港的距离更近。另外据说还因为在鸦片战争期间，占领了舟山的英军染上了瘟疫，英人遂认为舟山的水土不利于健康。

英国对中国进行了缜密的调查，发现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产业具有很强的潜在活力。鸦片战争之后，英国陆续取得特权，主要都集中在长江流域。甲午中日战争前夕，日本曾就开战的问题打探英国人的意向。当时英国人回答说，只要能够保证战火不影响长江流域，他们便没有介入的意思。英国人图谋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当作本国的势力范围。

假如英国人果真有这样的如意算盘，那么为了保护自身的权益，与香港相比，舟山的地理位置当更为有利。然而，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大概最受重视的便是与武力大本营印度之间的距离吧。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甫一获许前往中国内地旅行，爱好调查的英国人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对中国的产茶区域进行实地调查。由于茶是重要的进口商品，因此此前也曾对茶进行过调查，然而即便是载于《中国丛报》的威廉姆斯的论文，也只是通过文献以及采访中国人获得材料，并非实地考察的产物。

1848年，罗伯特·福琼（RobertFortune）受东印度公司的采集茶树苗和种子的委托，来华开展调查，寻找适宜于移植到印度的优良品种。他的旅行记于1852年在伦敦出版，名为《中国与印度的产茶区》（Tea-DistrictofChinaandIndia）。全书共有22章，其中介绍印度的只有最后两章，因此几乎整本书记载的都是中国旅行的情况。

这本旅行记的记载始于1848年8月14日上午9时，蒸汽船布拉甘萨号（Braganza）抵达香港之时。事实上，他为了解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我在写作鸦片战争等以19世纪的中国为背景的小说时，总是要拿起这本书一读再读。

福琼是茶专家，著有论述中国茶与印度茶区别的论著。他游历了中国的产茶区，自信地断言说最好的绿茶产自安徽省的松萝山一带。那是位于屯溪市西北部的一处山地，在闻名的旅游胜地黄山以南。在福琼书中所附的地图上，还特别地将此处区域印刷成绿色。

欧洲一开始喝的也是绿茶，到了18世纪中叶，红茶才占据上风。19世纪的欧洲已进入了红茶时代，不过，红茶、绿茶同样都是茶，只是制茶法不同而已，于是福琼也对优质绿茶的产地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似乎有传言说，松萝山是中国最早的绿茶产地。福琼也提到了这一点。

现实中的松萝山是一片荒芜的土地，福琼到了那里，报告说过去如何姑且不说，如今茶树却极为稀少。虽然寺院的僧侣也采摘茶叶供自用，但那些茶树的样子实在惨不忍睹，简直不能称之为栽培的茶树。

松萝的名声自明代以后才广为人知。《茶疏》被认为是明人许次纾在17世纪初所写，书中提到：

**歙之松萝，吴之虎丘，钱塘之龙井，香气浓郁，并可雁行。**

这是说吴县（即苏州）的虎丘茶也是好茶，松萝茶与龙井等相媲美，与岕茶不相上下。雁行是指大雁并排飞行的样子，虽然略有落差，但大致是处于同一列上。岕茶即罗岕茶，许次纾记述道，罗岕茶大概是唐代的紫笋茶，名称因时代变迁而发生了变化。有时误以为是新面孔，其实只不过是名称不同而已。

松萝茶恐怕并不是罗岕茶，这个名称是明代突然出现的。许次纾同时代的冯时可在《茶录》中写道：

**徽郡向无茶，近出松萝茶，最为时尚。是茶，始比丘大方，大方居虎丘最久。得采造法，其后于徽之松萝结庵，采诸山茶于庵焙制，远迩争市，价倏翔涌。人因称松萝茶，实非松萝所出也。**

福琼到过的松萝山并非荒废了，它原本就不产茶。而是因为比丘大方这个人在那里居住，采摘诸山的茶加以焙制，故得名松萝茶。大方在虎丘居住许久，而虎丘则是名茶的产地。

虽说采摘的是诸山的茶，却也不能走得太远。尽管松萝山并不产茶，但其附近地区却有很多地方出产好茶。

从安徽省南部到江西省北部，以松萝山为中心，北有黄山，南有婺源，西有祁门，距离大致相同。比丘大方的出行半径，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吧！这些地方都是名茶的产地。

黄山乃天下名胜，过去有被称作“黄山派”的画家曾在这里居住。黄山是一处大型山脉，海拔千米以上的高峰多达百余座，延绵一千二百多平方公里。桃花峰、桃花溪两岸的云谷寺、松谷庵等寺院周边盛产茶叶。这里也展现了佛寺与茶之间的密切关系。这里的名茶叫“黄山毛峰”，据说自光绪初年始闻名于世。那个时候是1875年，鸦片战争也已过了三十多年。“黄山毛峰”也并非突然冒出来的，而必定有其“前称”。有人认为宋代的贡茶“早春英华”、“来泉胜金”等便是“黄山毛峰”的前身。无论如何，福琼应该没有听过“黄山毛峰”的名字。

江南省的婺源有着悠久的历史，陆羽在《茶经》中提道：

**歙州生婺源山谷。**

婺源的茶名为“珍眉”，享有很高的美誉。1958年，人们移植了上梅的优良品种并加以改良，以“名梅”或“茗梅”的新品牌面世。上梅是武夷附近的名茶产地。

位于松萝山西边的祁门县一带，以出产红茶“祁红”而闻名。直到最近，中国人还不怎么喝红茶，几乎所有红茶都只用于出口。因此其历史自然不必回溯到开始向外国出口红茶的17世纪以前。

祁门县红茶的生产历史虽然较短，但其前史却很长。唐咸通三年（862）歙州司马张途撰写了《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文中描述了茶商云集的情景：每年一到二三月的时节，便“摩肩接迹而至”。

源于黄山山脉的昌江从祁门的一旁流过，经景德镇流入鄱阳湖。景德镇这个地名自然是得自宋景德年间（1004—1007），唐代这个地方叫新昌或浮梁。顾名思义，浮梁指的是浮桥，水上交通非常便利。景德镇之所以能够成为陶瓷之都，除了拥有优质的瓷土——高岭土之外，恐怕也是得益于水路之便，有利于商品运输吧。由于这里是瓷器以及其他商品的集散地，唐代的浮梁、祁门也是茶的集散地，茶商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

白居易著名的《琵琶行》描写了长安歌妓容色衰退、漂泊他乡，如今嫁作商人妇的故事。她的丈夫似乎是茶商。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商人重利轻离别，**

**前月浮梁买茶去。**

就这样，商人离开家人，为采购茶叶而奔忙。

当时祁门茶不用说当然是绿茶。据说其制茶法与六安茶相似。六安也在安徽省，位于江北地区。六安茶同样也是誉满天下的名茶。《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拢翠庵品茶一节中有这样的情节：妙玉正欲献茶，贾母便说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莞然一笑，回答说：“知道。这是老君眉。”

“老君眉”是岳州（现在湖南省岳阳市）所濒临的洞庭湖上的君山岛所产名茶。李白在《游洞庭》一诗中咏叹君山道：“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故君山的名声颇高。

提到湖中岛所产之茶，当数太湖中的岛屿洞庭山所产名茶的碧螺春。由于名叫洞庭碧螺春，难免被误以为与洞庭湖有关，其实并非如此。

说到在《红楼梦》的舞台大观园中登场之茶，大概应该都是顶级绝品吧。“老君眉”现在称为“君山银针”。给贾母泡茶用的水是旧年所积蓄的雨水，而给黛玉所用的则不同，那是妙玉五年前在蟠香寺收的梅花上的雪，总共只有一花瓮，埋在地下。这种饮茶法恐怕有些过分吧。

六安茶的茶叶呈瓜形，因此被称为“六安瓜片”。据说绿茶时代的祁门茶，因与之相似，被称作“安绿”。这种祁门茶不久变成了红茶。

关于祁门茶由绿变红，存在若干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祁门红茶始于光绪元年（1875）一个名叫余干臣的人。余干臣是安徽人，曾在福建当差。当时正值福建的功夫茶出口最繁盛的时期，茶界出现了许多暴发户。由于自己的家乡是绿茶产地，余干臣大概对此有特殊的兴趣。被称为功夫茶的红茶，原本也是绿茶，只是焙制法不同而已。若是这样，安徽的绿茶也应该能够制成红茶。他便在安徽的至德县（现在的东至县）开设了制茶工厂，以功夫茶为蓝本，开始生产红茶。或许因为他在福建当差的时间很长，连销售茶叶的门路也都一清二楚。次年，深谙茶之门道的余干臣又在祁门县开设了红茶厂。

第二种说法认为祁门红茶的起源是胡元龙于1876年在祁门日顺茶厂生产的茶叶。

1875、1876年正值日本明治八、九年。尽管往事并不遥远，但红茶的源头却已显得扑朔迷离了。

虽然是模仿功夫茶，祁门红茶却比福建的功夫茶更香，这为其带来了很高的美誉，不久便成为出口红茶中顶级的产品。

祁门红茶被用于与大吉岭所产之茶混合。大吉岭红茶味道醇厚，却略输香味。祁门红茶与之相反，味道稍逊而茶香满溢。将两者相混合，便可得到完美的红茶。

有一种混合茶将花香渗透到茶叶中。这种茶叫茉莉花茶。茉莉原产阿拉伯，大概也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到东方的吧。

不过，说起中国最初在茶中所添加的花香，想必用的是菊花吧。前面所引用过的诗人皎然另有一诗《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其中有诗句说到菊花乃助茶香之物。九日是重阳，人们有将菊花泡在酒中品饮的习俗，然而与酒相比，菊花与茶更为般配。

茉莉花茶的历史并无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长。那是发生在咸丰年间（1851—1861）即鸦片战争以后的事。福州沿海地带有一个长乐县，那里制茶业者很多，世称“长乐帮”。“帮”是集团的意思。当时北京的正大商行来到长乐开设工厂，生产鼻烟。鼻烟中加入了茉莉花熏制，甚为芳香，受到官僚豪绅的青睐，产品非常畅销。长乐帮从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中的李祥春、生盛、大生福等茶铺认为，如果在茶中同样加入茉莉花，一定能够给茶带来绝佳的香味，于是着手进行试制。

福州附近不产茉莉花，他们便在广东开办工厂，从松萝山周边即安徽运来茶叶，加入茉莉花熏制。不久福州也成功栽培出茉莉花，于是他们便陆陆续续返回老家福州附近。时间大约已经到了1890年前后。从此，福州成了全中国“花茶”的中心。1930年左右，杭州也开始生产花茶，战争期间苏州的花茶产量有所增长。

除了茉莉花之外，花茶中还有使用玉兰花等香气浓郁的花进行熏制的。

# 茶风西渐

马可·波罗在其《东方见闻录》中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情况。然而，对于应该称为中国象征的万里长城以及茶，书中竟然只字未提，这两点令人难以理解。

元朝设大都和上都两处首都。大都便是现在的北京。按照惯例，皇帝每年二月末均从大都动身前往上都，直到九月末才返回。上都位于滦河上游的多伦西北。皇帝率领政府诸司通过居庸关，越过6世纪下半叶北齐时期所修建的长城，往返于两都之间。马可波罗肯定屡次随队伴驾，沿途理应看到长城，为何对之只字不提？元代的蒙古人嗜茶之风不逊于汉人。马可·波罗无论走到哪儿，想必都有好茶招待吧。他在书中既然讲到了用米酿造的酒和像柴一样可燃的石头（炭），却没有提到茶，这实在很奇怪。也许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了，无意中竟然忘记了吧。

第一个喝茶的欧洲人到底是谁，自然是无从考证了。然而，马可·波罗大概是最早喝过茶的其中一位欧洲人吧。他在13世纪下半叶的十七年内在中国居留，当时茶叶归由政府专卖。

15世纪末，瓦斯科·达伽马（VascodaGama）发现了绕行好望角、通往印度的航路，至16世纪初，葡萄牙人便来到广东。有人认为，这是欧洲人与茶的第一次接触。然而，这时距离马可·波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而且可能在马可·波罗之前，便有欧洲人喝过茶了。相比之下，由于留存有贸易往来记录，茶叶的进口时间则比较明确。1609年，荷兰人在日本平户设立商馆，次年，日本茶便经由爪哇向欧洲出口。

抛开欧洲人在中国居留所饮的茶，抑或经由船员、旅行者作为珍贵土产带回本国的茶，我们可以认为，从这个时候起茶被真正地介绍到欧洲。

将茶带回欧洲的是荷兰人，所带之茶是日本的绿茶。然而，英国逐渐占据了茶叶贸易的主导权，而中国茶则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其中虽然也有日本闭关锁国的关系，然而荷兰是准许到长崎进行贸易的，因此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在竞争中胜出。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英国喝茶的风俗得到更为深广的普及。对于这种现象其中一定会列举的一条理由是，英国的水更适宜用来泡茶。还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盛产葡萄酒，德国则有啤酒，唯独英国缺少称心如意的饮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管怎么说，对于欧洲而言，茶是14世纪之后才引进的舶来饮品。最初当然物以稀为贵，据说被当作药放在药房里称重出售，教士喝茶以驱除布道时的睡意。

荷兰医生尼古拉斯·迪尔克斯（NikolasDirx）论述道，茶可包治百病，是长寿的妙药。对此也有相反的意见。德国医生西蒙·鲍利（SimonPauli）将茶之害与烟草之弊相提并论。法国医生盖伊·帕丁（G.Patin）将茶贬斥为不受欢迎的东西。这些言论都发表于17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正处于欧洲饮茶的摇篮期。

即便在英国，喝茶的习惯也并非顺顺当当地被人们所接受。

1744年，苏格兰大臣福布斯（Forbes）批评喝茶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使人懦弱。当时苏格兰与英格兰合并方才三十多年，福布斯对苏格兰那些英格兰化的贵族以喝茶为乐非常反感。“宁喝啤酒不品茶”便是当时反茶运动的口号。

在英格兰，阿瑟·杨（ArthurYoung）、乔纳斯·汉威（JonasHanway）等人认为喝茶浪费时间，有害健康，妨碍工业发展，使国民陷于贫困，因而发起了反茶运动。

与福布斯同一时期的、卫理公会派教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发起了反茶运动。此公本是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正如在牛津大学时召集一干信仰相投的人成立了神圣俱乐部（HollyClub）一样，他喜欢集会结社。神圣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循道派”（Methodist），后来成为卫斯理所创立的教派的名称。在反茶运动中，他也是积极分子。

卫斯理首先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为茶对健康有害。他声称年轻时吃过早饭后手经常颤抖，而停止喝茶之后便不治而愈，而有同样症状的人在减少喝茶量、增加牛奶和白糖后，病症便有所缓解。因此，他决定发起“禁茶运动”。

卫斯理是这么想的：开导拯救烦恼的人们本是教士之职责，既然知道了茶之弊害，就不能只是明哲保身，还必须保护民众不受其害。于是，他在1746年7月6日礼拜日这天，发表了禁茶宣言，倡议将戒茶而节约下来的钱捐献出来，用于救济贫民。据说有一百名会员对此表示赞成，不再喝茶，这一年年底救济了250个贫民。

手颤必定另有原因。当时工业发展非常迅速，伦敦周边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想必是造成手颤的其中一个原因吧。至于戒茶或减少喝茶量之后症状有所缓解，大概是心理作祟吧。

卫斯理在书信中透露，禁茶后实际上很痛苦，常常头疼失眠，还会引发失忆，不过只要向神祷告，所有的症状便会消失。

卫斯理逐渐意识到，将茶当作恶魔似乎是没有道理的。第二年，他宣称遵从医嘱，停止了禁茶。此后，他成为天底下最好喝茶的人，活到八十八岁。

到了卫斯理晚年，卫理公会派的信徒人数已达十三万，伦敦也有许多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每个礼拜日都要聚集到教派创立人卫斯理的家中共进早餐，席间一定都会上茶。不仅如此，据说卫斯理还会亲自用自己特制的大茶壶，为传教士们斟茶。此举不仅意味着茶的解禁，还可说是带有鼓励的意思吧。卫斯理是重视经验和实践的人。从经验中判断茶有害，他便发起了禁茶运动。同样，一旦从经验中得知喝茶反倒有益，便转而提倡，乃至亲自斟茶。他的行为绝非矛盾。直到今日，卫理公会对于禁酒禁烟运动仍然极为热心，不过幸好禁茶运动已无人再提。

由于生活方式大相径庭，茶叶虽然传到了欧洲，但是中国的饮茶氛围却无法原样炮制。只是饮茶时悠闲自在的心境，从根本上而言大概是共通的吧。

在英国，茶备受文人钟爱。大文豪萨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756年，伦敦绅士汉威在《八天旅行记》等著作中阐述了反对喝茶风俗的意见。对此，约翰逊于次年在《文学杂志》（LiteraryMagazine）中发文反驳：

**我的烧水壶总是热腾腾的。晚上品茶为乐，入夜则用茶解闷，清晨需借茶清醒……**

18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这个时期针对茶的利弊之辩非常激烈，而这一习惯的形成，可以说意味着褒贬双方明确地分出了胜负。到处都开设了茶会（teaparty），就连宾馆、剧场也都供应下午茶。1879年即日本明治十二年，火车上开始提供下午茶的服务。

爱喝茶的文人很多，包括诗人蒲柏（AlexanderPope）、雪莱（PercyByssheShelley），散文家兰姆（CharlesLamb）等。这为茶的普及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柯勒律治（SamuelTaylorColerige）因吸食鸦片成为有名的瘾君子，同时也是好茶之人。文艺评论家哈滋里特（WilliamHazlitt）是柯勒律治和兰姆的朋友，他将茶称赞为“智慧之水”。

茶比酒更有益，这一论据对于茶在英国的胜利，提供了相当大的支持。劳工当中有喝浓烈的杜松子酒的习惯，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如果茶能够取而代之，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

由于茶和酒都是奢侈品，这一共通之处使得人们经常将茶与酒相提并论，互较长短。20世纪初，中国敦煌发现了大量的文物，这是非常著名的一段往事。其中包括不少已经亡佚的十世纪以前的抄本。在印刷术发明之前，由于不可能制作那么多的抄本，有不少因战乱或天灾而散失，一部也留存不下来。在敦煌发现的文物中，既有原来只流传下题名而抄本正文散失的，也有连题名都没有流传下来而首次发现的，其中就有《茶酒论》这样一本书。

这部书成书于唐代，最晚也不超过五代，共发现了同样的书七部，可见当时常被人阅读。其中被斯坦因带走两部，伯希和带走四部，现各自收藏于伦敦和巴黎，剩下的一部存于北京。

《茶酒论》采用问答论争文的形式，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种类型。古代汉朝司马相如所写的《子虚赋》采用的就是这种文体，由子虚、乌有先生和亡是公三人进行问答，论述诸侯之游猎、楚国之华美等，最后得出节俭为好的结论。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等都采用了这种文体。

在日本，可称作空海之信仰宣言的《三教指归》也是通过龟毛先生、虚无隐士、假名乞儿这三个人的问答，对儒、道、佛三教进行比较，最后以佛教为佳作结。明治初期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论问答》也可说采用了同样的套路。

在敦煌石窟中沉睡了上千年的《茶酒论》将茶和酒拟人化，让他们自己说话。作者是唐的乡贡进士王敷。在唐代的取士制度中，从学校选拔的称为学生，而向州县的长官推荐的称为乡贡进士。

《茶酒论》全文采用韵文写成，开始茶先登场自我介绍。

**百草之首，**

**万木之花。**

**贵之取蕊，**

**重之摘芽。**

**呼之茗草，**

**号之作茶。**

**贡五侯宅，**

**奉帝王家。**

就这样，茶先炫耀一番。以“花”、“芽”、“茶”、“家”结尾，每隔一行押韵。供奉弥勒佛和观音菩萨，这是茶最得意之事。另外，茶还夸耀道，自己能给人们带来大富大贵：

**舒城太湖，**

**买婢买奴。**

**越郡余杭，**

**金帛为囊。**

舒城、太湖、越郡、余杭都是茶的产地，为了表现其繁荣景象，作者用买奴买婢来形容，大概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吧。

接着是酒的发言。管弦、唱歌、舞蹈等，无不与酒有着密切关系。饮酒可助笙歌舞乐戏剑之乐，试问茶怎能做到？

《茶酒论》中有趣的是，正当茶和酒滔滔不绝地展开口水战时，不料“水”竟登场了。水刚才就在一旁听着二者的争论，茶和酒却浑然不觉。

茶和酒同样都不能缺少水。从水的角度来看，它与二者都有关系，于是主动请缨，担当裁判。

**从今已后，**

**切须和同。**

**酒店发富，**

**茶坊不穷。**

**长为兄弟，**

**须得始终。**

由于水兄的调停，茶酒得以言归于好。

不过，如果在基督教的社会中茶和酒展开彻底论争的话，显然酒将最终败北。

但凡新进之物，都不免令人生疑。对于欧洲人来说，茶是舶来品，因此一开始就受人质疑，甚至横遭指责。然而，一旦与原有之物——酒相对比，茶便立即显示出优越之处。

酒喝多了有人会耍酒疯，而茶喝多了却不会。总之，喝茶总不至于给人造成麻烦。对茶的一种批评是认为喝茶过于奢侈。从清教徒崇尚精神的标准来看，与其如此无端浪费，还不如将茶钱捐出进行慈善活动。然而，随着茶的进口量增加，价格便不断下跌，茶作为一种奢侈品的色彩便完全消退。茶受谴责的论据便基本站不住脚了。

1840年，威廉姆斯在《中国丛报》所发表的论文，便从《爱丁堡评论》（EdinburghReview）中引用如下文段，作为文章的开头：

**这一著名的植物之发展，是与真理之发展一脉相通的。初时只有敢于享受其味道的人才会品味，而普通的民众则投以怀疑的目光，稍有发展即遇障碍，似得称赞又遭非难。然而，在不舍昼夜向前奔走的时间之流中，其自身所具有的价值便显露出来，终于上至庙堂之高，下及江湖之远，举国之内，处处无不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有些人来说，茶之奢华尊贵也许具有超凡的魅力。品饮着被作为高级药品在药房论秤出售的茶，内心雀跃之际，大概有着不可言说的乐趣吧。

等到茶叶普及，价格下跌至普罗大众都能接受的地步，其魅力则多少会有所减少吧。然而，极品之茶终究价格甚高，茶之奢侈性仍不至消减。

在营造品茶氛围时，如若追求的是奢侈程度，则将永无穷尽。在自己做东的茶话会上能够请到何种级别的人物赏脸光临，可谓是反映其奢侈品级最为重要的晴雨表。英国是一个等级社会，主人如若想要邀请到层级高于自己的人物，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举。恐怕平日里就必须频献殷勤吧。而如果决定发动豪华的礼品攻势，钱财再多也会犹显不足。

茶的用具也是如此。人们的趣味自然与中国或日本的不同，英国人终究会追求英伦格调的精美茶具。人们在喝茶的时候，也有借助东洋意趣营造氛围的。可以说，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喝茶便是东洋的意趣，虽然地理上相隔千万里，但却是一种精神上的接近。

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曾说过，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然而，当他试图用诗句来表达这个意思时，我们大概就已经感受到东西方的接近了。在一定程度上，茶为拉近东西方的距离发挥了作用。

当18世纪下半叶茶在英国开始普及时，中国的景德镇迎来了全盛时期。臧应选、郞廷极、年希尧、唐英等杰出人物曾督管过景德镇的陶务。以茶叶末儿这一荞麦釉为代表的“臧窑”、因浓厚的釉里红而为人所知的“郎窑”、凭模仿宋代官窑的青瓷而知名的“年窑”等，在技术上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供皇帝贴身赏玩的小型器具系列被称为“古月轩”。在这个时期，这里不断进行试验，试图重新复制由传说中的人物壶隐老人所制作的“流霞盏”、“卵幕杯”。大概由于景德镇属于御器厂，预算全额由国库支给，才可以如此行事吧。

在英国，若想为茶增添奢华品味，只要在茶桌上放上古月轩的茶碗即可。即使在中国，民间要想得到珍贵的器具，则必须花大价钱。而要在英国得到同样的东西，所费应当更高。

从“卵幕”等词可看出，景德镇瓷器的特征在于胎薄。越高级的越薄，最上乘的则薄如“卵壳”。

英国人在冲调奶茶的时候，总是先倒好牛奶，然后再将茶混入。究其缘由，据说原来是因为景德镇生产的茶碗太薄了，如果猛然倒入热茶，担心茶碗破裂，因此先倒牛奶。实际上，不管瓷胎有多薄，景德镇生产的优质茶碗，也不会因热水爆裂。

欧洲各地也有瓷窑，当然都是为了仿制中国的瓷器而建的。这也说明了以茶为媒介拉近了东西方之间的距离。

前面讲到，不再禁茶的约翰·卫斯理在晚年的时候，每个礼拜天都会招待伦敦卫理公会的传教士们共进早餐，并亲自手持茶壶走到席间为众人斟茶。当时所用的茶壶，是陶艺家威基伍德（J.Wedgwood，1730—1795）为卫斯理特别制作的。正是这个威基伍德，将瓷器的手工作坊转变成大工厂，通过量化生产而得以供应廉价的产品。便宜的茶杯茶壶的出现，也一定为茶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 茶事拾零

茶的特点在于，它既可能是日常必需品，又可能是奢无极限之物。

有人认为，既然是奢侈品，对其课税大概也无妨。因为买茶的都是有钱人，即使征收巨额的税金，他们也应该满不在乎的吧。这种看法一般说来并没有错，但茶同时还是一种必需品。在《中国丛报》中撰文论茶的威廉姆斯表述了如下不满：

**在对人的福利有益的商品中，像茶这样成为课税对象的实在罕见。**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向每担茶（六十公斤）征收纹银二两半的出口税，若再加上行商（即广州的特许商人）的其他税费，每担茶的税负达纹银五两。而在东印度公司垄断对华贸易的时期，出口税高达六两七钱，到了自由贸易阶段出口税才下降。1834年，东印度公司退出了对华贸易。

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开禁贸易的出口港仅限于广州一地。据说从茶叶产地到广州的途中，还设有几个关卡征收税金。而运抵英国之茶，则必须支付一镑二先令一便士的税金，这相当于最便宜的茶原价的一倍。威廉姆斯指出，若再加上运费、手续费、保险费和其他必要的费用，在英国销售的价格则达到原产地价格的四倍。

向奢侈品征税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有人认为，正因为茶叶是必需品，所以应当对之课税。反正为生活所需，即使稍微加征一些税收，人们也不能不买。中国历代王朝都将盐和茶作为官营专卖，这是一种一网打尽的课税。可谓苛政是也。

据威廉姆斯的记述，欧洲大陆各港口茶叶的进口税一般都是从价税，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各港口，茶叶却是免税的。他对此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因为茶之输入，对国内产业并无损害，免税的做法有合理的依据”。不用说，他在这里含蓄地批评了英国的茶税。

美国不对茶叶征收进口税，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原本美国之所以谋求独立，反对茶税运动便是其导火索。

在卫斯理开始建立卫理公会的时候，英国对于美洲殖民地并没有太多干涉。在北美大陆，殖民者的人口远比原住民多，英国也不像在印度所表现的那样紧张。殖民者之所以移居殖民地，为的是追求政治和宗教的自由，个性本来便不喜受人干涉。他们对于宗主国所制定的法律，凡是有不合己意的，一律视而不见。在税收问题上也是如此，虽有税法，人们却从未依法缴纳。他们也有自己的主张。这些税法的制订机构是宗主国的议会，并无殖民地代表的议席。他们不愿受没有反映殖民地民意的议会的约束，这是一种合理主义的看法。

从宗主国派来的总督和高级官僚的薪水，是由殖民地负担的。而人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为什么还得按规定纳税。大概英国方面也默认了这一点，长期以来，倒也相安无事。而一旦宗主国本土发生了财政困难，打理国家大事的政治家们，自然把目光转向了殖民地的税收。

从18世纪50年代起，英法两国在世界各地展开霸权之争，最终以英国的胜利而收场。

1756年爆发的七年战争，本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武斗，而奥地利的背后有法、俄两国为之撑腰，普鲁士则有英国为之壮胆。英法两国同时还在印度和北美交战。

1757年，英国在印度普拉西（Plassey）大胜法国。

1759年，英军攻陷北美的法军基地魁北克（Quebec）。因为法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对英国殖民地形成了包围之势，英国遂派遣本国军队前往救援。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长期打战的英国自然陷入了财政捉襟见肘的地步。英国国内的政治家自然打起了殖民地税收的主意。这本来就是应该征收而没有收到的税金。何况这一次为的是从国内调遣援军，帮助殖民地击破法军的包围。而殖民地一方原本也有自己的说法。宗主国政府自作主张与法国开战，才会使我们陷入包围圈。宗主国自食其果，向殖民地派遣援军是理所当然的事，请不要摆出恩赐的臭架子。

陷入财政困局的英国政府，继1764年的《食糖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之后，又颁布了《唐德森条例》（TownshendActs）。

宗主国议会的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地主。财政大臣唐德森希望通过增加关税而减少地租。若要照顾到地主的利益，难免有人为此受到影响。殖民地便是转嫁的对象。

《唐德森条例》中的《收入法》规定，殖民地所进口的玻璃、纸、茶等商品必须纳税，且这些商品必须从英国出口。英国当局还宣称，此举是“为了加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联系”。

这些政策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运动，英国从本国派遣军队进行镇压。由于武力镇压无效，英国政府最终不得不废除了《收入法》。

英国另想他途，于1773年颁布了《茶税法》。收入法说的是要加强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联系，但为何对本国的商品还要征税呢？这是反对收入法运动的逻辑基础，由于很有说服力，反对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确实，对英国制造的玻璃和纸还要在英国的殖民地征税，实在没有道理。不过，由于茶是中国生产的，征税是很自然的。

然而，北美大陆的市民却群情激昂。《茶税法》是一部为了取缔偷税的走私茶、确立东印度公司的市场垄断而制订的法律。北美人民一直喝的是法国和荷兰商人偷运来的便宜的走私茶。如果被严格取缔，他们就只能喝很贵的茶了。

1773年12月16日发生了波士顿茶叶事件。人们袭击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将船上装载的茶叶扔到海中。对此，英国议会制订了惩罚性的法律，因此殖民地设立了“大陆会议”，展现出抵抗到底的姿态。1775年4月发展成武力冲突，独立战争打响。这场以《茶税法》为导火索的战争，导致北美大陆于1776年通过了《独立宣言》，从英国的统治中脱离出来。

美国独立战争和鸦片战争等世界史上的大事件，与茶都有着紧密的联系。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大概是世界史上最大的事件吧。而鸦片战争则拉开了东亚近代史的序幕。

这两大树干派生出许多枝叶。仔细想想，可以这么说，我们平常喝的茶在某种意义上都深深投射到这两大主干的枝叶上。

许多人纷纷移居美洲新大陆，不久建立了独立的国家，这个过程是以安全的大船的成功制造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为深刻背景的。如何将中国茶大量且迅速地运抵目的地，一定刺激了英国造船工学和航海技术的发展。

茶是市场价格变动很激烈的商品。一般而言，第一船运抵的新茶价格最高，第二船、第三船的市价则逐渐回落。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前，运茶船需要绕经非洲南端，航路很长。

在好赌赛马的英国，人们针对哪艘船能成为运载中国茶的第一号船而开设赌局，称为“赌茶”。

1850年，美国东方号帆船满载着一千五百吨茶叶，从香港启程，经95天的海上航行抵达伦敦，这段故事流传开来。现今保存在格林尼治并成为威士忌商标的“卡蒂萨克”号（CuttySark）船头有缠着羊毛的标志，原是从澳大利亚运送羊毛的船。这艘船在建造时，是作为运送中国茶的运茶船（tea-clipper）而设计的，实际上曾八次航海运输茶叶。“卡蒂萨克号”总吨位不足一千吨，而据说同一时代的运茶船甚至有两千吨级的大型船。

卡蒂萨克号服役的年代正是蒸汽船取代帆船的时期，再加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等因素，运茶船便逐渐落伍于时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卡蒂萨克号”建造的那一年，苏伊士运河开通。

在因为茶而爆发的独立战争期间，美国遭受英国的海上封锁。为了突破封锁，美国颁布了掠夺许可证（Letterofmarque）。由于捕虏外国的商船不会受到惩罚，许多冒险家纷纷下海谋求发展。人们认为，自此以后，原来的农业移民国家美国便增添了海洋国家的色彩。

独立后，美国便独自开展对华贸易。1784年2月22日，中国皇后号（EmpressofChina）从纽约起航，船上满载着人参、毛皮、棉花、铅、胡椒、羽纱等货物，于同年8月28日抵达广州。

英国为了抵销茶叶进口而开发了产于印度和西亚的鸦片。然而，美国由于不产鸦片，为对华输送货物而疲于应对。

直航第一船皇后号上所载的美国人参产于美国东部，如今在中国仍然售价很高。这种人参是18世纪最初的十年耶稣会的拉菲德神父在加拿大发现的。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记载，1750年法国东印度公司曾将四十担美洲人参运到广州。中国称之为“洋参”或“广东人参”。不过，好像在此之前也有美国人参出口到中国的。日本在延享四年（1747）以后，有清朝商人将广东人参带到长崎。这些人参肯定就是美国人参。

美国对华输出的毛皮，最初主要是海獭皮。海獭是1758年才被发现的动物，被残忍的人类所猎杀，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商品。由于市价很高，海滩遭受人类滥捕，几近灭绝。1911年，通过国际条约禁止捕猎海獭，作为暴发户象征的海獭皮围巾便逐渐失去踪迹。

据说当时广州的海獭毛皮一张售价25美金。而最初用一条铁项链便能从原住民的手里换到三张海獭皮。

1788年，美国“埃雷阿诺拉”号将海豹皮成功运到广州。这是新的商品。由于海豹此后也遭受滥捕，现在也是禁猎的动物。

海獭和海豹都在北太平洋繁衍生息。据说海獭因受到保护而不断繁殖，如今在加州西海岸也能看到。

美国人参产于东部，因此就像此前一样，从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过印度洋运抵广州即可。而在运输毛皮则走太平洋更近。于是，从美国西北海岸出发、横穿太平洋的航路开辟了。

从美国经大西洋、印度洋前往广州的航路，日本位于航路的前方。而在太平洋路线上，在抵达中国之前先会经过日本。随着太平洋航路的开辟，终于经过日本近海的“柚木船”开始增加了。叩开日本门户的并不是全球的海洋霸主英国，而是美国。归根结底，这都是为了将海獭或海豹的皮运到中国所致，更进一步说，这与为了得到中国茶而进行的努力紧密相关。

如前所述，独立后美国对华贸易第一船是中国皇后号，在广州装载了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棉布864匹、瓷器962担、绢织物70匹、肉桂21担。这艘船的投资为12万美元，而净赚了37700多美元。

实际上在此前一年，有一艘55吨的小型船“哈略特”号从波士顿起航前往广州。如果计划不变的话，这艘船应该成为到达中国的美国第一号船。然而，当船驶过大西洋，到达好望角时，却被东印度公司拦住了。船上装载的货物是美国人参，东印度公司提出，愿意用美国人在广州卖掉人参之后所能换购的茶叶的两倍与之交换。

在权衡了第一船的名誉和眼前利益之后，哈略特号船长选择了后者。即使跨越了印度洋，也只能得到后者一半的好处，这样想的话，那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提议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英国的中国茶贸易，由东印度公司这个庞大的组织进行。为了垄断茶的贸易，他们不惜以两倍之利，成功让55吨的哈略特号的船长掉转船头返航。而他们用于补偿茶叶贸易的商品，便是鸦片。

相形之下，美国则通过小型船只，进行的是所谓的“游击式”的贸易。补偿茶叶贸易的商品，既有美国人参，又有海獭皮和海豹皮。接着他们还开辟了太平洋航线。

在广州十三行街这一处划定的区域中，建有各色“夷馆”。想象一下长崎的出岛便能略知概貌。不过，长崎只有荷兰的商馆，而广州则集中了各国的商馆。美国的大企业同孚洋行（Olyphant&Company）在广州被称作“锡山角”（Zion’sCorner），意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所居住之一隅。因为同孚洋行从不涉足鸦片贸易。

当日本进入欧美的视野时，好像首先是一个新的“茶产地”的印象。如前所述，最早于17世纪介绍到欧洲的茶，大概是日本所产之物。只是日本比中国实施更严厉的闭关锁国政策，而荷兰为了垄断对日贸易，并不太愿意公开日本的情况，因此有关日本的事情，大概每一样看起来都是新的。

美国的独立以及太平洋航线的开辟，使得世界在名义上和实际上，达到了全球规模。茶叶也随之成为畅销全球的商品。

在日中两国之间，将南宋的“末茶”传到日本的是镰仓时期的荣西，而将明代的“煎茶”传到日本的，则是江户时期的隐元。

隐元是福建福清县人，二十三岁时投身普陀山潮音洞做茶头，为僧众供应茶水，同时一边修行，二十九岁时在福州黄檗山万福寺正式剃度出家。后来成为万福寺的住持，在中国的禅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隐元受邀来到日本，在幕府所赐的宇治的一处地方上修建寺庙时，他将自己出家而后担任住持的万福寺的寺名，原样用在日本新建的寺院上。这位黄檗僧变成了卖茶翁，被尊为煎茶道之始祖。

煎茶道提倡新的茶道。就像卖茶翁自题的“卢仝正流”那样，其精神蕴含唐人卢仝的《茶歌》之中。这是前面曾提到过的一首诗，是卢仝为了感谢孟姓友人赠茶所作。其中有一句：

**便为谏议问苍生**

得到贡茶阳羡茶，虽然异常高兴，然而回头所想，却是为采茶而受苦的人民。在文雅中不忘俭德，这恐怕就是卖茶翁所追求的吧！

日本文化的一大特点在于，即使有新的东西传入，旧的也不会灭绝。煎茶传入了，末茶也绝不会衰亡。在陶艺的世界，通常也是一旦有了辘轳，手捏陶器便会被淘汰。而在日本，五世纪的时候便引进了辘轳，然而直到20世纪的今天，不用辘轳而纯粹手捏的陶器仍被奉为名品。如果没有茶道，那么手工制作的茶碗大概也就不存在了吧！

在当前中国，也有人提出需要像日本茶道那样的东西。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阳羡茶会”这一组织的成立。在陆羽和卢仝的时代，名称姑且不论，可称作茶道的东西确实是有的。茶道未能传承下来，虽然也有中国特殊的情况，但终于有人开始反省了。与其说茶道在中国绝迹，不如说是未留下“形式”。茶道是将所谓的“日常茶饭”中的“茶”非日常化，通过在现实中建立虚构的操作过程，重新思考人生。这在中国虽然是一种潜伏之流，却并未像日本那样成为一种形式而传承下来。

不仅在日本和中国，在欧美也一定有人坐在椅子上，将茶杯放在桌上，倏忽神游他界，从那边反观自身。应该有不少人即使未能明确地意识到，却也得以品味这种氛围。

越过炎热的印度洋，在太平洋的风浪中颠簸，装备着风帆和车轮的早期蒸汽船，在航行中是多么的辛苦。为何如此不辞辛劳，对茶孜孜以求呢？对他们来说，也许这是为了讨生活。但正因为想得到茶的人很多，这样的生计才得以成立。

世上有许多追求茶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必须紧密相连。这究竟是一条怎样的纽带呢？我想，跨越学术的分科对之进行研究，将是今后的一大课题。